

炎黄春秋

第 **10** 期
2012年

1951年中国拒绝联合国停火议案的决策

“民主集中制”的由来与演变

赵健民在20世纪50年代反“左”

上海私营报业的思想改造运动

从“天王圣明”说最高思想权威

目 录

春秋笔

- 1 1951年中国拒绝联合国停火议案的决策 沈志华
- 9 上海私营报业的思想改造运动 张济顺

人物志

- 15 赵健民在20世纪50年代反“左” 丁龙嘉

求实篇

- 22 “民主集中制”的由来与演变 应克复

亲历记

- 30 我向毛主席上书提“过渡时期” 徐振方
- 36 我的“文革”经历与“红卫兵” 丁 东
- 41 老报人办报记 范 钧

往事录

- 47 我了解的西北革命根据地肃反 宋金寿
- 56 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在上海 金大陆
- 58 日本“开拓团”中“大陆新娘” 孟月明 张 洁
- 62 张学良痛斥国民政府腐败 张友坤

怀人篇

- 65 两个倒霉的艺术家 杜 高
- 64 老友施拉姆 李 锐
- 68 潘家铮与三峡工程 李 楮

一家言

- 71 从“天王圣明”说最高思想权威 刘泽华
- 77 “如丧考妣”与“山呼万岁” 张绪山
- 82 带不带毛泽东参加长征的两种“版本” ... 罗庆宏 黄少群

品书斋

- 86 名校名教授是怎样被“思想改造”的 邵燕祥

编读窗

- 92 提供一点更正 殷 毅
- 93 读者来信摘登 冯 冰等

顾问

杜润生 于光远 李 锐

编委会(以姓氏笔画为序)

方 实 王俊义 冯 健 冯其庸 卢跃刚
 曲润海 何 方 吴 象 吴明瑜 宋木文
 张文彬 张岂之 张希清 张荣华 张惠卿
 杜 光 杜导正(召集人) 李一鑫 李大同
 李冰封 李宝光 李维民 杨天石 杨奎松
 杨继绳(副召集人) 沈志华 苏双碧 陈 敏
 邵燕祥 周瑞金 金冲及 胡德华 赵德润
 保育钧 钟沛璋 郭道晖 资中筠 凌 云
 展 江 徐小岩 秦 晖 袁 鹰 袁伟时
 高 放 高尚全 陶斯亮 钱理群 章诒和
 萧蔚彬 彭 迪 韩 钢 董 健 曾彦修
 鲁 諝 雷 颐 魏久明

社 委 会 杜导正(主任) 吴 思(副主任) 杨继绳
 李 晨 徐庆全 胡竞成 张晓鸥

社 长 杜导正
 法定代表人 常务社长 吴 思
 副 社 长 杨继绳 李 晨
 社长助理 胡竞成 张晓鸥 杜明明

总 编 辑 吴 思
 副总编辑 徐庆全
 执行主编 洪振快 黄 钟

总 经 理 李 晨
 副总经理兼网络总监 张晓鸥
 财务总监 胡竞成
 发 行 部 孔 屏(主任)
 办 公 室 王海印(主任)

理 事 长 杜导正
 副理事长 莊其環 李 琼
 秘 书 长 吴 思
 副秘书长 杜明明

主管主办单位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
 本刊常年法律顾问
 张思之(吴栾赵阁律师事务所010-68083211)
 步凌云(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010-85869163)

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
 国内总发行 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170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 82-507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100045
 网 址 http://www.yhcqw.com
 编辑部邮箱 yanhcq@sina.com
 yanhcq@gmail.com
 发行部邮箱 yhcqfxb01@126.com
 电 话 发行部 010-68532048 68539058
 编辑部 010-68534879 68523512
 财务部 010-68525374
 办公室 010-68522852(兼传真)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0296号
 印 刷 唐山市润丰印务有限公司
 单本定价 8元 全年定价 96元

1951年中国拒绝联合国停火议案的决策

○ 沈志华

1950年6月中国出兵朝鲜以后,印度、英国等联合国成员国就开始酝酿停火谈判问题,朝鲜战争历时三年半,其中两年半的时间是在停战谈判或边谈边打中度过的。所以,在朝鲜战争历史研究中,停战谈判同战争起源问题一样,也颇受国际学界的关注。

印度政府的调停尝试与美国的反应

1950年9月15日,麦克阿瑟(D. MacArthur)指挥美军在仁川登陆一举成功,从而改变了联合国军在朝鲜的被动局面。但是,美国决策者被轻而易举的胜利冲昏了头脑,随后便做出了一个重大的错误决策:越过“三八线”,占领整个朝鲜半岛,遭受了重大的军事失败,并开始全线撤退。其结果之一,便是国际舆论和联合国中呼吁停战的声音逐渐高涨起来。

调停朝鲜冲突的最早尝试是英国和印度做出的,英国主要是与美国磋商,而印度则重点与中国联系。1950年7月13日,印度总理尼赫鲁便致函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和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希望冲突地方化,并通过安理会促成和平解决,为此应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苏联也返回安理会,以便同美国一起寻求终止朝鲜战争行动的基础。这一建议得到联合国秘书长赖伊(T. Lie)的赞扬,却遭到美苏的冷眼:斯大林要求安理会听取北朝鲜的意见,美国则拒绝考虑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尼赫鲁8月3日发表讲话,说他并不否认北朝鲜是侵略者,但当务之急是将冲突地方化,寻求停止战争的途径,并确保朝鲜人自己决定朝鲜的前途。他再次强调,不承认北京政府是中国的合法政府,是一个大错误。美国仁川登陆成功之后,印度再次展开调停活动。9月30日尼赫鲁发表声明说,在未寻求其他解决手段前,联合国军不应越过“三八线”,并再

次呼吁联合国接纳中国以利于朝鲜问题的解决。10月16日尼赫鲁在记者招待会上解释了印度反对联合国10月7日通过的决议的理由。该决议支持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并决定成立朝鲜统一和复兴委员会,代表联合国处理朝鲜问题。尼赫鲁说,北京有正当理由反对不与它磋商而解决朝鲜前途问题的任何企图,并指责联合国的决议是在扩大战争(决议通过的第二天,美国部队越过了“三八线”)。^①此后不久,中国军队出现在朝鲜已经成为路人皆知的事实,在战争升级的情况下,印度试图集合一批中立国再次展开调停工作。不过,现在呼吁的对象已经转向北京而不是华盛顿了。

11月23日,在北京的印度大使潘尼迦(K. Panikkar)向中国外交部转达了英国的建议:举行和谈解决朝鲜问题。中国虽然没有明确拒绝,却提出要将台湾问题与朝鲜问题捆绑在一起。^②周恩来则在内部报告中把这个建议称之为美国通过英国发出的“政治试探和政治欺骗”。^③实际上,英国的建议并非为美国所鼓动。杜鲁门总统因战场上的失利正在气急败坏地威胁要使用原子弹,英国政府则为此忧心忡忡,艾德礼首相不得不宣布要亲自赶到华盛顿安抚美国人。^④在这种气氛下,联合国内外围绕停火问题的活动也骤然升温。12月1日印度驻联合国代表贝内加尔·劳(B. Rau)在纽约找中国特别代表伍修权,提出立即停火和设立非军事区的建议。12月2日,加拿大政府照会美国政府,指出美国政府要盟国在联合国通过决议谴责中国侵略是不明智的,只要存在可能性,那么与中共谈判解决问题的大门就必须敞开到最后一分钟。12月3日,尼赫鲁又要劳氏向联合国提议,在谈判设立非军事区和停火问题时,必须邀请中国参与商讨。印度驻美大使甚至向记者透露,尼赫鲁有意来华盛顿参加杜鲁门与艾德礼的会晤。^⑤

美国人婉言谢绝了印度的要求,却认真为英美首脑会谈做了准备。由国务院起草而经参谋长联席会议修改和签署的美国政府立场备忘录提出:只要条件不是难以接受,在目前情况下设法停火在军事上是有利的;如果停火是在“三八线”的基础上,可以得到联合国的全面支持;但这样的停火安排不得附有危害联合国部队安全的条件,也不得以在其他问题上达成协议为条件,诸如台湾问题、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等;如果联合国军出于军事考虑而不得不撤出朝鲜,则联合国必须宣布中国为侵略国家,并运用一切可能的政治和经济措施制裁中国。²⁶ 12月5日,联大指导委员会以10票对2票(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1票(印度)弃权通过决议,要求联合国大会立即考虑中国干涉朝鲜的问题。第二天,联合国大会通过决定,在议程中增加了关于中国干涉朝鲜这一新项目,并将其提交政治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中的六国(古巴、厄瓜多尔、法国、挪威、英国和美国)提出一个经过修改的指责中国干涉朝鲜的决议案,寻求在联合国大会得到通过。苏联则有针对性地再次提出要求所有外国军队从朝鲜撤出的建议。²⁷在联合国两种意见争执不下的情况下,印度等十三个中立国家开始策划新的议案,其目的是阻止中国军队越过“三八线”,并通过调停结束战争。然而,毛泽东此时的想法已经发生了变化。

毛泽东决定打过“三八线”再谈停火问题

中国出兵的条件和目标,斯大林和毛泽东最初的设想都是以“三八线”为界限,就是在朝鲜北部打击美韩军队,并迫使美国接受调停,通过和谈解决朝鲜问题。

然而,当战场形势变得越来越有利时,中国对停战和谈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第一次战役取得胜利后,毛泽东在11月13日发给斯大林的电报中特意加写了一句话:“据我的观察,朝鲜的战局,是可以转变的。”11月18日又电告彭德怀:“美英法对我毫无办法,悲观情绪笼罩各国,只要我军多打几个胜仗,歼灭几万敌军,整个国际局势就会改观。”²⁸斯大林以苏军战胜德军为例断

言,在这次战争中,中国军队必将成为“完全现代化、装备精良、威力强大的军队”。²⁹ 12月3日,即第二次战役取得初步胜利时,为解决中朝部队的统一指挥问题,毛泽东、周恩来在北京会见了金日成。³⁰在分析战场形势时,毛泽东说:“敌人有可能要求停战,我们认为必须承认撤出朝鲜,而首先撤至‘三八线’以南,才能谈判停战,最好我们不但拿下平壤,而且拿下汉城,主要的是消灭敌人,首先是全歼伪军,对促进美国撤兵会更为有力量。美国如果承认撤兵,联合国有可能同意在中苏参加的条件下,主张全朝鲜在联合国监督下,选举自己的政府。”这个谈话第二天被电告志愿军前线指挥官。³¹显然,毛泽东此时对结束战争方式的考虑仍然是以和平谈判为主,不过条件是美军主动撤回或被打回“三八线”。当然,首先是在战斗中大量消灭敌人,才能在有利的条件下促成停战谈判。

因为斯大林一直很重视“三八线”的存在,所以,接受停战谈判的时间和条件,中国还要征求苏联的意见。12月4日,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询问苏联副外长葛罗米柯:“从政治角度看,中国军队在胜利地继续进攻的情况下,是否应该越过三八线?”葛罗米柯答复:“由于朝鲜局势出现了对美国人不利的转折,现在他们无法掩饰自己的失望。”鉴于这种形势,“提出‘趁热打铁’这句古老的谚语是十分恰当的”。³² 12月5日,伍修权在纽约拜会苏联驻联合国代表维辛斯基并告知,在与赖伊会见时,瑞典、英国和其他国家代表“企图弄清中国军队是否停留在三八线以及中国军队是否准备在其余外国军队撤离朝鲜的同时离开朝鲜”。³³接到伍修权等人的同样电报后,周恩来于12月7日凌晨回电,首先向他们明确指出“现时三八线的界限已不存在”,至于谈判内容,“正在考虑中,容后电告”。³⁴与此同时,周通过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发出特急电,向莫斯科通报:联合国秘书长及印度、英国、瑞典等国代表近来不断探询中国在朝鲜停止军事行动的条件,其意图在于“保持以三八线为界”。为了掌握主动,并在和谈问题上“表现出积极性”,中国政府打算通过伍修权向他们提出如下五个在朝鲜停止军事行动的条件:一、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朝鲜;二、美国军队撤出台湾海峡和台湾岛;三、朝鲜问题应

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四、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参加联合国并从联合国逐出蒋介石的代表；五、召集四大国外长会议准备对日和约。如果上述五项停止军事行动的条件被采纳，五大国即可派出自己的代表，以召开签订停战条件的会议。周恩来表示，中国政府在采取行动之前，想知道苏联政府的意见，并希望当日得到答复。^{注15}

当晚8时40分（莫斯科时间），葛罗米柯发出了斯大林的答复电：“我们完全同意您提出的在朝鲜停止军事行动的条件。我们认为，不满足这些条件，军事行动就不能停止。此外，我们认为，对这三个国家的代表不能过于坦诚和过早地摊开自己的底牌，他们其实是美国的探路人。我们考虑，在汉城尚未解放之前，还不是中国亮出自己全部底牌的时候。”斯大林建议，中国只需表明希望尽快结束战争的态度，同时要求联合国和美国首先提出停止军事行动的条件。^{注16}周恩来收电后即刻告诉毛泽东：这个电报表明，斯大林的意见“与主席考虑相合，拖而不摊为上策”。^{注17}于是，周恩来在12月8日电告伍修权和乔冠华，“关于谈判问题，你们仍应采取他急我不急的态度，不给他们以侦察的机会，不向他们过早摊牌”。在这种情况下，印度等十三国建议的遭遇是可想而知的。

十三国停火建议与中国的最初回应

12月7日下午，潘尼迦向中国副外长章汉夫转交了一份备忘录，内容是印度代表十三国提出的关于在朝鲜停战的建议。潘尼迦说：印度政府的基本建议是举行一个与朝鲜问题有直接关系的各大国参加的会议，中国当然为全权参加者。大国会议的先决条件是双方以“三八线”为界实行停战，然后进行商谈，讨论外国军队撤离朝鲜及建立独立统一朝鲜的问题，同时解决台湾的归属问题、美军撤出台湾的问题、中国在联合国及安理会的席位问题。印度政府希望中国政府能郑重考虑，宣布愿以谈判方式解决冲突并保证不越过“三八线”。鉴于章汉夫提到朝鲜人民军解



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

放平壤的消息，潘尼迦说：“我个人对朝鲜军与中国志愿部队的力量并不怀疑，但问题不在这里，问题是必须由政治协商来解决，军事行动只能延迟问题的解决，即使能把美军赶出朝鲜，但日本离朝鲜很近，仍可从日本继续来轰炸。”因此，你们在军事上占有优势，这正是使朝鲜问题能在照顾朝鲜和其他邻国利益的情况下，获得和平解决的机会。章汉夫仍坚持：和谈的前提是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美国武装力量撤出台湾。潘尼迦则指出：撤兵确是一个办法，因为把军队打出朝鲜不能解决问题而反会加深危机，但这一目的只能通过谈判来达到。潘尼迦最后说：这一建议是所有非欧洲国家第一次联合起来提出的，不能被认为是支持美国的。这是一个对中国有利的举动，如果中国能宣布不越过“三八线”的话，则将获得这些国家的欢迎和道义上的支持。^{注18}

12月8日，印度参赞考尔要求再次会谈，以补充昨天潘尼迦的谈话。考尔坦率地指出：只要中国同意十三国建议，则美国支持的六国提案就不会通过。反之，除印度外，其他亚洲国家恐怕会因此而倒向美国。接待考尔的亚洲司副司长陈家康不客气地提出了几个质问：十三个提案国为什么不公开反对美帝侵略？为什么不发表宣言要求美国撤军？为什么在美军越过“三八线”时不发表宣言反对？考尔一一给予耐心解答，并坦诚地指出：在军事上占优势时进行谈判不但不表示中国的软弱，反而正是对中国有利的时机，希望周恩来早日接见潘尼迦大使，表明中国的态度，争取世界舆论的支持。^{注19}

直到12日与苏联商妥后周恩来才会见潘尼迦,周说:中国一向坚持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现在更希望朝鲜的军事行动能迅速停止。但是现在结束战争的关键在美国,我们急愿知道美国和联合国对停战条件的整个意见。至于“三八线”问题,早已为美国侵略军所破坏而不复存在了。第二天,周恩来将谈话情况电告伍、乔,并特意指出,关于“三八线”不复存在的说法,可以告诉劳氏。周还指示,如果问到对十三国提案的立场,答复是:停战不是骗局,是要真正能结束朝鲜战事。这样就必须要美国表明其对停战条件的意见。^{注20}

中美交战以后,美国决策层是在是战还是和的问题,一直意见纷纭,犹豫不决。如前所述,12月4日美国曾设想在体面的条件下进行和谈。但在12月8日举行英美首脑最后一次会谈时,情况有了变化。在听取了前方的最新情况汇报后,杜鲁门舒了一口气,“他不认为我们将被逐出朝鲜”,形势并不像“会谈开始时那样暗淡”。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也认为,靠目前兵力和正常轮换,完全可以在朝鲜守住,现在“至少不必被迫进行谈判”了。^{注21}同一天,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奥斯汀对印度代表说,美国并没有提出停火建议,也没有要任何人提出此项建议。不过,倘若有人提出,美国将予以考虑,只是不得附加任何政治条件。^{注22}



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命令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图为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第二天,这个建议便出现了。12月9日,美国驻联合国副代表格罗斯(E.Gross)收到了由菲律宾递交的十三国建议,其主要内容包括:立即停火;中国和美国军队撤离朝鲜;美舰撤出台湾海峡;由联合国裁军委员会监督南、北朝鲜军队解除武装;由6个联合国成员国组成一支不超过5万人的部队留在朝鲜维持治安;海港、边境由联合国观察员进行视察,以保证上述条款的执行;实现停火后6个月由联合国朝鲜委员会主持选举;选举后3个月,联合国部队撤走。^{注23}11日,杜鲁门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讨论十三国建议。国防部长马歇尔指出了美国接受停火的两难困境:一旦停火就会停止所有空中侦察,并且可能会迫使美国海军撤退。如此,共产党方面就可以大大增加地面援助。但如果美国反对停火,又会被认为是在反对和平解决冲突。最后,会议确定接受停火的原则是不得使美军处于军事上的不利地位,不得附有政治条件,应在停火前谈妥停火的细节,由联合国监督停火。为了应付国会的指责,会议还决定将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注24}

12月14日,联合国大会以52票赞同、5票(苏联及东欧国家)反对、1票(中华民国)弃权,通过了十三国提案,并建立起三人停火委员会(又译三人小组或停战委员会),由联大主席安迪让(N.Entezam,又译恩蒂泽姆)、印度代表劳和加拿大代表皮尔逊(L.Pearson)组成。十二国提案暂被搁置。随后,停火委员会开始工作,联大休会,直到停火委员会提出报告为止。^{注25}

12月14日下午,考尔向中国通报了联合国决议的情况。这位参赞说,第一个提案已经通过,第二个提案的内容是召开国际会议商谈停战地点、设立非军事区及关于朝鲜、台湾和远东的一般问题。这两个提案不但完全考虑了中国的意见,更超过了中国的要求。考尔说:“现在联合国大多数已通过十三国提案,中国如失去这一机会则美国可能利用舆论来指责中国不要停战。”^{注26}同一天,周恩来致电

伍、乔,对他们将在16日记者招待会上的发言稿提出修改意见,其重点在于揭露美国赞成在朝鲜“先停火再和谈”的阴谋诡计,并告知招待会后他们即可回国。^{注27}显然,此时中国已决心拒绝十三国提案。

12月15日下午,潘尼迦再次求见章汉夫,希望中国能够接受联合国通过的提案,并进一步解释印度等国的立场。章汉夫重申了中国的要求,潘尼迦表示,印度也希望先解决台湾问题和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然后解决朝鲜问题。关于外国军队撤出朝鲜问题,“其具体办法似需双方先行停战,然后具体布置撤兵程序”。章汉夫坚持:“美国不停止其侵略,不从朝鲜和台湾撤兵,则和平解决只是口上谈谈而已。”16日下午,周恩来电告伍、乔,要他们向劳氏和联大主席直接表明态度:先停战后商谈的做法,只能适合美英集团的要求,是虚伪的停战,中国绝不同意。^{注28}

12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专论,批评联合国14日通过的决议是为美帝国主义侵略政策服务的,因为美国侵略军在惨败溃逃的情况下,正在争取喘息的机会,以便保存侵略的阵地,而联合国大会的建议正是符合美国侵略者的这个愿望的。^{注29}19日,三人委员会又给周恩来发出一封电报说,委员会正在推动召开十二国议案所提出的包括中国政府在内的国际会议,但要使会议开成,首先需要实现某种停火的安排。^{注30}20日,伍修权回国前在伦敦机场发表讲话:中国的提议“是一个真正停止战争的方案”,但安理会不予考虑。美国“别有用心地支持在朝鲜‘首先停火’的主张,企图借以欺骗全世界人民”,其目的“只是为了束缚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的手足,让美国军队继续侵略和扩大战争”。^{注31}22日周恩来发表声明,全面批驳了联合国的议案,进一步阐明中国的立场,并号召亚非国家必须抛弃“三人委员会”及先停战后谈判的想法。^{注32}毛泽东在修改这一声明时,在谈到中国关于和谈条件的地方特意加了两条:美军撤出台湾、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并说“朝鲜问题和亚洲重要问题的和平解决,离开这几点是不可能的”。^{注33}听到这一消息,三人委员会陷入一片混乱,劳氏垂头丧气,一声不吭,皮尔逊则溜之大吉,索性回国了。^{注34}

中朝军队越过“三八线”与联合国停火议案的提出

1950年12月31日,中朝联军向“三八线”发动攻势,国际局势骤然紧张起来。1951年1月3日政治委员会举行会议,劳氏代表报告说,因中国政府认为所有未经其合法代表参加和同意而被通过的联合国决议均为非法的、无效的,三人委员会“现无法提出任何建议”。随后,政治委员会宣布休会两天。^{注35}1月5日三人委员会请求再给予一些时间,以便提出解决朝鲜问题的新建议。政治委员会同意了这一请求,而美国代表则宣称,他的政府不会接受任何带有不体面条件的停战安排。^{注36}1月11日政治委员会复会,皮尔逊代表三人委员会提出了关于解决朝鲜问题基本原则的“补充报告”。该报告包括五项原则性建议:立即实现停火;举行一次政治会议以恢复和平;外国部队分阶段撤出朝鲜,并安排朝鲜人民进行选举;为统一和管理朝鲜做出安排;停火之后召开一次由英、美、苏和中国参加的会议,以解决远东的问题,其中包括台湾的地位和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会议接着对这一报告进行讨论,美国代表在会上一反常态,奥斯汀发言表示,美国政府将投赞成票。经过两天的讨论,13日下午进行表决,结果是50票赞成(包括美国)、7票(苏联、乌克兰、白俄罗斯、波兰、捷克斯洛伐克、萨尔瓦多及国民党)反对、1票(菲律宾)弃权。苏联和波兰发表声明说,他们反对的理由是未邀请中国和北朝鲜的代表参与讨论。随后,会议又表决通过了挪威的提议:立即向中国政府转达这一提案,并要求其说明是否承认以报告中所列举的原则作为解决远东问题的基础。^{注37}

作为新的停火建议,这五项原则在满足中国的要求方面超过了联合国以往所通过的任何方案,而且是在美国明确表态后交给中国的,特别是该提案建议召开一次专门会议,讨论包括中国在联合国席位及台湾问题在内的远东问题,与12月22日周恩来提出的要求几乎是完全符合的,而根本无视美国反对任何政治附加条件的一再要求。既然如此,美国为什么会突然改变态度,接受这个“带有不体面条件的停战安排”?

实际上,美国是迫不得已才接受这个停火建议的。如果美国拒绝这个建议,又会遭到国际舆论的谴责,甚至引起亲密盟国的强烈不满。因为三人委员会的这个补充报告,实质上就是十二国提案的翻版,特别是英国对此显得十分热情。1月4-12日,英国在伦敦召集了英联邦会议讨论解决朝鲜问题的出路。会议发表的联合宣言提到,“我们必须最大限度地理解那些看起来和我们存在意见分歧的人”,“我们欢迎旨在与斯大林或毛泽东进行坦诚的意见交换的任何可行的安排,并将不遗余力地去倾听彼此的心声”。会议公报则表示:英联邦国家驻联合国代表们殷切期望,政治委员会正在讨论的新的提议将会使远东地区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得到解决。^{注38}

的确,白宫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正如艾奇逊所说:“任何一种选择都具有危险性”,同意这个议案将使朝鲜人失去信心,“并引起国会和舆论界的愤怒”;不同意则会“失去我们在联合国中的多数和支持”。就在杜鲁门左右为难时,艾奇逊出了个主意,他建议美国对此投赞同票,因为根据此前中国政府对十三国议案的立场,很可能中国也会拒绝这个决议。果真如此,不仅美国将摆脱困境,还会让盟国的头脑清醒起来,并追随美国谴责中国。^{注39}于是,杜鲁门决心进行一次赌博。

中国拒绝联合国议案

果然不出艾奇逊所料,中国又一次拒绝了联合国提案。1月13日赖伊向周恩来转达了联合国的停火议案,并询问中国政府“是否接受这些原则作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及其他远东诸问题的基础”。^{注40}其实在1月11日联合国讨论三人委员会的报告时,中国就得到了消息,周恩来立即起草了一份关于停战谈判问题备忘录向苏联征求意见,13日斯大林回电表示同意。^{注41}收到联合国的正式文件后,毛泽东原计划召金日成和彭德怀到北京共同协商,后又委托周恩来把备忘录修改一下,发给金日成征求意见。^{注42}14日周恩来发出的致朝鲜政府备忘录充分体现了中国领导人对停战问题的立场和策略。备忘录指出,目前美国由于在朝鲜的失败,急于谋求出路,最

好是光荣停战,否则就是有限战争。只要先停战,美国就有可能保存潜力,并使李承晚保有若干地区和武装资本,而谈判则可无限期地拖延下去。因此,我们拟拒绝先停战后谈判,并主动提出下列主张:1. 提议在同意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后朝鲜内政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的基础上举行有关各国的谈判,以结束朝鲜战争。2. 谈判内容必须包括美国武装力量从台湾海峡撤退及远东有关问题。3. 举行谈判的国家应包括中国、苏联、英国、美国、法国、印度和埃及七国。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即从举行七国会议予以确定。4. 七国会议的地点提议选在中国。如果上述提议在联合国中引起变化,他们可能提出先实行有限期的停战,我们准备在适当时机暗示在七国会议举行后,可以先讨论限期(1-2个月)停战问题。如此议被接受而举行谈判,则谈判不成我军可得到休整两三个月的机会,期满再战,同时又能争取世界人民的同情。如此议不成,其咎在彼,更不影响作战。周恩来还说明,上述提议已得苏联政府的同意和支持。^{注43}彭德怀15日回电,表示完全同意备忘录提出的方针。同马歇尔一样,彭德怀也注意到暂时停火给中国军队带来的好处,他特别指出:“限期至3月底不会妨碍朝鲜作战,反而有益,减少敌机活动,便利进行各项准备。”^{注44}

1月17日,周恩来致电政治委员会主席,重申了中国政府的主张,并明确表示不同意该决议“先停战后谈判”的原则,因为这“只是为美国军队取得喘息时间”。“不管谈判的议程和内容规定得如何,如果不先行谈判规定好停战条件然后停战,则在停战后再举行谈判,可以无休止地讨论下去,得不到任何问题的解决”。同时,周恩来提出了备忘录中提到的四条反建议。^{注45}当天,中国外交部向有关国家驻华使节递交了周恩来的电文,周恩来还接见了印度大使潘尼迦。第二天,章汉夫分别接见了英国谈判代表胡阶森(J.Hutchinson)和丹麦公使穆克(A.Mørch),欧非司司长宦乡接见了瑞典大使阿马斯顿(T.Hammarstrom),向他们解释中国拒绝联合国提案的理由。

从周恩来起草的备忘录以及上述谈话记录可以看出,中国拒绝联合国议案的种种理由均缺乏说服力,特别是在英、印等国代表作出解释后,其真正

原因是毛泽东并不打算进行停战谈判,至少现在还不是时机。所以,中国反对先停战后谈判的原则,而坚持先谈判(实际是谈政治条件)再考虑停战的方针。

中国错失了停战谈判最有利的时机

中国政府的答复,当然令白宫喜出望外。^{注46}另一方面,美国决策者抓住这一机会死不撒手,从而完全扭转了被动局面。

1月17日美国代表奥斯汀在政治委员会就周恩来的复电发表了长篇讲话,指责中国接连三次拒绝国际社会的和平努力,蔑视联合国的和平诚意,并驳斥中国所谓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的要求是有意让中国军队留在那里,因为志愿军可以归入朝鲜军队的序列。奥斯汀还指责中国为侵略者,呼吁政治委员会应立即研究并提出制裁侵略者的建议。^{注47}20日,美国众议院通过决议,要求联合国立即宣布共产党中国为对朝鲜的侵略者,众议院投票时,几乎是全体一致通过。四天以后,参议院表决同一决议案时,也是无一异议。^{注48}

周恩来的声明在很多国家产生了不良反应。尽管印度总理尼赫鲁认为,从文件看中国政府并非彻底拒绝联合国的决议,印度代表劳氏在政委会发言也认为,中国政府的答复不是对三人委员会原则的正面拒绝,而是“部分接受,部分拒绝,部分要求解释,部分则是一套反建议”。而中国的这些反建议,“显然有再加讨论与谈判的余地”。但中国的做法却引起了三人委员会另一个成员的不满,皮尔逊发表声明宣称,“北京拒绝联合国之建议,即关闭了解决远东诸问题之途径”。甚至一向支持接收中国进入联合国的英国也公开表态,“同意谴责中国支持侵略者的干涉行为”,尽管它不主张在现阶段采取新的重要决定。^{注49}

显然周恩来也意识到中国处理这一事件的策略失当,为了争取世界舆论,中国外交部以答复印度大使的方式,于1月22日又提出了一个修正方案,主要内容是:只要一切外国军队从朝鲜撤退的原则被接受后,并付诸实施,中国政府将负责劝说志愿部队回国;关于停战谈判问题,可



首都著名画家举办“抗美援朝书画义卖会”

分两步进行,首先在七国会议第一次会议中商定有限期的停火,并付诸实施,以便继续进行谈判,其次,停战全部条件必须与政治问题联系讨论;必须保证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注50}然而,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美国不会再给中国人留下任何解释的机会和空间,周恩来的努力淹没在美国一系列的外交和军事行动中。

1月22日,格罗斯在纽约宣布,美国的对台政策要取决于美国国家安全的考虑;美国坚决主张,将来有关台湾的任何会议,都必须有国民政府参加;对于中共加入联合国的问题,美国从未作过任何承诺。^{注51}显然,格罗斯的强硬声明反映了美国当局做出的最后决定,其目的就是阻挠和打消各方面继续进行调解的念头。1月24日,十二个亚非国家联名向联合国大会提出建议:由美国、埃及、苏联、印度和中国举行一次会议,以便中国对联合国1月13日决议的答复做出一切必要的澄清和补充。^{注52}但是,由于美国的反对,政委会于30日否决了这一提案,决定不再听取中国的解释。相反,在美国的鼓动和策划下,联合国大会终于在2月1日通过决议,认定中国政府“在朝鲜从事侵略”。^{注53}不过,与美国的外交计谋相比,真正使中国陷入困境的,是美军在战场采取的军事行动。

在中国拒绝了联合国停火议案以后,1月25日,李奇微集中地面部队及全部炮兵、坦克部队(总兵力约25万余人),在空军支援下,发动了全

线进攻。^{注54}其结果,不仅彻底破坏了中朝联军休整和准备再战的计划,而且使印度等国试图继续呼吁停战谈判的努力变得毫无意义。在联合国军发动进攻时,中国军队的状况正如志愿军党委1月8日报告所言:“战斗单位兵员不足,给养很差,体力削弱,非休整补充,改善运输、供给,难以继续作战。”^{注55}因此,彭德怀与金日成、高岗等协商后,于27日致电毛泽东:如敌继续北犯,我保持桥头阵地甚困难,可否放弃汉城、仁川,由北京播发中朝联军拥护限期停战,北撤15-30公里的消息。^{注56}28日毛泽东回电,否定了彭德怀的建议,理由是“敌人正希望我军撤退一段地区,封锁汉江,然后停战”。所以,毛反而要求中朝联军立即准备发起第四次战役,消灭2-3万美李军,占领大田、安东一线以北地区。此后休整2-3个月,再发动“带有最后性质的第五个战役”。毛泽东的决定得到了斯大林的肯定和支持。^{注57}

事实证明,毛泽东和斯大林对敌方战略意图、敌我力量对比以及战局发展趋势,都做出了完全错误的判断。历经两个多月的艰苦战斗,虽给敌人以重大消耗,但中朝联军进军“三七线”以南的作战目标根本无法达到。相反,联合国军不仅攻占了仁川、金浦和汉城等战略要地,而且全线突破中朝联军的阵地,再次进占“三八线”以北地区。在随后发动的第五次战役中,中朝联军虽然打过“三八线”,消灭了敌人几个师,但没有达到“粉碎敌人计划,夺回主动权”的战役目标,而不得不停止进攻,提前结束战斗。联合国军则于5月20日发起全线反击,中朝军队被迫撤退,并遭受极大损失。^{注58}最后,战线稳定在“三八线”南北,双方均无力再发动大规模进攻,而开始考虑停战谈判问题。

对于志愿军的致命缺陷和严重困难,彭德怀心里最清楚。1951年2月21日彭专程回北京,向毛泽东做了详细汇报。这次谈话对毛泽东有所触动,因而提出:“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不要急于求成。”^{注59}3月1日毛泽东把这些情况向斯大林做了说明,并告知:“我军必须准备长期作战,以几年时间消耗美国几十万人,使其知难而退,才能解决朝鲜问题。”^{注60}到5月下旬,彭德怀深感战争已经无法继续下去,他于26日以志愿军党委的名义向中共中央报告:根据各军

反映,目前部队干部情绪消沉,对战争长期性感到厌倦,顾虑今后作战会更加困难,对战争能否取胜产生怀疑,某些干部甚至违抗命令,官兵关系不正常,破坏纪律现象相当严重。^{注61}据聂荣臻回忆,第五次战役以后,中共中央开会讨论战争的前景,多数人主张“应停止在三八线,边谈边打,争取通过谈判结束战争”。其理由如聂荣臻所述:把敌人赶出北朝鲜的政治目的已经达到;恢复战前状态各方面都好接受。^{注62}这就是说,中国对战争目标的设定和结束战争方式的考虑,又开始转回到最初的立场。

但此时莫斯科和平壤还在幻想继续作战。5月29日斯大林给毛泽东的电报说:看来你们将要准备一次重大的战役,其目的是为了给英美军以沉重打击。金日成则在30日致函彭德怀提出:决不能预测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亦不能在“三八线”上结束战争,并建议6月底或7月初发动总攻。^{注63}为此,毛泽东邀金日成于6月3日来到北京,并说服他接受了中国的主张。^{注64}斯大林却不是那么容易改变主意的,他在接到了北京转来的毛泽东、彭德怀关于作战困难的几封电报后,于6月5日回电,坚持“不应急于结束朝鲜战争”,而要继续实行“对敌人的重大打击,消灭其3-4个师”。^{注65}毛泽东只好在6月5日晚再次致电斯大林,讲述中国在战争遇到的种种困难,并表示希望让高岗和金日成向他当面汇报和请示。^{注66}6月10日高、金抵达莫斯科。在会谈中,斯大林一再追问,中朝方面的意图和愿望究竟是什么?得到的明确答复是:我们的愿望是停战。于是,这次会谈确定了停战和谈的方针。^{注67}接到斯大林6月13日关于同意停战的电报后,毛泽东要求高岗和金日成继续与斯大林会谈,解决如何提出停战谈判的问题。毛认为,由于战场形势不利,中国和朝鲜目前都不便提出这个问题,最好由苏联政府出面试探和调解。至于停战的条件,毛泽东主动要求不再提中国进入联合国的问题,台湾问题也只是作为筹码而已。^{注68}至此,毛泽东终于明白,中国已经失去了在有利条件下进行和谈的实力地位。■

(本文注释共68处,详见本刊网站)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 徐庆全)

上海私营报业的思想改造运动

○ 张济顺

1952年8月21日,上海新闻界开始了为期两个月思想改造学习运动。参加者仅限于新闻日报、大公报、文汇报、新民报、亦报五个单位的编辑、经理两部门工作人员共566人,其中编辑部门人员356人。^①除公私合营的新闻日报外,其余各报均为私营报纸。可以说,这就是一次上海私营报业的思想改造运动。

迟疑的决策

上海新闻界的调整是在思想改造运动进入尾声时开始的。然而,此项工作的进展并不理想。领导机关虽一致认为此举“从领导新闻工作方面来说非常必要”,但对调整的方案意见不一,几易其稿,迟迟不能定夺。^②关于调整工作的时机如何把握,领导们的看法也不尽相同。究其原因,除了私营报纸“旧的办报思想”作祟外^③,上海各报的业务经营困境也是当政者不能不权衡再三的因素。

据1951年9-12月的统计,私营的文汇、大公、新民^④报均有亏损,“发行既无起色,广告又每况愈下,更严重地威胁了自给自足的方针”^⑤。文汇报的经营危机更为严重。

对于在经营危机之下能否进行私营报纸的分工调整问题,上海新闻工作的几位领导人意见相左。1951年秋冬之交,夏衍等认为到了“下决心,用大力来调整”的时候了,否则“结果亏累不堪,增加我们的包袱”^⑥。新协党组书记、市政府新闻出版处长陈虞孙等则顾虑此时“总销数没有很大发展,遽尔分工以后,可能使销数反减”,主张观察一段时间再行决定^⑦。

领导层的意见虽不一致,但都觉察到了私营报业经营危机背后上海文化市场所起的负面作用。面对持续多时的亏损,私营报业一面在新政府的继续补助上打主意,一面还是从市场上动脑

筋,争份额。^⑧

市场竞争助长了私营报业的旧思想、旧作风,阻碍了报纸分工调整的推进,干扰了党对私营报纸的领导。那么,解决问题的最佳选择应当是进行私营改公营的体制变革,领导们理应迅即把此事提上议事日程,进而成为上海新闻界思想改造的直接目标,但他们并没有如此决策。

消费大众的选择是决策者必须顾及的重要现实。中共执政后,尽管迅速摧毁了国民党官办和外人经营的报业市场,但不可能同样迅速地取消上海大众消费文化市场。即使党管报纸的新报业格局初步形成,市场的拉动作用仍然十分强大,无论是党报、公营报还是私营报,都难以摆脱消费大众的市场考验。解放日报创刊后7个月,计亏损23亿元~24亿元,导致亏损的原因,一为政治考虑,照顾其直接订户中90%的工人、学生享受优待折扣;二是市场考虑,要压低价格与新闻日报、大公报竞争。^⑨党报虽然有强大的权力后盾,1952年发行情况大有好转,到5月底日销量已稳居各报第一^⑩,但上海市民的多元选择依然要求报纸的多样化。正如新闻界几位上级领导人意识到的:上海“没有达到大家都只以看党报为满意的程度”,“解放日报面对整个华东又要具体照顾上海这个大城市中的异常复杂的业务,亦有许多困难”,“需要有一张强有力的比党报更灵活一些的教育上海人民的报纸”^⑪。因此,几家私营报纸或合并、或重组、或北迁的种种方案应运而生。而各种方案的核心意图都在于:既不能让私营报纸完全脱离市场,变为公营,又不能任其随市场摆布,迁就“落后群众”。

同样出于现实的考虑,新闻工作的领导们也一致认为,对于私营报业的亏损“公家万难无止境地补贴维持”。即使是政府为促进各报分工提供“适当的援助”,也“不能用于消极性的弥补亏损”。^⑫也就是说,至少到新闻界思想改造运动前夕,政府

是不考虑将这些处在亏损中的私营报纸变为公营的。改制虽然缓行,改人却日益紧迫。执政者可以对私营报纸的经济亏损不予援助,却不能对其政治表现置之不理。1951年10月,夏衍和姚溱¹²不无忧虑地向胡乔木报告:“工作日益深入复杂,三张报纸(指文汇、大公、新民——笔者注)的编辑部都没有力量单独应付这个局面。最近报上泄露机密事件层出不穷,生产虽成中心,而大公报公然说‘与报纸无关’,文汇报的编辑负责人甚至连郝建秀工作法这样常识的东西也一无所知”¹³。领导们感到最严重的问题还是中共在私营报业内力量薄弱,“领导不够有力”。文汇、大公、新民三家私营报社各有两名共产党员,加上新闻日报13名党员,不过19人,且“能真正起领导作用的党员不过一两个,有的党员竟跟在民主人士后面向党‘要求’、‘竞争’”。而各私营报的大部分人是“从解放以前原封不动继续下来的”,“不仅情况复杂,而且都保持了过去一套旧的办报思想与作风”¹⁴。有鉴于此,夏衍等急切吁请:“就我们对私营报纸的领导上来说,也到了非调整不可的时候了”,否则“一定会出乱子的”,故望从速指示,“以便我们提出最后方案,请华东局与中央宣传部最后决定”¹⁵。

与此同时,私营报业出现了若干有利于执政者决策的好兆头。先是私营报的几位头面人物对调整工作的看法有了转变,不再认为“调整就是‘涸辙之鲋,相忘于江湖’、‘与共产党共患难易’”¹⁶;尔后是各报销量从低谷中走出,经营困境出现了转机。1952年春,全市报纸总销数从3月4日最低的日销量35.7万余份,增加到5月29日的47万余份,并有“继续增加之势”¹⁷。

最好的兆头还是来自文汇报。在各报经营走出低谷之时,《文汇报》不但销量上升的幅度居私营报纸之首,“致新闻、大公、新民等报不得不考虑其工作方针”,而且让领导们从中总结出两条“成功经验”:其一,“放下‘全国性’的大报架子,明确地以教育界(中小学教师、乡村教师、职工教师、中学生以及一部分大学生与职业青年)为对象;小型;通俗化”。其二,“加强报纸的群众工作”。¹⁸在领导们看来,这些变化和转机,都是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带来的办报人和读者的觉悟所致。因而,通过思想改造来实现报纸分工调整的时机已经

成熟。

经过两年多的反复酝酿,上海新闻工作的领导机关将不改变所有制前提下实现私营报纸的分工作为思想改造的直接目标,启动了上海私营报业的人的改造。

报人们的最初反响

长期以来,《文汇报》一直面向知识分子读者,多多承担思想改造的报导任务是其题中应有之义。从1951年9月京津地区高校思想改造运动起到1952年底上海新闻界思想改造告结束,在《文汇报》刊出的有关思想改造运动的各类报导、专题文章计767篇¹⁹,新闻强度和密度前所未有的。但报导别人如何检查如何改造是一回事,轮到自己则是另一回事。

文汇报后来在总结回顾时坦言:在运动初期,“有不少同志存在着各种不正确的看法,挨整、整人、陪整和过关等等错误的思想很普遍。有些同志恐惧,有些同志轻松”²⁰。正如新协党组书记、市政府新闻出版处处长陈虞孙刻画的那样:“我们新闻界一般来说在思想上有一定认识,在文艺整风中受过鞭,在三反五反中打过滚,在教育界思想改造中熟悉行情,每个人都有一套”²¹。

根据预定的思想改造学习计划并经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到任不久的市委宣传部部长谷牧在上海新闻界思想改造学习动员会上作了长篇报告。其中特别对报界思想改造的根本任务和直接目标作了如下的阐述:这次运动的根本任务是要使我们的报纸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毛泽东思想的旗手”,“劳动人民利益的表达者和争取人民民主事业彻底胜利的不倦战士”,如毛主席所指示的,“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个根本任务的前提下,各报纸根据其具体条件可以而且必需分工,可以而且必须分别联系不同的对象、不同的阶级、阶层的人民群众;可以而且必须在内容与形式上多种多样而不千篇一律,甚至在企业经营的性质上,也可以有私营、公私合营或公营等等的不同”。但是,不论企业为何种性质,它的经营管理“都必须按照共同纲领所规定,明确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报告强调,思想改造就是为实现这个目标

而展开的以肃清资产阶级办报思想为中心内容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注22}谷牧的这段话把领导层酝酿了两年多的思想改造的直接目标公布于众,具有“定调子”的意义,即:思想改造既不是为私营报业摘掉私营帽子,又必须改变其私营的头脑,简言之,换脑不换帽。

然而,在报人们看来,这个要求是一个难以理解的悖论。围绕“资产阶级为什么办报”、“如何看待私营报纸的服务对象”两个核心问题,一系列相关的诘问、困惑甚至是牢骚通过各种途径反映到运动的领导者那里。最有代表性的一说是:“私营报业的资本家拿钱办报,请我们去宣传工人阶级思想,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这不是天下最笨的资本家么?出了钱请人打自己的耳光。”另一说是:“私营报纸能否宣传马列主义?既宣传马列主义为什么要私营报?”再一说是:“我们报纸的对象是小市民,或者是教师,他们多半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么我们为他们服务,算不算为工农兵服务呢?”^{注23}有些人甚至抱怨说,解放三年来,私营报业“错就错在服务对象上”^{注24}。

问题的症结很清楚:顶着私营帽子的报纸,又被框定了带着小资产阶级帽子的读者对象,怎么可能换上报告所要求的工人阶级的头脑呢?然这一切不都来自于上级领导吗?这个百思不得其解的思想症结在提起各报分工问题时业已存在,但谷牧的动员报告还是没有达到释疑解惑的效果。

由困惑和不解引发的对私营报业前途的担忧和苦闷,弥漫在各报的党员和群众中。业内的中共党员几乎都对领导机关保留私营报业的目的和方针大惑不解。几位党员批评上级领导部门“办私营报的方针有问题,采取了私营路线,把报交给民主人士去办”,“对私营报不看作人民的报纸,而看作私营企业”,“向来不关心”^{注25}。有的党员在党支部讨论时说得更尖锐:“领导上将私营报纸当作花瓶,用来点缀点缀。一般机关原来把民主人士当花瓶,民主人士办的报纸自然也是花瓶”^{注26}。他们甚至怀疑说,既然领导上一再强调“上海报纸太多了”,那么把党员放在私营报业到底是想“把报纸搞好还是搞垮”,或者仅仅是“为了敷衍民主人士”?最积极的想法也只是自我解嘲:私营报纸的对象是“落后群众,小市民

群”,可能“因为上海的落后群众多些”,才需要“我们教育他们进步”,“替解放日报培养读者”,等到他们进步了,“变成解放日报的读者”,“我们的任务尽到就可以关门了”。^{注27}

低落的情绪却带来了一个亢奋的呼声:早日改为国营。这成了运动初期私营报界上上下下绝大多数人的要求。多种多样的动机也一起摆上桌面:共产党员和“要求进步者”本来就不屑与私营为伍,但还没有找到机会“另谋高就”;一部分“能力较差”的群众担心私营报纸难以维持,会“敲碎饭碗”,“被迫转业”。因此,这两种相反取向的动机殊途同归:“都希望报纸改为国营”^{注28}。

经营困境引起的思想波动自不待说,私营报的政治待遇更使报人们感到痛苦。在上海报业的新格局中,解放日报作为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机关报,享有分级别列席华东局书记办公会、上海市委常委会、市政府各委员会及行政会议的特权,许多官方文件、资料也直接送达报社。他们的记者更是以“无冕之王”的架势在各种场合通行无阻^{注29}。与党报的信息权威地位形成鲜明对照,私营报纸不但没有这些特权,而且受到新闻纪律的约束和党政机关、国营单位的歧视和冷遇,政治劣势地位时时显现。与党报政治待遇的反差促使私营报界一部分人一面对党报“牢骚很多”,对其享受的特殊权力“普遍不满”,一面却肯定私营报“迟早总是党报或公私合营报纸”^{注30}。他们寄希望于通过思想改造实现改制,进而获得与党报或公营报同等的权力和待遇。

在关注私营报业前途和自身出路的同时,各报社头面人物的一举一动也是运动初期上下注目的一个聚焦点。这不仅因为头面人物的表现往往对运动进展和结果举足轻重,更重要的,是他们被运动的领导机关赋予了特殊的角色。

思想改造运动的一般原则,是“先领导,后群众”、“先党内,后党外,党内严,党外宽”^{注31}。教育界、文艺界的领导绝大部分是共产党员^{注32},这一原则不难体现,而进入运动的上海各报主要负责人,全部为中共党外人士,先后顺序和宽严尺度就难以按上述原则操作了。因此,除了各报的中共党员在运动前“先行一步”进行了四十天的集中整风外,运动的领导机关作出了一个既不违反原则,又顾及私营报业特殊性的安排。市委宣

传部一方面将各报负责编辑工作的非中共人士全部安排进华东学习委员会上海新闻界分会学习,指定王芸生、金仲华、徐铸成、赵超构分别为各报学习支会的主持人,赋予他们领导实施思想改造学习计划的重要责任,“一切工作部署均由分会与支会讨论决定”,同时要求他们“以身作则,带头学习”,与共产党干部一起“在本报的一定范围内作检查报告”^{注33};另一方面,在学习动员前,下达了“这次思想改造不同于三反,不是首长带头,层层下水”的精神^{注34}。内定的政策更为宽松,市委宣传部上报的学习计划中提出对各报负责人中的民主人士“应坚决保护过关”,“应保证没有通不过的检讨”^{注35}。

这样的安排和政策所导致的直接后果,是这些民主人士扮演起矛盾的双重角色,既当“教练员”,又当“运动员”。由此造成了各报干群关系、党内外关系一度紧张,双方只盯住对方,相互较劲。

各报负责人对于他们的“教练员”身份格外重视,同时对“这次不是领导带头”的精神特别入耳。文汇报反映:徐铸成“一直以领导者的姿态出现,特别是听到思想改造不是领导带头后,比较麻痹”,“一直不能真正带起头来”^{注36}。徐本人也承认“开始时我也有些轻松,后又为带头而带头”。在文汇报学习支会上,徐铸成将上级所提“学习生产两不误”的口号解读为“学习、生产对半开”,“屁股坐在整风上,眼睛看着生产”,还提出“9月份是旺季,强调生产”。文汇报的中共党员一时无法应对,只能向新协党组报告说:对徐铸成“我们摸他不透,不知(他)有无自觉性”,“如何促使他们检查没办法”。^{注37}

群众的反响却十分强烈,议论纷纷。新闻界学习分会和各报支会联席会议分析运动开始后存在的问题时,最为集中的问题之一便是“这次运动与文艺界、教育界之间有何不同?为什么不(是)领导带头?”虽然在讨论中有人给予有力解释,“但有些人认为还是不能解决,因为大家对领导有很多意见。有些人说我们对领导要求高,希望领导检查,启发大家”^{注38}。文汇报的小组讨论中不但提出了同样的问题,而且给出了一个带讥讽的解释:“文艺界的领导都是党员,而且报刊上曾一再对他们提出批评;新闻界的领导水平低,和大家差不多,检查不出什么来,带不带头和我

们没有多大关系”^{注39}。领导既不能带头检查,群众自然消极观望,有些人认为这次运动“要求太低,不及‘三反’有劲”,也“不如整风、五反那样‘过瘾’”。甚至连青年团员也抱此态度,认为思想改造应该“整的是那些元老”,我们“搞新闻工作时间短,手面干净,没啥可批判”^{注40}。运动开始两周后,陈虞孙在听取各报学习情况的汇报后仍然批评文汇报“教条式的汇报,证明群众没有真正地动起来”^{注41}。

尽管上海新闻界的思想改造在矛盾和悖论中走过了最初的学习阶段,私营报界的头面人物和基层众生有种种不同的反响和表现,但是,领导者们依然认为运动“情况很正常”,并会沿着预设的轨道进展^{注42}。因为由上海新闻工作的各级领导机关组成的政治网络,既牢牢地掌握着运动的领导权,又及时了解基层的各种动向,将所有的被改造者无一例外地拢在其中。华东局宣传部和上海市委宣传部本来就是“党管报纸”的领导机关,当然在新闻界思想改造运动中负有领导责任,华东局宣传部部长夏衍,上海市委宣传部正、副部长谷牧、姚溱为领导运动的主要负责人。思想改造的计划及主要政策、动员与总结报告、进展情况的分析及对策等重大问题,或由他们亲自指示,或由他们亲临现场,都一一抓实。这两个领导机关还要随时将运动情况报告给华东局、上海市委和新闻总署,并通过他们“向毛主席汇报”^{注43}。掌控运动中各报社第一手情况的是华东学习委员会上海新闻界分会和各支会分别下设的办公室,这两个临时性组织虽然是办公机构,但与分会、支会明显不同的是,办公室由清一色的中共党员组成,陈虞孙任分会办公室主任,支会办公室也都由各报的中共党员担纲。分会办公室专门汇编了一张名为《学习》的内部小报,下发至各学习小组传阅,定期回收。新协党组也随时召集各报社的中共党员研究运动中的各种动向。分会与各报社支会以及各支会之间不定期地召开联席会议,各报社还设有联络员,随时向各种会议报告最新的运动情况。

在如此严密的组织系统的高速运作之下,上海新闻界思想改造学习动员阶段的各种不同声音迅速沉寂,运动的激进者开始活跃。当学习动员阶段接近尾声时,运动开始时仅限于“检查资

产阶级办报思想”的要求,被群众大揭发的激情所突破,“极其自然地扩大深入,去检查一切非工人阶级的错误思想与作风”,直至每个人“全面检查与交代”^{注44}。享有“特殊待遇”的私营报界的头面人物,虽然被赋予“裁判员”和“运动员”的双重身份,但也一样受到这个权力网络的制约。随着运动的推进,“裁判员”的身份迅速淡出。

从民间报人到国家干部

在各报学习支会及各小组完成学习总结,每个人填写履历表“交代历史”和进行“自我鉴定”之后,上海新闻界思想改造学习运动宣告基本结束,转入建设阶段。

虽然运动的领导人反复说明仍要以思想建设入手,要克服学习检查阶段以后产生的自满情绪或“四大皆空”、“两手空空”等“不敢碰、不敢写”的消极反应,但是,这一阶段工作重心实际上已落在解决包括人事整编在内的“机构与制度”问题上^{注45}。也就是说,建设阶段的主要任务已经突破思想改造预设“换脑不换帽”的目标,进入私营报业的制度性变革。

还在普遍揭发检查阶段刚过,各私营报的去向已有定论。除大公报北迁天津外,亦报并入新民报。这样,留沪的私营报就只有文汇、新民两家。而这两家报纸的改制问题也已提上领导机关的议事日程。10月17日,市委宣传部主管新闻工作的副部长姚溱在严宝礼要求捐献股权和私产的信上批有文汇报今后“实际上公私合营”等语^{注46}。一个月后,由陈虞孙草拟的“公私合营报社董事会暂行章程”呈送市委宣传部各位部长,姚溱批示“原则同意”,部长谷牧提出若干修改意见,私营报改公私合营的体制变革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注47}。

根据报纸调整计划,市政府决定:北迁的大公报和并入新民报的亦报共有编余人员289人,“由政府包下来”,“加上中央决定停刊的上海新闻(英文)的编余人员(约60人),各报调整人事机构的编余人员(约100人)和各私营电台改为公私合营后的编余人员(10余人)共500余人,设立新闻学校,予以训练学习,逐步助其转业”^{注48}。就私营报编余待转业的总人数约390人计,占据了参加思想改造

运动的总人数566人的一半以上,可见整编力度之大,波及面之广。

实施人事整编的任务落到了各报领导人主持下的学习支会。陈虞孙在学习分会、支会的联席会上指示各报支会主持人:“思想改造是群众性的运动,组织建设则不是群众性的运动”,“这阶段的做法强调要有领导”。因此,“大家要明确,人事调整基本上要领导决定,当然一方面要防止领导上独断独行,强迫命令”,另一方面,“尤其要防止极端民主”^{注49}。

根据陈虞孙的指示精神,文汇报学习支会慎重研究了人事调整方案,参考新闻日报、大公报的做法,结合自身情况,确定了两条整编原则:一是将指派去新闻学校参加轮训班学习的人分为两类,一类是学习结束后仍回报社工作,另一类是不回来的,转行不再从事新闻工作;二是“不回”者的标准是“思想改造中收获不大”,“政治面目不清”,以及“思想落后,能力不强”^{注50}。凡被指定“不回”者,或有“历史复杂”未搞清的,或有对思想改造“无动于衷”甚至“态度恶劣”的,或有“思想落后,讲怪话,工作不积极的”,也有各种情况兼而有之的,总之,政治表现是去留的决定性因素^{注51}。

留下继续从事新闻工作的,除了工人身份之外,不管其职位高低,全部告别了“自由职业者”身份,一律当上了“国家干部”。身为文汇报股东的严宝礼也没有被排除在外。对于迫切要求“摘帽”归公的严宝礼,姚溱不仅指示陈虞孙口头答复他仍可保存私股,“对人民利益并无妨碍”,“不必多虑”,而且说明在文汇报公私合营后,“他主要是国家干部,没有什么痛苦的”^{注52}。

从此,决定报业从业人员的职业命运的,不再是市场操控下的自由竞争和自主择业,而是权力指挥下的组织调动。正如陈虞孙在向各报部署人事整编工作时所说:“这次是否能做到如大学的院系调整的精神,大家通过建设阶段的思想提高,认识是国家干部服从统一调配,这样公布具体名单牵涉到具体人时就不至有问题”^{注53}。从自由职业者向国家干部的身份转变,标志着上海私营报业的报人们从党管国办的体制之外踏入了体制之内。

身处这个体制内的“国家干部”得到了前所未

有的待遇。国家干部身份更为重要的意义在其政治待遇。与所有的国家干部一样,从公私合营那天起,文汇、新民两报中取得国家干部身份的人,可以开始累计自己“参加革命”的“工龄”^{注54},以便为今后的政治提拔升迁和待遇提升等晋级积累不可或缺的政治资历。

享有获取信息的某种优先权则是公私合营后文汇等报获得的渴望已久的又一项政治待遇。1953年2月9日,中共上海市委向所属各部、委及各区委、党委、党组、分党组发出通知,告知“上海新闻界思想改造工作已经结束,新闻、文汇、新民三报的机构调整也已完成,这三种报纸已改为公私合营报纸”,要求“今后各有关机关和单位应给这三个报纸经过正式介绍的工作人员以必要的帮助与便利,纠正过去有意无意加以排斥的倾向”;通知还明确指出:三报“都是党领导下的公私合营的报纸,各级党委及邮局在发行工作上,不应有所歧视”^{注55}。

各报编辑部以上的干部享有更高层次的政治待遇。1月24日,上海市委据中央指示精神下达通知,其中规定,在市府党组与市府例会开会时,除请解放日报等单位的相关人员列席外,“可视必要”请“有关新闻单位的编辑部正副主任或有关组长以上干部列席”;市委各部委、各人民团体、市府各委开会时,上述相关人员也在“视必要”时被“指定列席”;市委市府召集的“局处长级干部参加之干部会议”,“一般亦吸收新闻单位的编辑部主任以上主要负责干部参加”;市委领导人至少每两个月召集一次“提示一定时间内的报导宣传要点”的座谈会,“必要时吸收各报党外负责人”参加^{注56}。

显然,具有国家干部身份的报人们所享有的种种待遇均来自国家权力。而执政者正是通过权力运作,进一步凸现党管国办的体制优势,不断增强报人们对报业新格局的认同度和向心力。

思想改造运动之前在私营报业并无大起色的中共建党工作在合营后迅速推进,曾经因私营各报党员人数太少而建立的联合党支部逐步裂变为各报独立的党组织。文汇报在公私合营之初仅3名中共党员的基础上,调进3名,在1954年8月成立中共文汇报支部,到年底共发展中共党员7名,成为有13名党员的中共支部。中共

在各报建立党组织,扩大党员队伍的工作,强化了党管报纸的内在机制。^{注57}

党管国办的体制运作既强化了党对公私合营报业的领导,又提高了体制内的办报人员对新体制的接受度。各报在报纸的性质与功能、报人的新身份、共产党的领导及其实现方式这三个基本问题上纷纷表态。文汇报在建设阶段制定的“今后的方针、方向和组织机构”这样表示:“经过了思想改造学习,已经明确了人民报纸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宣传者,是为人民利益服务、为人民民主事业斗争的有力工具”;“报纸不同于其它企业,它是生产思想的工具,是思想斗争的武器,因此,不论经营的方式如何,新闻工作者都应该自觉地成为国家工作人员、人民的勤务员”;“要把我报从旧形式的私营企业,改变成一个思想阵地上的战斗单位”,首要的是“贯彻党和政府的领导意图,加强党的领导”,在组织上,“编辑委员会是生产上的最高领导机构,是战斗的总司令部,集中掌握思想领导和具体领导”,“编辑委员会一部分有领导机关决定,一部分从本报领导同志中选拔,经上级批准聘任之”^{注58}。

由私营到公私合营的体制变革,从民间报人到国家干部的身份转换,共同构成了上海新闻界思想改造运动可告胜利结束的两大依据。报业体制变革和报人身份转换同时意味着私营报业的历史从此终结,党管国办的报业新格局由此而奠定。上海报业告别了大众文化消费市场,走进国家报业与政治报纸的新境地。■

(本文有58个注释,详见本刊网站)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原党委书记、教授)

(责任编辑 徐庆全)

本刊声明

为保护本刊和作者权益,凡转载本刊文章,请注明“转自《炎黄春秋》”。

启事

凡未收到稿酬的作者,请将联系地址、邮编和身份证号码告知我社。

联系人:肖林 电话:010-68525374

赵健民在20世纪50年代反“左”

○ 丁龙嘉



担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时的赵健民

2012年4月8日，“文革”中蒙冤受害达1.7万多人的假案“赵健民特务案”的第一蒙冤人赵健民，走完了人生之路。

我之于赵老，虽属晚辈，但相识达30个春秋，相知亦有所了解。回顾他的百岁人生，可以归纳说为民族为大众做出了十大贡献。他自青年时为追求公平正义、探索救国救民之路，而加入中共、投身革命后，于1933年7月山东省委及全省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与中央和北方局失去联系时，挺身而出，独立工作，建立济南市委、山东省工委，并历经千辛万苦同北方局接上了组织关系；于1936年9月被捕时，虽受尽酷刑，但坚贞不屈，并在公堂之上力促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进行抗日；于1937年10月获释出狱后，沉至社会下层，组织抗日武装，开展敌后平原游击战争；于全国解放战争中，率部转战黄淮、南下长江、挺进大西南；于新中国成立不久，呕心沥血，

参与领导修筑第一条铁路——成渝铁路；于20世纪50年代下半期，竭力抵制“左”的错误，由山东省省长贬至济南钢铁厂任副厂长，而锐气不减；于十年“文革”中，反对极“左”路线，蒙冤入狱达2809个昼夜，而斗争不息；于20世纪80年代初，率先退居二线，以实际行动废除实际存在的干部职务终身制；于改革开放的潮起潮落中，高度关注党的建设、民主与法制建设、反对腐败三大问题，适时向中共中央进言献策；于人生晚年的有限时光中，倾心倾力于中国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的领导、研究、传播事业。他的一生，是为社会进步而奋斗的一生，是“舍生取义”的一生，因而也是跌宕起伏的一生。

本文谨就赵健民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下半期抵制“左”的错误一事作一记述，以纪念这位为真理而奋斗的百岁共产党人。

为公求实与探索，“左”祸逼近全不觉

1952年11月，赵健民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铁道部副部长。他在铁道部工作了两年多一点的时间后，于1955年3月被任命为中共山东省委第三书记、山东省人民委员会省长。当年8月，经中央批准成立了山东省委书记处，由舒同、谭启龙、赵健民三人组成，赵兼任省监委书记。

中共在大陆执政后，党内斗争的“左”倾向向日益严重，山东尤为显著。1954年春中央发生的“高饶事件”牵扯到山东。4月下旬到6月上

北京回忆久久文化传媒
特 约 刊 登
回忆久久为您撰写回忆录
咨询热线：400-653-6199

旬,华东局第二书记陈毅到山东主持分局扩大会议,系统地揭发了山东分局代理书记向明参加“高饶反党联盟”等问题。6月下旬,陈毅向中央作了书面报告,建议撤销向明的党内职务,改山东分局为山东省委。^[1]中央同意了陈毅的报告。这期间,中央、华东局调舒同到山东主持工作,调谭启龙协助舒同工作。

赵健民为什么调任山东?据说是陈毅推荐的。原因有二。一因为舒、谭均不是山东人,而赵是山东人,熟悉山东情况。二因为1948年陈毅、粟裕野战军在冀鲁豫解放区黄河以北地区进行新式整军运动时,时任军区司令员的赵健民给予了大量的无私的援助,给陈毅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赵健民在1955年下半年到1956年7月这段时间内主要在省委工作。此时,全省正在开展肃清向明影响的斗争,揭露所谓以“向明为首的反党宗派集团”问题。1955年10月,中央批复山东省委的报告,同意开除向明的党籍。这必然株连一批干部。这期间,青岛市制造出了一个王少庸(市委书记)、葛申(公安局副局长)等人“反党宗派集团”冤案,后又发展为“反革命内奸嫌疑”案。省委分工赵健民负责专案工作。赵健民当时面临着两个问题,一是反党宗派集团的内部问题,二是放走重要特务以及私商特嫌分子存有大量电台的外部问题。赵健民经过调查研究,认为反党宗派集团没有“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根据现有材料,还没有查出有外部问题,还不能作出有外部问题的结论”,还认为开除向明党籍“手续不完备”。无疑,赵健民的工作是实事求是、严肃负责的,但使一些人对其产生了否定两案的嫌疑。

1958年5月,山东省人民委员会根据省委部署开展了“整风补课”运动,揭发出了所谓的以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卓如为首的“右派反党集团”。1956年7月赵健民从省委回省人委工作时,与王卓如在一起。他们二人,一位是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一位是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而且舒同要求赵健民“多依靠”王卓如。他们就是在这样一种格局下进行工作。1958年3月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谭震林到济南,在与舒同、谭启龙、赵健民谈话中,批评了赵健民,同时严厉地批评说,“王卓如右倾保守,

已形成障碍”^[2],并要求将王卓如下放到工厂去。这实际上也是对赵健民的一种警告。不久,在“整风补课”中开始揭发以王卓如为首的“右派反党集团”。

在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上,赵健民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八大前后,全党出现了一个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好氛围。在探索中,赵健民认为:关于社会主要矛盾,从全省农村和城市的情况看,谁战胜谁的问题已经解决,阶级矛盾变为次要矛盾;关于经济建设的规模和速度,不可不切实际地求大求快,急躁冒进,要扎实稳妥,量力而行;关于党的建设,要发扬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大胆揭露和纠正工作中的错误,并切实整顿基层干部队伍的强迫命令作风和违法乱纪行为。他在不同场所,表达了自己的这些看法。赵健民还提出要重视抓在当时还没有摆到工作日程上的丧葬改革、计划生育、文物保护等工作。在今天看来,这些观点是难能可贵的。

赵健民在主持省人委工作期间,起草了《关于加强省人委领导的试行规定》。《试行规定》是根据中共山东省第一次党代会的报告起草的。报告要求:“为了减少党委日常事物的牵扯,集中精力掌握大问题,目前要特别注意加强政府工作,建立和健全政府机关党的领导核心,在同级党委领导下,负责政府工作。”《试行规定》中写道:“凡政府工作中的重大方针政策、长远计划、年度计划、季度和全年工作安排以及其他重大问题,应经省委审核、讨论决定。”实际工作中,省人委实行书记、常委分口领导的方式。为了减少工作摩擦,赵健民要求“凡书记、常委决定的有关分口的工作,各分口的副省长应无条件执行”。赵健民起草《试行规定》,是试图探索出领导体制中的党政正确关系的路子,可谓用心良苦。自那时,中间经过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提出实行党政分开,至今日,这个问题也没有正确解决。

在新中国成立到1957年反右派之前这一时期,中共党内的民主气氛是相对较浓的,不少人敢于在党内会议上坦陈己见。在山东,党内的民主气氛也比后来好一些。如在1956年中共山东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济宁地委书记高逢五就批评舒同、谭启龙、赵健民说:“你们三个书记是南方来的,你们不了解情况,又不多和我们联系、多

听取我们的意见。”这实际上是对官僚主义作风的批评。又如在1957年山东省四级干部会议上,惠民地委第一书记李峰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提出了不同意见。这种不同意见即使是错误的,也是应该让人说话的。赵健民对待上述意见,特别是来自地方上的同志的意见,都十分重视,视为正常的事情,没有向别的方面去想,更没有有意识、有计划地去同情、支持、利用这些意见。

1957年下半年和1958年,毛泽东是意气风发。在1957年9-10月间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他在尖锐批评1956年“反冒进”的同时,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确认的在经济建设上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并在这年冬天实际上拉开了“大跃进”运动的序幕。在1958年1月和3月召开的中央南宁和成都会议上,他再次批评了1956年的反冒进,并指责为方针性的错误。批评的结果,使各地提出了一些脱离实际的“大跃进”计划。在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他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会议之后,以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的高速度、大幅度修改和提高计划指标为标志的“大跃进”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8月,他出京赴冀、豫、鲁视察,在济南发出了“还是办人民公社好”的号召。毛泽东转了一圈之后,在北戴河主持了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会后,在全国迅速形成了全民大炼钢铁和大办人民公社的高潮。以“五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毛泽东在发动“大跃进”运动中,除了使用“鼓动”的一手之外,还使用“惩处”的另一手,即对持不同意见者抓辫子、打棍子、扣帽子,理论依据就是阶级斗争。所以,他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改变了八大对国内矛盾的正确分析,断言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依然是无产阶级

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而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则肯定了他的这一断言。

在“大跃进”运动中,山东省是跟得很紧的。其中,谭震林对山东的推动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其使用的办法,亦不外乎“鼓动”和“惩处”。

在一哄而起的“大跃进”运动中,各地放的高产卫星层出不穷。赵健民家乡鲁西北的寿张县放出了亩产“5万斤玉米、3万斤小麦、5至10万斤红薯”的卫星,省委专门在这里召开现场会,推广经验。鲁西北的另一个县范县则提出了三年建成共产主义,竟得到了毛泽东的关注,批示要陈伯达、张春桥前去一看。从鲁西北农村走出来的赵健民不相信这是实事。他到范县去亲自看了看,全是假的。他对笔者说,下去视察时,地方组织群众扭秧歌欢迎,还派出一位中年妇女讲人们听不懂的哲学。他问这位妇女读了几年书。回答说小学还没毕业。赵健民一脸严肃地对笔者叹道:“小学没毕业能讲哲学?这是大众化吗?荒唐啊!”笔者脱口而出:“不是大众化,而是庸俗化。”持这种实事求是态度的赵健民,显然成为“大跃进”运动的“逆流”。

谭震林1958年3月4日在济南对赵健民的批评,使赵健民感受到了沉重的压力。批评的内容主要是三个问题:“对向、王问题认识不一致,不可原谅”,这是通牒式的敲打;“赵健民,你要注



赵健民(中)与夫人杨瑞波(左)同作者丁龙嘉合影

意,你当省长,并不要你做多少事,你的能力我们知道,你主要是巩固舒同同志的威信”,这是失去原则的批评;“你对农民的看法有问题。农民对大局的看法是清楚的,不要共产党,他不干。他只是多吃了两个鸡蛋、两块肉,看不清楚。”这后一个问题的起因是,赵健民分管政法工作,对基层严重的违法乱纪事件要求查处,如曲阜发生的逼死转业军人事件等,并没有要求处理多吃了鸡蛋和肉的农民。显然这是不切实际的、拔高的批评。

谭震林批评了赵健民之后,还不解气,又于4月14日致函山东省委,提出山东工作存在四个问题,之一是“省人委不愿意贯彻省委的指导思想”,把矛头直指赵健民。不久,他又指示说:“给你们把火放起来了,你们为什么不斗争?!”“放火”是指4月14日他给山东的信,“不斗争”是指舒、谭没组织斗争赵健民。这时,赵健民虽然感受到了沉重的压力,但没有察觉到大祸就要临头了。

仅过了一个多月,谭震林于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期间的5月22日再次批评了赵健民:“向、王专案是大是大非问题,你站在非的方面。你有情况不给我讲,而给邓小平、安子文、李先念讲。”当是,邓小平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安子文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先念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且李先念亲自找赵健民了解向、王专案中的吴若岩问题。一位省长向中央领导同志、向组织部门谈意见、反映情况,何错误之有?若认为是告状,那种状为何不能告?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谭震林作了关于农业发展纲要(第二次修正草案)的说明,这是适应“大跃进”运动的说明。八大二次会议结束后召开了八届五中全会,谭震林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无情“火烧”残酷斗,铁骨铮铮不回头

进入6月,“火烧”赵健民的斗争开始了。山东省委召开了整整25天的常委扩大会议,进行“整风补课”,重点是批判山东地方主义、分散主义、宗派主义的总代表和反冒进的急先锋赵健民。开始,赵健民虚心听取意见,哪怕是错误的意见;进行检讨。后来,许多批判越来越离谱,由

渲染、夸大、歪曲发展到颠倒黑白、以是为非、无中生有。特别是舒同,以向、王专案问题批判赵健民说:“表面上态度暧昧,不讲话,而实际上是支持他们的。支持的目的,无非是利用他们。利用这些人,无非是要把省委搞掉,由健民同志取而代之。”无任何证据而下此断言,无非是害怕赵健民取代自己罢了。当赵健民写出第三次书面检查向舒同汇报时,舒同讲:“还没有和盘托出,你个人野心问题还没有拿出来。”赵健民回答:“我没有。”舒同就说:“你不老实。”赵健民大义凛然地声明:“我可以党籍和人头来做担保。”舒同要逼赵健民承认欲取代自己。不久,舒同对赵健民讲:“你的党籍危险。”这是告诫,还是威胁?显然是后者。

8月9日,毛泽东来到济南视察。谭启龙在汇报时,毛泽东问山东跃上来了没有,谭启龙回答说,跃是跃上来了,但比河南、河北兄弟省差一些。毛泽东鼓动山东向江苏学习,帮助省里整风,掀起“大跃进”运动高潮。当谭启龙汇报说,现在除了赵健民的问题外,省人委以王卓如为首的“右派反党集团”的问题已经解决,毛泽东问是如何解决的,谭启龙回答道:在机关大鸣大放,用大字报揭露王卓如包庇右派,“搞独立王国,一直反对省委的冒进,甚至造假账,搞两本账,粮食紧张时,隐瞒粮食不报省委。”^③毛泽东又问,那是王卓如搞的,还是赵健民搞的?谭启龙说,地方主义的头子是赵健民。又说,赵健民讲阶级斗争熄灭,讲敌我矛盾退出历史舞台。毛泽东紧接着说道:“他自己还没有退出历史舞台。”^④出自最高领袖的这句话,分量重千斤啊!

上有毛泽东、谭震林,中有舒同、谭启龙,下有一大群趋炎附势者,赵健民陷入了日甚一日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之中。

最令赵健民难以置信、无法容忍的是,10月14日山东省委《关于赵健民同志的错误向中央的综合报告》中歪曲事实、充满谎言。这份报告给赵健民罗列了多项罪名,主要是:(一)为向明、王少庸“反党宗派集团”翻案;(二)纵容、支持、包庇王卓如“右派反党集团”;(三)“自1956年以来,一直抹杀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绩,成为反对‘冒进’、夸大落后的代表人物,处处和省委唱‘对台戏’”;(四)“在组织方面要求

同省委分权,自成中心,自成系统,与省委分庭抗礼,使省委的决议指示不能通行”;(五)“对山东的地方主义分子反对省委的领导,反对舒同、谭启龙同志,一直抱着暧昧的态度,并和一些有严重地方主义的分子之间有一些隐蔽活动”。^{注5}赵健民看着这份报告,怒不可遏,连声斥责道:“诬陷,诬陷。”下定决心要讲明情况,反驳诬陷,弄清是非曲直。

这位地下党时期的省委组织部长,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军分区司令员、军区司令员、第二野战军第十七军的政委兼军长,在面对着敌人淫威的时候,有的只是战斗的勇气,从未感到冤屈,而在执政后面对着一同从战火中走过来的同志的不实之词的时候,百思不得其解,冤屈之情难以下咽。夜,已经很深了,他难以入睡,只能靠一次又一次地吃安眠药稍睡片刻。他深深地感受到了世态的炎凉,昔日门前车水马龙,今日是门可罗雀。夫人杨瑞波和秘书屠荣举害怕他扛不住巨大的压力,力劝他将战争年代保留下来的一支心爱的小手枪交公。他苦笑着说:“我不会寻短见。”但他还是将心爱之物交了公。

1959年1月24日至2月5日,中共山东省第一次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召开。会议之前,用了20天的时间举行了预备会议,专门揭发、批判以赵健民为首的地方主义、分散主义、右倾机会主义。这时,好心人传来了邓小平的忠告:“适当检讨,保住党籍。”邓小平的意思很清楚,要留在体制之内,若到了体制之外,以后事情就难办了。也许,这八个字起了作用,赵健民决定实事求是地说明情况,理直气壮地反驳诬陷,实实在在地检查错误。

1月12日,赵健民在预备会议上进行了全面申辩。这天的会议,恰好是由到任不久的中共山东省省委常委、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主持。抗日战争中,杨得志曾任冀鲁豫边军区司令员,赵健民任其下属的鲁西北军分区司令员,杨了解、同情赵。他告诉赵健民,上午讲不完,下午可继续讲,示意给赵健民以充裕的时间,让赵健民尽量地申辩。

赵健民的申辩对与会人员的心理产生了什么作用,笔者不得而知。2月5日,是中共山东一大三次会议结束的日子。这一天,会议做出《赵

健民等同志所犯错误的决议》,认为赵健民所犯“错误的实质,是打地方主义旗帜,走资本主义道路”;决议“撤销赵健民同志省委书记和常委的职务,仍保留省委委员,责令其进一步检查交代自己的错误,并下放基层锻炼,在实际工作中改正错误”。

会议表决时,赵健民提出了保留意见。不久,赵健民被任命为济南钢铁厂党委第二书记、副厂长。从省长到副厂长,虽然有一个巨大的落差,但毕竟保住了党籍。杨得志后来对赵健民说:“会议表决时,我心里直打鼓,担心一举手党籍就没了。”好人杨得志啊!

从决议中看,虽然给赵健民扣上了三项帽子,但是实质是“地方主义”,因怕“地方主义”不足以置赵健民于死地,又加上了一句“走资本主义道路”。实际情况是,赵健民怎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材料一点也没有。对于山东1958年反对地方主义一事,笔者至今也不清楚其准确含义是什么,也没有发现中央有关反对地方主义的文件。可当时又不止山东一家反对地方主义,如广东将省委书记古大存、副省长冯白驹等打成“地方主义反党集团”;甘肃将副省长孙殿才、陈成义等打成“地方主义右派反党集团”;青海将省长孙作宾等打成“地方主义右派反党集团”。根据历史事实,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地方主义”:部分本地干部,因对于实际情况的了解而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抵制或反对党内斗争、经济建设、“大跃进”运动中“左”的或极“左”的错误,被强加给的罪名。

这项莫须有的罪名,打击的不只是赵健民等“一小撮”,而是“一大片”领导干部,仅中共山东一大三次会议的决议中就列出了下列长长的名单:

犯严重错误的有:

省委书记李广文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卓如

省委委员、副省长袁子扬

省委委员、省妇联主席王月村

省委委员、省委党校副校长田海山

省委候补委员、财贸部副部长张耀曾

省委常委、济南市委书记王路宾

省委委员、青岛市委书记孙汉卿

省委候补委员、淄博市委书记张国中



晚年时的赵健民

省委候补委员、济宁地委第一书记高逢五
惠民地委第一书记李峰
泰安地委代理书记曹礼琴
菏泽地委副书记扈国华
省委委员、滨县县委书记傅爱农
省委候补委员、原省供销合作社主任、金乡县
县委书记李瑜
犯错误的有：
省委书记夏征农
省委常委、政法部长刘秉琳
省委候补委员、昌潍地委第一书记陈洪波
何止如此。据有的资料说，1958年山东省的“整风补课”，省直机关中受到“重点补课”（遭到不白打击）的厅局级干部占21%、处级干部占14%，县委委员一级的干部占12.9%。^{注6}“左”的错误造成的结果可怕呀！

“七千人大会”再发声，至今长留时空中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七千人大会”。赵健民以中央候补委员的身份出席了大会。

会议期间，76岁高龄的朱德在山东组的会议上对民主问题讲了一番十分中肯的话：“只要领导人肯征求群众意见，民主讨论，集中起来，坚持下去，从省、地、县到支部都这样，工作就好作

了。”他为什么没说“中央”呢？难道中央例外吗？不例外。那就是，或者因疏忽而漏掉了，或者有难言之隐。

赵健民在山东组作了系统的发言。此时，虽然中央因山东日益严重的饥荒而由曾希圣取代了舒同的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但是如何解决舒同的问题尚无结果；虽然省委根据中央指示开始甄别和处理党内斗争案件，但是如何处理赵健民一案尚不清楚。在这种背景下，为了明哲保身，赵健民可以少说话，说空话、套话。但阅读他的发言，可以感受到他的忧患、实在和理性。

赵健民的发言共讲了六个问题，分别是：（一）对中央这次会议的看法；（二）对省委的看法；（三）关于接受舒同错误教训的问题；（四）对谭震林同志提点意见；（五）我个人的错误；（六）几点意见。重点是第三、四部分。

赵健民认为：“舒同的错误是很严重的，是特殊性的，对山东党和人民造成的恶果与损失是很痛心的。这样的错误，按一般情况，是不应该在新中国建立以后出现的，是本应较早予以制止的。”他列举了三个重要的数字：“一年半时间中非正常死亡达65万人（实际要多于此数），荒地五六千万亩，发生人吃人的事件几十起。”笔者认为这里的“一年半时间”是指从1959年到1960年上半年。他又列举了一个典型事例：“到1960年春，益都县洋河公社死亡1000多人，全县上半年死亡2万多人。”他带有警示的语调说：“这样严重的错误，未能较早地揭露、制止，这是我们党今天所不应犯的错误！”^{注7}

为什么会发生如此严重的错误？赵健民认为：“主要是舒同的封建特权思想作怪，发展了党内的过火斗争，破坏了党内的集体领导，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打击向中央反映真实情况的人，破坏了党的战斗力”；另一方面是省委其他领导成员“未能以人民利益为重，坚决与之斗争，坚决向中央反映情况。”^{注8}

赵健民专门解剖了舒同在党内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问题。他说舒同：“不实事求是地在党内搞过火斗争，以树立自己个人家长式的领导。”三年中，使全省的市地委书记和厅局长以上

干部70多人受到撤职处分,党员9万多人受到处分,“这实际上是摧残党的战斗力”。更为严重的是,“造成党内是非混乱、互有戒心、不敢讲话,破坏了党的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破坏了党员的权利与义务”。他总结说:“党内斗争,不要说如果实事求是可以不会出这么大的偏差,如果不抓辫子、戴帽子、打棍子也不会出这么大的偏差。”他的结论是:“我们要维护党的利益,使党章不受破坏。按章办事,决不会出现舒同这样大的错误,决不会使人民受这样大的损失。”^{注9}

谭震林在“七千人大会”上有一个检讨性的发言,他说自己助长了下边的共产风、浮夸风。赵健民认为他是“干扰了毛主席的思想,把毛主席的思想向‘左’拉”,同时说他“强迫命令,主观主义”,“是抓辫子、戴帽子、打棍子的这类情形”,接着列举了谭震林在山东的一些错误做法。^{注10}

赵健民的发言有一个鲜明的现象,即将舒同的严重错误、谭震林的错误同毛泽东联系起来。他说舒同“在每一次党内斗争中,都是说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中央的指示,符合毛泽东思想。实际上是抓住一个机会斗争一批”。他在谈到谭震林与山东党内错误斗争的关系时说:“有的同志会问,山东这几年斗了这么多干部,中央为什么不管?也怀疑中央和毛主席了。”^{注11}在当时提出这样的观点,不能说不深刻,更不能说不大胆。但不知道毛泽东是否了解,是否下决心要赵健民“退出历史舞台”。反正到了“文革”中,赵健民是退到监牢中去了。

1961年6月,中共中央指示对最近几年来受过批判和处分的党员、干部实事求是地进行甄别工作。山东省委根据中央的指示,成立了专案组,对赵健民的“错误事实”逐条作了查证。1962年2月21日,山东省委向中央并华东局上报了甄别结论的请示报告。报告中说:“经过这次甄别工作,我们认为1958年对赵健民同志的批判斗争和所作的结论与处分都是错误的。”^{注12}1962年10月20日,中央组织部、中央监委对请示报告作了批示:“中央同意你们对赵健民同志在1958年整风补课时所受处分的甄别处理意见,取消原结论和处分,恢复原级别,并在原斗争范围内公布甄别结论。赵的工作问题,已经与柯庆施同志、谭启龙同志商定,调出山东。”^{注13}

在此前后,所谓“向明、王少庸反党宗派集团”,“王卓如右派反党集团”也得到了平反。

据1962年底公布,自1958年以来的历次运动中,山东全省受批判、处分的党员、干部共29.66万人,甄别了其中的29.08万人,占到98%。^{注14}

据1963年12月公布,在1958年“整风补课”、拔“白旗”,1959年反右倾、反瞒产私分,1960年冬和1961年春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等运动中,山东全省被重点批判、处分的党员干部和一般党员为14.7万多人,非党干部为14.8万多人,工人和农民群众为24.2万多人,总共为53.8万多人,共甄别53.7万多人,占总人数的99.89%。^{注15}

读者看完这两组数字,有否感到这是一场浩劫呀?!当然,这场浩劫,比较十年“文革”那场浩劫,是小巫见大巫了。然而,“大巫”是由于“小巫”积累、发展而成的。

注释:

注1、注14、注15 《中共山东历史大事记》,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3月第1版,第194页,第412页,第439页。

注2、注5 《赵健民文集》,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6月第1版,第425页,第417至461页。

注2、注6 《中国改革》,总第332期,第112页,第116页。

注7、注8、注9、注10、注11 《赵健民同志在中央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

注12、注13 《中共党史人物传》第84卷,第116至117页。■

(作者为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责任编辑 徐庆全)

本刊稿件选用标准

一,本刊重点关注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特别关注亲历者的叙述。

二,内容真实可靠,不可有任何虚构。文中重要引语,请注明出处。

三,篇幅不要过长,一般四五千字,长篇最好在八千字之内。

四,原则上一稿一投。如一稿多投请予说明。

五,投稿三个月以上,未接到采用通知,请作者另行处理。作者请自留底稿,本刊无力退稿。

本刊社址:北京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政编码:100045

本刊电话:010-68534879

传 真:010-68532569

编辑部邮箱:yanhcq@sina.com

yanhcq@gmail.com

“民主集中制”的由来与演变

○ 应克复

“民主集中制”提出的初衷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首次提出“民主集中制”这一概念的是列宁。不过,列宁开始提出时是“集中制”,那是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说:“作为党组织的基础的基本思想,实际上可以归结为以下两点。第一个思想,即集中制思想,是从原则上确定了解决所有局部的和细节的组织问题的方法。”这“是唯一的原则性思想,应该贯穿在整个党章中”^①。“集中制要求中央和党的最遥远、最偏僻的部分之间没有任何壁障”,“中央有直接掌握每一个党员的绝对权力。”^②

1904年,卢森堡对列宁的“集中制”思想提出了批评意见。她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一文中,虽然也认为集中制对于改变党组织的分散性是必要的,但她强调,集中制根本不是在工人运动的任何阶段都可以实现的绝对概念;社会民主党不能建立在党的战士对中央机关盲目听话和机械服从的基础上。按照列宁集中制的原则,“中央委员会成了党的真正积极的核心,而其他一些组织不过是它的执行工具而已。”卢森堡因此认为列宁的集中制是“极端的集中主义”、“无情的集中主义”。她还认为,如果党内由党的中央机关的统治来代替大多数人的统治,由中央委员会对工人阶级活动实行监督来代替工人群众对党的机关活动的监督,“那就是错误的”。她还说,“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一部分人力图使充满希望的、生气勃勃的工人运动通过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中央委员会的托管来防止失败”,这不免是一种“主观主义”^③。

针对卢森堡的批评,列宁在1905年将“集中制”的概念更改为“民主集中制”的概念。列宁申明,集中制有专制主义的集中制、官僚主义的集中制,而俄共所实行的则是民主的集中制。也就

是说,集中制有两种。1905年12月俄共第一次代表会议上,列宁对民主集中制补充了它的民主方面的内容。列宁说:“党是根据民主的原则组织起来的。这就是说,党的一切事务由一律平等的全体党员处理或者通过代表处理;并且,党的所有负责人员、所有领导人员、所有领导机构都是选举出来的,是必须向党员作报告的,是可以撤换的”。^④1906年俄共四大所通过的党章规定:“党的一切组织是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

这就是“民主集中制”的提出到确立的简单过程。

尽管列宁称他所提出的集中制标以民主的集中制,但其重点是“集中”,这一贯为列宁所强调。譬如,1920年列宁仍强调:“无产阶级的无条件的集中制和极严格的纪律,是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⑤列宁还认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而无产阶级专政要求在党内仍“需要实行极严格的集中制和极严格的纪律”^⑥。“谁要是把无产阶级政党的铁的纪律哪怕是稍微削弱一点(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那他事实上就是帮助资产阶级来反对无产阶级。”^⑦

列宁还将集中制的原则推广到了第三国际。1920年7月,他在《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的报告中,将“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起来”(重点号为原文所有)作为加入共产国际的重要条件。他强调:“共产党必须按照高度集中的方式组织起来,在党内实行像军事纪律的铁的纪律,党的中央机关必须拥有广泛的权力,得到全体党员的普遍信任,成为一个有权威的机构。只有这样,党才能履行自己的义务。”^⑧他还指出:“凡是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应该称为:某某国家共产党(第三共产国际支部)”。各国党必须听命于共产国际的领导,对此,中国共产党是有

深刻的体会的。按照集中制的原则组织起来的第三国际是与第二国际的一个显著差别。正如列宁所说：“共产国际是在非常激烈的国内战争的情况下进行活动的，因此，它应当比第二国际组织更加集中。”^{注9} 列宁十分强调集中，但全面考察他的治党思想，也有其民主的思想遗产。概而述之：1. 党的代表大会是全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应每年举行之；2. 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会是大会的执行机关，必须向代表大会报告工作；3. 在党内设立与中央委员会相并行的监督机构，对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实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发表讲话，强调要发扬民主。

行监督（地方类推）；4. 党代表大会代表经党员民主选举产生，党的中央和地方机关的领导人经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并可以撤换；5. 党代表大会和各级机关党委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当少数的意见遭到否决后少数者必须执行组织决定，但在思想上仍可保留并宣传自己的主张；6. 党员在党内有发表自己意见的自由。列宁在世时是努力实现上述思想的。不过，列宁的治党思想的双重性，以及由于当时所处的环境使他更多地强调集中，为斯大林日后通向个人专制留了一条门径。斯大林主政后，为强化个人集权，急剧地扼制党内民主，通过消灭所谓“反对派”使民主化为乌有，使民主的集中制蜕变为极端的集中制、恐怖的集中制。

中共实践的“民主集中制”

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的中国共产党自然是以“民主集中制”作为自己的组织原则。将这一原则正式写入党章的是中共六大（1928年7月）。六大党章规定：“组织原则：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其他支部一样，其组织原则为民主集中制。”^{注10}

中共七大（1945年5月）党章对民主集中制

作了如下概括：“民主集中制，即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领导下的民主”^{注11}。这一概括影响十分深远。

什么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什么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刘少奇在七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出版后改名为《论党》）中作了解释。关于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刘少奇说，党的领导机关是由党员选举出来的；党的决议是从群众中集中起来的，并由党员的代表们所决定的；党的领导机关的权力是由党员群众所授予的；党内的秩序，是由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

原则建立起来的。因此党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不是离开民主的，不是个人专制主义。关于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刘少奇说：“党的一切会议是由领导机关召集的，一切会议的进行是有领导的，一切决议和法规的制订是经过充分准备和仔细考虑的，一切选举是有审慎考虑过的候选名单的，全党是有一切党员都要履行的统一的党章和统一的纪律的，并有一切党员都要服从的统一的领导机关的。这就是说，党内民主制，不是没有领导的民主，不是极端民主化，不是党内的无政府状态。”刘少奇还指出：“党内民主的集中制，即是党的领导骨干与广大党员群众相结合的制度，即是从党员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党员群众中坚持下去的制度，即是反映党内的群众路线。”^{注12}

在中共七大前5年，即1940年，毛泽东在阐述“新民主主义政治”时就明确提出，未来的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注13}到了1945年的中共七大，毛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更明确地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权组织，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说，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注14}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刘与毛对民主集中制的表述完全一

致：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一表述从此便成为经典，影响至今。二是那时的毛已不再将民主集中制局限于党内，已拟确立为国家制度，直至今日成为宪法的基本条款。

中共九大、十大是在“文革”期间召开的。十一大（1977年8月）是在“文革”结束后不久召开的。这三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党章，“大大地向后退了，特别是把民主集中制搞乱了”。^{注15}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经历“文革”之后、中共开始复苏的一次转折性会议。会议公报也谈到了民主集中制，指出：“由于在过去一个时期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强调民主和集中的辩证统一关系。”^{注16}三中全会对过去实行民主集中制的情况虽进行了反省，但上述表述有两点值得注意：1. 依然把民主和集中看成是民主集中制的两个侧面；2. 指出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意味着到了某一时期就需要强调集中了。不久以后所发生的情况证明了这一点。

中共十二大（1982年9月）对民主集中制的提法有重大改变，提出“在高度民主的基础上实行高度的集中”，放弃了从七大以来所一贯强调的“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的提法，并规定了民主集中制的六条基本原则。

这六条基本原则是：

（1）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

（2）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除它们派出的代表机关和在非党组织中的党组外，都由选举产生。

（3）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它所产生的中央委员会。党的地方各级领导机关，是党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和它所产生的各级委员会。党的各级委员会向同级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4）党的上级组织要经常听取下级组织和党员群众的意见，及时解决他们提出的问题。党的下级组织既要向上级组织请示和报告工作，又要独立负责地解决自己职责范围内的问题，上下级组织之间要互通情报、互相支持和互相监督。

（5）党的各级委员会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凡属重大问题都要由党的委员会民主讨论，作出决定。

（6）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要保证党的领导人的活动处于党和人民的监督之下，同时维护一切代表党和人民利益的领导人的威信。

十四大、十五大通过的党章重申了这六条基本原则（其中（4）、（5）两条文字略有增加）。但在总纲中恢复了“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的传统提法。十六大和十七大的党章总纲中，都重申“坚持民主集中制”，重复“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的提法。这是值得重视的。

中共从六大（1928年）民主集中制的确立到十七大（2007年）已有80年的历史了。其间贯彻最力、影响最大的是七大对民主集中制的概括，即“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可能是鉴于“文革”的沉痛教训，十二大、十三大没有出现“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一提法，但到了十四大、十五大，以及十六大、十七大，又恢复了这一提法。以笔者之见，中共贯彻民主集中制80余年来最大的问题、也是最难解之结，恐怕就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

所谓“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按刘少奇的说明，大凡民主生活中所要解决的各种问题，诸如召开大会，作出决议，选举领导机关和领导人，都是在领导者的指导、安排下进行和实现的。显然，这种民主不过是将领导者的意志化为群众的意志，将领导者的号召化为群众的行动；其间即使允许发表一些不同意见，但以不违背领导的基本构想为前提，即必须在政治上与领导者保持一致。所以，这种民主，很容易实为主民、训民也。主民者，为民作主、代表人民决定人民之命运也；训民者，教化人民、使之成为驯服工具也！民主既然为集中所驾驭，所以贯彻民主集中制可以归结为以下一个公式：集中—民主—集中。前一个“集中”是领导者的构想、方案、计划等等，后一个“集中”是经过“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成为全党全民所认可的决定、章程、制度等等的“民主成果”了。问题在于，民主要由集中作指导，使它在一开始乃至整个过程中不可能超越集中的框架与轨道。我们知道，党的多次代表大会都提出或规

定过党内民主的一些内容,但在实际生活中都难以实施。七大与八大的党章在民主方面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特别是邓小平在八大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对健全党内民主方面提出了富有开拓性的意见,但结果都没有得到贯彻。即使“文革”之后的十二大、十五大所通过的党章中关于民主集中制的六条基本原则中有关民主方面的规定,又有多少是兑现的呢?另一方面,集中和集中领导下的民主总是做得很到位。

还须说明,“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是中共的创造。这一提法并不符合列宁提出的民主集中制的初衷。列宁主张的是民主的集中制,即这个集中制是民主性质的,或是通过民主的方式、程序所实现的集中制。至于党内应该有哪些方面的民主以及如何实现民主,列宁也提出了一些意见,但他没有说过,要在集中指导下去实现民主。

对“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一提法,是否出现过不同意见呢?到现在为止,我们发现对此提出质疑者仅一人,就是蔡和森。他在《党的机会主义史》(1927年)中写道:“……另一方面,民众的党内生活全未形成,既无党的讨论,又无选举制度……务使下级党部完全依赖上级党部的指导,党里完全是听从号召的士兵。……真是铁的组织铁的纪律一般,可是伏在里面的危机是很大的。……养成的习惯是:只有上级机关的意见和是非,而没有下级党部及群众的意见和是非。……铁的纪律成了威压党员的工具,而上级指导人却有超越此铁的组织 and 铁的纪律的一切自由。”^{注17}蔡氏这一卓见长期尘封,鲜为人知,即使在今天,仍弥足珍贵。

“民主集中制”概念的逻辑

民主作为一种制度在运作过程中已经包含了集中。有哪一种民主最后没有集中呢?除了无政府状态的大民主,凡是制度化程序化的民主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强调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最后都必然产生集中。如作为民主最基本形式的选举,最后必然产生集中:从候选人中产生正式当选人。如议会通过一项法案,经过一定的民主程序最后也必然产生集中;通过或否定该项法案。既然民主本身已经包含着集中,因而就没有必要再加进一个“集中”的概念。

概念中的这一逻辑矛盾使这一制度带有先天性的缺陷。譬如,既然集中制是民主的集中制,那就必须规定如何通过民主的程序来达到集中。遗憾的是,无论是俄共还是中共的党章中,或者是缺乏这样的规定,或者虽规定了民主的某些内容,但它对于集中并无内在的逻辑关联,或者说,它对集中并不存在保障民主的制约关系。那么,这种“民主”能有多少实际意义呢?

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以十二大、十五大的党章中的第十条关于民主集中制的六项基本原则(上述已列)来加以说明。这六项规定,大部分都是民主方面的内容,这是令人欣喜的。可是它对集中存在何种制约关系呢?我们所见到的,只是既有民主的内容,又有集中的内容,两者平行罗列,却没有经过民主达到集中的清晰概念。这样的民主尽管规定得很多,但集中归集中,民主归民主,它们是两股道上的车。

例如,六项基本原则的第一条(它历来被认为是民主集中制的精髓),就存在这一缺陷。

该条原则是:党员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

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

这“四个服从”中,既有民主的内容(少数服从多数),也有集中的内容(其余三个服从)。有人因此提出了民主集中制到底是“少数服从多数”还是“多数服从少数”的疑问。

王贵秀认为,“民主集中制”的本质是“少数服从多数”。他将“民主集中制”定义为:“民主集中制是以少数服从多数为基础的集中制”。他指出,“四个服从”中只有“少数服从多数”是最基本、最一般、最本质的原则,其他几个“服从”虽然也是重要原则,但毕竟是由“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决定的,派生的。他的理由是:第一,党的“组织”、“上级”和“中央”是在相应的范围内和层次上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选举产生的;第二,“个人”、“下级”和全党各个部分所服从的决策、决定是被选举产生的“组织”、“上级”和“中央”在各自的范围内和层次上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出的。据此,王贵秀认为,这几个服从,归根到底都是建立在“少数服从多数”的基础上的,受“少数服从多数”决定和制约的。

王贵秀的分析将“四个服从”中的“少数服从多数”与其他三个服从之间的内在联系作了阐释,说明“少数服从多数”是四个服从中最基本、最本质的原则,是其他几个服从的基础。但这一分析不是对历史和现状的概括,而是他对四个服从内在关系的一种纯逻辑分析;而实际生活却是另一番情形。在历史和现实的环境中,更多的情况是党内多数人的意愿必须服从少数人的意志。“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往往徒有虚名,通行的潜规则是“多数服从少数”,甚至“全党服从一人”。这种情况,我们切不可忘。

再说,“少数服从多数”充其量只能是一个准民主的原则。现代民主观认为,少数与多数同样重要,在某种情况下甚至比多数要重要得多;只是在有关公共生活的重大问题上只能按“多数决定”行事,但对少数人的意愿同样给予尊重与保护,否则便是“多数人暴政”了。所以,现代民主奉行“多数”与“少数”并重的原则,它不要求少数绝对地服从多数。考茨基认为:“保护少数派是民主发展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其重要性并不亚于多数派的统治。”至于在文艺、学术、信仰等领域

更不能搞“少数服从多数”了。中共对“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即使实行得较好时期,也只能允许少数保留自己的意见,但也往往因此受到歧视性待遇,得不到信任与重用。在专制主义盛行时代,党内或国家机关通过重大决定时往往出现“一致通过”的“盛况”,原因是少数者一旦表明自己的态度,便会受到迫害。这说明,在“少数原则”没有确立的地方或时候,便没有民主。

毛泽东的集中主义思想

要从集中制的羁绊中解脱出来,还必须对毛泽东就这一问题的有关言论作一清理。毛自1943年确立为中共的首脑人物之后,其威望日增。中共七大,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建国后,他的思想又成为国家的统治思想。毛的思想其影响超越了他主宰中国的年代。鉴别他的思想,以便跨越集中主义的屏障,是一个颇为艰难而紧要的任务。

1.民主与集中,何者更为重要呢?毛泽东早在1942年就明确回答:“共产党不但要民主,尤其要集中。”如果不懂得这一点,就“不懂得党的民主集中制”。集中高于、重于民主,明白无误。毛后来进一步说明:“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目的是什么呢?是集中。所以毛说:“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本文已经说明,民主本身已包含集中,但毛泽东将集中确立为一个独立于民主之外和之上的目标,而民主只是达到集中的“一种手段”。毛的这些言论,十分明白地告诉人们,共产党是要民主,还是要集中?也告诉人们,民主集中制的出发点是民主还是集中?

2.民主与集中的关系,有时候也出现一种折中主义的倾向。毛泽东说,民主与集中是“两个矛盾着的侧面,它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我们不应片面地强调某一侧面而否定另一个侧面”。这里,首先是将民主集中制分解为两个相对独立的侧面,这不符合民主集中制概念的本义。按其本义,民主是制约和限定集中的,集中决不能游离民主而自成侧面,否则成了另外一种性质的集中制了。其次,在分解为两个侧面之后,孰轻孰重、谁主谁从呢?毛的回答是,不能片

面地强调某一个侧面而否定另一个侧面,这就是,既要民主,又要集中。这里的问题是,本来是统一的一个东西,现在变成了两个东西,而且又要不分主次以同等的态度去争取它;可是,实际的执行却不可能这样(且不说这种态度与“共产党不但要民主,尤其要集中”之说相抵牾)。根据情势的需要,有时(如1978年思想解放那段时间)强调民主多一些,更多情况下强调集中多一些是常有的事。如中共十



1982年9月1日至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大会提出民主集中制的六条基本原则。图为大会会场。

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所称:“过去一个时期内,离开集中讲民主,民主太少,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这意味着,到了另一个时期就应当强调集中了。以后的历史发展完全证明了这一点。由此可见,折中是不可能的,结果总是倾向于集中。

3.怎样实现民主呢?毛泽东在1956年强调:“我们主张有领导的自由,主张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他说,有些人以为在我们的人民民主制度下自由太少了,不如西方的议会民主自由多。从那以来,有领导的自由,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成了不得违抗的国规了。如果说,七大提出“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一规则还只是在党内实行,自那以来则是国家政治生活的准则了。中国特色的民主“特”在哪里呢?就在于,民主是在集中指导下实现的。譬如,议会作为近代以来民主的象征,是伸张与凝聚民意的机关,但移植到中国以后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虽然1954年我国也组织了这样的代议机构——人民代表大会,并被宪法确定为最高的国家权力机构;人民作为国家主人就是通过这一机关表达他们的意志、行使他们的权力的。但在人民代表大会之上还有党,“人大”应在党的领导下行使它的职权;也就是说,在最高权力机关之上还有更高的权力机关。这就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在人大工作中、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运用。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我们这种形式的民主比西方国家民主有着更多的民主与自

由。这种民主形式的实施已半个世纪了,即使不与西方的议会制度作比较,就自己所走过的道路进行反省与总结,也可以深知其弊端了。最关键的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是严重违背民主原则与宪政精神的。中国的人大在很长时期内“一致通过”是常规,西方的议会里有反对票和弃权票才是常规。在中国的人大,发表领袖所不高兴听的意见必遭厄运,在西方的议会里,反对当局的政策,与政府首脑唱点反调是正当的权利。如此等等。既然在最高国家权力机关里民主之处境如此可怜可悲,那么普通公民还能享受多少民主呢?或许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与西方国家的民主党、共和党、自由党、工党、社会民主党等等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即中国共产党是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因此,人民在行使各种民主权利时必须要有党的集中指导:党把人民指向火海,人民就奔向火海;党把人民带向天堂,人民就升上天堂。人们常常感叹,由于民主集中制没有贯彻执行,因此产生这样或那样的不幸后果云云。这实际上是莫大的误会。应当说,民主集中制是一以贯之地得到有效贯彻的,正因为得到不折不扣地贯彻,才发生这样那样的不幸后果。

4.民主必须有集中作指导,还可以从毛泽东对民主的界定中得到进一步说明。毛泽东认为,民主就是向人民进行教育,这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毛在《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里就写道,解决人民内部的问题,“使用的方法,是

民主的即说服的方法,而不是强迫的方法”。在1950年6月的第二次政治协商会议上的讲话里,又说到:“人民民主专政有两个方法。对敌人来说是用专政的方法”,即“强迫”的方法。“对人民来说则与此相反,不是用强迫的方法,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即“向他们进行教育和说服工作”。到了1956年,毛又重申:“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

民主,是对人民进行教育。通过教育使他们提高觉悟,抛弃原来不正确的认识;使他们理解党的政策和指示,自觉地加以贯彻执行;使他们改掉缺点与错误,改善与领导的关系,消除同志间的隔阂;使他们履行公民的义务,更好地遵守国家的法律法令,如此等等。对人民进行说服教育,而不是压服,这就是民主。这种对民主的理解是否妥切,暂且不论。以对人民进行教育而论,就有一个教育的主体问题,即谁来向人民进行教育呢?不言而喻,这个主体就是人民的领导者,享有各种权力的大小官员是也。领导者向人民进行教育,内中蕴涵着一个提前,即领导者在任何时候、任何问题上总是比人民高明、正确,领导怎么说总是有理的。因此,领导者总是教育者,人民总是被教育者。民主为什么必须有集中作指导,原来如此。那些领导总是高瞻远瞩,明察秋毫,统筹全局,千千万万芸芸众生的老百姓为了不致迷失前进方向,必须接受领导的教育;还必须懂得,接受教育就是享受着民主的权利。但这样的民主恰好与民主的本义相背。因为民主应当是公民有参与国事、监督政府、揭露官员的失缺之权,以此使得政府官员不敢滥用权力、违背民意。所以,民主是人民选择与监督政府之权,而不是相反。“教育人民说”决不能认为是在实行民主,称为训导人民的做“驯服工具”或许更为恰当些。

毛泽东还有一个经典的公式:“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对派的专政方面,互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注意这里的“对”字。虽只一字,十分关键,也反映了毛泽东的民主观。“对人民实行民主”,就是说,在人民之上,有

一个主,它解放你,领导你前进,还给你民主。于是,民主之多少与有无,给的是什么样的民主,是教育还是压服,皆决定于上。说是“百家争鸣”,结果“舆论一律”,说是“说服教育”,结果“全面专政”,这都是“对”的结果;一个“对”字,表示人民仍然无权,无民主之权,只能无限期地期盼赐予。他不对你“对”,你有什么办法呢?毛泽东这一公式已流行50余年了,其中那个“对”字却一直被人们所忽视,未有体会其深深的意韵。人民已习惯于一种“对”的地位,也不好怨天尤人了。

1962年,毛泽东谈到了民主集中制。在这个讲话中,毛对民主作了另一种表述,即“让人讲话”。言论自由当然是民主的一种表现。问题在于这种权利也是上头给的,所谓“让”也。其实,“让”与“对”,都是同义词语。可以让你讲话,也可以不让你讲话。可以言者无罪,也可以言者有罪。主动权皆在上、不在下,皆在官,不在民。毛泽东说,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所以首先要发扬民主,让大家讲话,发表各种意见,然后加以集中。集中什么呢?毛说,就是集中正确的意见,在集中正确意见的基础上,做到统一认识,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叫做集中统一。这里至少有两个问题。第一,谁来集中?自然是握有各种权力的领导者。有权者集中无权者的意见,大权者集中小权者的意见,享有最高权力的统帅集中全党全国的意见。第二,所谓集中,就是集中正确的意见,这当然很好。可是,在各种意见中,作为享有集中权的领导者以什么作根据去判断哪种意见是正确的,哪种意见是不正确的?这个根据,就是领导者主观感觉。领导者认为哪种意见正确就集中哪种意见;或者说,哪种意见符合领导者的意想就集中哪种意见。结果,民主(让人讲话)不过只是虚晃了一枪。对这种集中,领导者当然可以拍拍胸膛说,没问题,照此办理吧!至于实践结果如何,那就天晓得了。纰漏一出,领导就拍拍屁股,溜之大吉也;或易地做官,或说一声“我应当承担领导责任”就完事了。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这一讲话之后,“你(们)民主,我集中”,“群众民主,领导集中”,“委员民主,书记集中”的现象颇为流行,说明这一讲话不但没有推进党和国家生活的民主,反为家长制提供了新的依据。

5.民主必须有集中作指导,从毛泽东所倡导的群众路线领导方法中也体现了这一思想。毛泽东说:“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中坚持下去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毛泽东称:“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

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是中共的传家宝,是毛泽东思想精粹之点。毛提出此方法时中共还是一个在野党。这一方法帮助中共克服困难产生过重要作用。但是,执政后如果不是运用民主与法律体制来治理国家,还是依赖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处理复杂的国家事务,陷入人治主义的泥潭那是在所难免的。因为,在未有国家政权之前,一则需要人民支持,二则如果领导失误,革命立即受到损失,在那种情况下,不联系群众、不倾听群众的意见行吗?可是,革命成功、权柄在握之后,则是另一番情景了。这时候的群众,是被管理、被领导的对象了,是群众听我的,而不是相反;若与领导发生矛盾或冲突,通过说服教育等方法,归根到底要统一到领导的立场上来。一个人有了权,如果没有制度的约束,绝不可能像打天下的年代那样兢兢业业地去走群众路线。再说,此时的群众将会以另一种眼光、另一种语言来对待你;至于别有用心的人更会献上种种殷勤。如果你再摆一点官架子,还能听到多少真话呢?

十分重要的还在于,毛泽东倡导的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在思想深处仍然没有跳出“为民作主”的传统理念,也就是说,毛泽东思想即使其成熟阶段在政治思想方面仍没有超越被封建伦理家视为美德的“民本”思想。因为,在实行群众路线过程中,其能动的主体始终是领导者,群众始终是被动的客体。是谁从群众中来,是谁到群众中去?是谁将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是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始终是领导者。没有领导者这个主心骨,群众的意见不可能集中起来,也

不可能回到群众中去贯彻执行。群众所要表达的意见,只有领导者深入到群众之中时才能有机会“畅所欲言”;群众所期盼的政策只有领导者作出决定并下达贯彻,群众才可得益。这里,不但群众的一切活动都是在领导者集中指导下进行的,而且,群众所面临的是祸是福、是乱是治,也全出于领导之决定。由此可见,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与民有、民治、民享为主旨的民主思想,不能不认为是大相径庭,有天地之别。

注释:

注1 《列宁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228页。

注2 《列宁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440~441页。

注3 引自《卢森堡文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513页,514页。

注4 《列宁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418页。

注5、注6、注7 《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181页,200页,201页。

注8、注9 出处同5,312页。

注10 《列宁毛泽东和邓小平论民主集中制》(附录),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1994年版,285页。

注11 引自王贵秀《论民主和民主集中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117页。

注12 《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259页。

注13 《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2卷670页。

注14 《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3卷1058页。

注15 出处同注11,118页。

注16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10页。

注17 引自顾乃忠“东方文化的形态学透视”,南京,《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

(作者为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责任编辑 徐庆全)

炎黄春秋网上书城

网上购书 方便快捷

网址: <http://yh100.taobao.com>

本刊唯一授权网上书店

联系人: 关小姐 淘宝旺旺: zssy8888

我向毛主席上书提“过渡时期”

○ 徐振方

1948年9月,我考入华东大学学习,这是华东局主办的培养干部的学校。1949年4月,我随大军渡江南下,做支前工作。同年5月上海解放后,我回地方工作,历任青年团的区委书记、县委宣传部长、地委秘书等职。1956年夏,响应党的号召,报考高等学校,考取了南开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学习。1958年下半年,我由学生调任教师,走上教学与科研之路。1959年下半年党内“反右倾”斗争中,就因我坚持认为人民公社化没有铁的必然性,认为“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狂热,以及对市场供应紧张表示不满等,被重点批判,定为严重思想右倾,受到了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这反而更加促进我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问题的关注和研究。

1962年5、6月间,根据党中央《关于干部再教育的指示》,南开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党支部举行了多次发扬党内民主的座谈会。为了让大家解除顾虑,畅所欲言,该指示明确规定了十三个“不”,除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这老“三不”外,又增加了不作记录、不入档案、不汇报、不秋后算账等。在此期间,我回顾了1958年以来中国的实际情况和自己思想的发展,进行了系统性的总结。于是我在党内座谈会上作了多次发言,着重阐述了我们党1958年以来如何混淆了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的界限,特别是混淆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犯了严重的“左”倾路线错误,比历史上的三次“左”倾还时间长(1958年到1961年四年)、规模大(全国范围),如果是在战争时期,后果更不堪设想,尚须再作一个历史决议。这次全党性的路线错误,责任主要在中央。我在座谈会上明确提出:“毛主席应引咎辞职,以谢天下。”

在座谈会期间,我认识到这次左倾路线错误,源自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过渡时期和共产主义社会两个阶段的理论,我当即以此为主题写

了一篇文章向《学术月刊》投稿,试图在理论界引起注意,但此稿很快被退回。我逐渐意识到,这个问题只能从中央解决,本来问题的发生就出自中央。于是我迅即写好了向毛主席的上书,于1962年6月30日党的生日七一前夕经邮局给毛主席寄去,并作为向党的生日献礼,事后我告知了党支部和其他同志。

上书全文

敬爱的毛主席并中央:

我是一个共产党员,现在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任教。近几年来,特别是近年来,自己对我党几年来的工作有一些想法,这些想法,自己深感粗浅,不敢说有多少是对的。不过,自己出于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心和主人翁感,本着爱护党和党的事业的精神,把这些想法报告给您,即使不能对党有所帮助,也可以反映党员群众当前一些思想动态,提供进行党内教育的一点材料。为此,我特写此信,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告诉您。

我的一些想法,涉及的方面很多,自己尚未完全系统整理起来。因此,此信仅谈一个方面的问题,即关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和共产主义社会两个阶段中的一些问题。

几年来,特别是1958年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是必须首先肯定的。但是,与此同时,我们的工作中也发生了严重的缺点和错误,造成了很大的损失。我认为,这些严重的缺点和错误的产生,最根本的问题之一,是混淆了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与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的界限,混淆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限所致,也就是混淆了革命的发展阶段所致。

近几年来,有一种新理论在我们党内广泛流传着。按照这种新理论说来,马克思列宁主义所说的

过渡时期,不再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而是从资本主义一直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它包括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和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这样两个时期在内,前一个过渡只是这整个过渡时期的一个阶段,原来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阶段被并入了过渡时期之中。由此,这种新理论又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不再是在完成了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之后到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到来之前的时期,而是包括从资本主义一直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开始就是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直到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到来为止,原来所说的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被并入了共产主义社会和第一阶段之中。既然如此,这种新理论又说,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独立的社会形态,而是一种过渡的社会形态,是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之中的社会,因此,社会主义社会是过渡性的社会。由此,这种新理论又说,既然社会主义社会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过渡之中的社会,所以,不但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上社会主义社会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过渡中的社会,而且在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过渡的阶段上,社会主义社会依然是从一种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的社会。因此,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之间的斗争,就是贯穿在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整个过渡时期之中,即贯穿在整个社会主义社会阶段之中,并作为这个时期的主要矛盾,也就是说,上述两个阶级之间和两条道路之间的斗争,不但是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而且是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即原来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上的主要矛盾。按照这种新理论,既然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整个过渡时期是所谓社会主义时期,因此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同时也就是在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过程,我们现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就是在向共产主义过渡,社会主义建成之日,就是进入共产主义之时。按照这种新理论,既然上述两个阶级之间和两条道路的斗争,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整个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因此,就必须把社会主义革命坚持到底,即坚持到共产主

义的到来为止,这就叫做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论。所谓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论,就是要把社会主义革命彻底到共产主义的实现,把上述两个阶级之间和两条道路之间的斗争坚持到共产主义到来为止,不实行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就谈不到实现共产主义,或者说,要过渡到共产主义,就必须实行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彻底完成之日,就是共产主义实现之时。

持有这种新理论的同志,不但坚持说这种理论是正确的,而且还说这是完全符合马克思和列宁的原意的。其实,这是违反马克思和列宁的原意的。我认为,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应抱着严肃态度,绝不能随心所欲地加以曲解。我认为,后人不但有发展马列主义的权利,而且也有义务,如果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的某些论断的确已为新的实践经验所补充,我们就应该直言不讳地加以说明,这正是忠实于马列主义和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应有的态度,我们绝不能任意曲解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使其服从于自己的新理论。我们知道,这正是一切修正主义者所惯用的手法,而真正的马列主义者是耻取的。

因此,我们有必要彻底弄清马克思和列宁对于过渡时期和共产主义两个阶段究竟是怎样说的,至于这些说法是否正确,后人可以在实践中加以检验。但是,不论马克思和列宁原来说的是否正确,我们都应该弄清其原意,我们都应保持其原意。即使经过实践的检验的确证实了他们的说法是不完备甚至错误的,我们可以根据新的实践经验加以补充,但是,我们仍按照其原意加以理解。但是,据我体会,上述的新理论是与马克思和列宁的原意相违反的,至于究竟是马克思和列宁对,还是这种新理论正确,人们可以进一步研究,不过,在我看来,正确的是马克思和列宁,而不是这种新理论。

持有这种新理论的同志,不但坚持说这种新理论是正确的,而且还说这是完全符合马克思和列宁的原意的。因此,我认为有必要彻底弄清马克思和列宁对于过渡时期和共产主义社会两个阶段究竟是怎样说的,他们的原意究竟是怎样的。为此,我把自己对马克思和列宁的原意的体会写了两个材料,即(一)马克思和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的几个问题和(二)马克思和列宁关于共产主义社会两

个阶段的理论的几个问题,随信附上(这两个材料已丢失,其内容体现在此后不久我撰写的《社会主义再认识》论文中)。据我体会,这种新理论恰恰是完全违反马克思和列宁的原意的。在此,我仅谈谈对上述新理论的一些基本看法。

我认为,这种新理论是违反马克思和列宁的原意的,是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过渡时期和共产主义社会两个阶段的理论的。马克思和列宁原来所说的过渡时期,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过渡时期,它不包括社会主义社会阶段在内,即不包括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在内。同样的,社会主义社会即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是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完结之后才开始的,它不包括过渡时期在内。社会主义社会即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是共产主义社会在自身发展中的一个阶段,它是共产主义社会这个独立的社会形态中的一个阶段,它不是处于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中的社会,它不是具有这种过渡性质的社会,它不是作为新旧社会交替之中过渡性质的社会,而是作为新社会产生以后在其自身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个阶段之间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的斗争,贯穿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之中,并构成其社会的主要矛盾,当过渡时期完结之后,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上述两个阶级和两条道路之间的斗争虽然还不能说是已经完全绝迹,但至少可以说不再构成社会的主要矛盾,因为它不是社会主义制度自身的内在矛盾,而只是作为旧社会的某种残余,主要是作为思想意识上的某种残余而存在着。在社会主义阶段上,社会主义社会已经是一种建成了的既存事实,虽然有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但不再是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建成社会主义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的问题,社会主义建成之日,就是社会主义阶段开始之时。因此,所谓建成社会主义之日,就是进入共产主义之时的说法,是不对的。同样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就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就是要实现这个过渡。当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完成之后,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也就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也就完结了,虽然在社会主义阶段上,还存在某种社会主义革命的残留任务,但是就整个说来,在社会主义阶段上,不再存

在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如果要说是什么革命的任务的话,那可以说是共产主义革命的任务。

由此可见,这种新理论既不适当地扩大了过渡时期,又不不适当地扩大了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从而混淆了两者之间的界限,歪曲了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真正面貌,抹杀了它的真正的历史地位。这种新理论,实际上是企图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一并实现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从而把这两个完全不同性质的过渡阶段混淆了起来,企图把这两个阶段毕其功于一役。实践表明,这种企图是不可能成功的。

上述那一整套的新理论,近几年来在我们党内广泛地流传着,并且居于统治的地位。情况表明,这种新理论并不是由某些普通的理论工作者首先提出来的,它不仅在我党的理论工作中广泛地流传着,我党几年来的实际工作正是在这种新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正是由于在这种错误理论指导之下,在实际工作中就产生了一系列的缺点和错误。我认为,我党几年来在实际工作中所发生的许多严重的缺点和错误,正是在这种新理论指导之下,混淆了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与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界限,混淆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限。就这一点来说,我党几年来在实际工作中发生的缺点和错误,正是具有混淆这种革命发展阶段的性质,从而是一种路线性的错误。

这一整套的新理论,几年来在我们党内广泛地流传着,并且居于统治的地位。我身居微末,党内事情不详,至今不明这种新理论兴起的始末,不过,从几年来我党的公开文件和党的一些领袖的言论来看,这种新理论显然不是由某些普通的理论工作者传播开来的,而是首先党的中央和党的一些领袖人物提倡起来的。

让我们来看看这几年的实际情况吧。

我认为,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就经济关系来说,要到实现单一的全民所有制,并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相应的物质技术基础,才算完结,社会主义社会才算建成,才进入社会主义阶段,然后才有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问题。我国至1957年为止,农业在手工工具的基础上实现了合作化刚有一年之久,资本主

义工商业也尚未完全实现社会主义改造,我国的工业发展水平还相当低下,我国一穷二白的面貌远未根本改变。这个情况表明,当时,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虽然已在经济、政治和思想上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离建成社会主义尚有一段相当长的距离。1956年的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曾经正确地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当时我们的总任务仍然是为完成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为建成社会主义而继续奋斗。具体说来,首先必须充分利用新制度提供的优越性大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为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经济,首先是农业生产合作社,建立相应的物质技术基础;其次,要认真总结经验,组织社会主义经济的管理,特别是大力改进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经营管理,把农业生产合作社巩固起来。但是,当1957年冬至1958年春从农业开始的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新高潮的出现之后,曾被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把头脑弄得不够清醒的人们,这时就更加不冷静起来,他们一时被广大劳动人民特别是农民的革命和建设的热情浪潮所激动,以为这样标志着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实际开始。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正是反映了这种情况,实际上肯定了我国已开始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并且宣布我国已经又进入“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期。后来的事实表明,这时我党就已制定了一整套的实现向共产主义的过渡的办法,这些办法被积极推行着。1958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明确地提出了把向共产主义过渡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总方针,并且断言“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

北戴河决议是在党的文件中提的最明确的一个,只是后来很快在实际工作中碰了壁,便不得不开始收缩。但是这种收缩是不彻底的,是不能根本解决问题的,因为总的说来仍然坚持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总方针,只是某些具体做法上的调整,把过渡的步子稍微放慢了一些。八届六中全会,正是一次有计划的但是不彻底的退却。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总方针不抛弃,继续退却就是在所

必然的。1959年2月的郑州会议的继续退却很快就出现了。经过一年的试验,事实教育了人们,许多人开始冷静下来,重新考虑问题。但是,党内民主生活的不正常,限制了党内正确意见的发言,反右倾运动,更是对这些正确的意见予以歼灭性的打击。正确的意见被扼杀了,错误意见又有所抬头,这就出现了所谓1959年下半年到1960年上半年的再次跃进,更严重的是前述的新理论被系统地提出来并在党内最终取得了统治地位。1960年下半年,特别是1961年以来,严酷的事实实际上已把这种新理论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但是人们既依然固守着与现实生活毫无联系的理论教条。现在已是彻底清算这些理论教条的时候了。

我的这些看法以及对马克思和列宁的原意的体会,很可能都是完全错误的。同时,即使我的体会是符合马克思和列宁的原意,然而马克思和列宁原来的论述也可能有不够完全之处,我们也不能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更不能以死人压活人,后人可以根据丰富的实践经验来充实和发展马克思列宁理论。不过,我认为,不管马克思和列宁原来的论述是否完全,我们都应还其以本来面目。

当否,请示。

致以

共产主义敬礼!

一个党员

徐振方

1962.6.30

回信地址:天津市南开大学第十宿舍318号

我成了“四反分子”

这个上书一直未见到上面的回音,至今不知所踪。然而在下面却激起汹涌波涛,说我把反党的炮弹竟打到了毛主席那里,我从此便由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又加上反毛主席而变成了“四反分子”。

在我向毛主席上书之后,为了对这些年来理论界在过渡时期和共产主义社会两个阶段问题上的混乱,拨乱反正,彻底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我又写了《社会主义社会再认识》的长篇文章,提交南开大学1962年10月举行的科学讨

论会。这篇论文1964年被天津市委文教部负责人定为“八万言的反党纲领”，同时在河北省(当时天津属河北省管辖)作为反党毒草广被批判。1965年，当时在河北省党委党校任教的妻子被迫与我离了婚。1979年我被平反后，《南开学报》为了庆贺我的平反，决定发表此文(缩写稿)，编者按都已写好，即要付印，忽然传来胡乔木的什么讲话，遂即撤销了排印。此文真是命运多舛。

党内座谈会和我上书之后不久，不讲理由地停止了 my 的教师工作，也不让我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从此我被挂了起来，等候批判处理。1963年南开大学进行了“四清”，1964年臧伯平来校任党委书记后，在一次全校教师干部大会上宣布：“南开大学的‘四清’要推倒重来”，就是因为政经教研室(首先是徐振方)的问题没有搞彻底。1965年南开大学进行“社教”(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河北省委先是发来一个红头文件，标题是：“一场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副标题是：“一个彻底烂掉了党支部”(指政经教研室党支部)；随后派来了省委工作组，直接主持清查政经教研室的问题。其实，所谓政经教研室的问题，几乎全是我的言行问题，别人全无明显问题，对此历史已作了结论。在“社教”中，我被圈禁了两个多月，日夜有人看管，天天大会小会追查批判。匪夷所思的是，最后政经教研室竟搞出了一个“有纲领有计划有组织(所谓八大员)的反革命集团”，真是令人哭笑不得。对我并未作出定性和组织处分，不了了之。此后，我背负着留党察看的处分(直到1970年开除党籍)仍被挂着等候处理，不让我教学，只是随时派我做一些杂务性的事，如搬运办公室桌椅，管管学生的伙食，跟勤工俭学的学生一起劳动等等。命运一直处于不确定状态，虽生犹死，真是蹉跎岁月。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起，我便被当作牛鬼蛇神抛了出来，天天拔草劳动改造，唱牛鬼蛇神嚎歌，剃阴阳头，挂黑牌子，戴高帽子，住牛棚等，应有尽有。所幸的是，我的问题在“四清”、“社教”时已反复搞过，我也早已认罪伏法，并有老实改造的表现，所以，“文革”到来时，我已是“死老虎”，对我的进攻火力不太猛烈。若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说什么“党犯了左倾路线错误”和“毛主席应引咎辞职”，那一定是现行反革命，

很可能落一个像张志新那样的悲惨下场。这真是不幸中的万幸。

1970年7月，我被下放农村转为农民。1972年10月，天津市下发通知，要我们这些当农民的人员返回原单位。但校内有关人员对我歧视，拒绝我回校。直到1975年5月，同村的下放人员都已返校，南开大学的下放人员也都已返校，我才最后一个回来。

1979年7月，我终于在南开大学第六次全校性平反大会上得到了平反。

现在看来，马克思主义关于过渡时期和共产主义社会两个阶段的理论并不一定是很科学的，人类社会的发展或许并不一定适用这个路线图。这个理论的实践现在还只限于个别落后国家，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实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这个理论所规定的无产阶级暴力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以及共产主义社会两个阶段的特征等是否科学，尚待实践的检验。但是有两点应该肯定。一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应把过渡时期与社会主义社会这两个不同性质的社会发展阶段严格区分开来，不可把社会主义社会看作是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社会，不可社会主义尚未建成就趋于向共产主义过渡，建成社会主义之日，只是向共产主义开始过渡之时，而不是进入共产主义之时。至于搞什么“趁穷过渡”，断言共产主义离当时的中国已不是遥远的将来，都是不对的。二是我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要抱有严肃态度，既不能盲目迷信，食古不化，也不能断章取义，随意曲解。当年在马克思主义关于过渡时期和共产主义社会两个阶段理论上的混乱，应引以为戒。

1958年起中国发起趁穷向共产主义过渡，志气高昂，轰轰烈烈，但很快以失败而告终。然而，至今在党的有关决议中尚未明确论及此事，人们也总是说毛泽东搞的是空想社会主义，实际上，毛泽东在此搞的是贫穷共产主义。我们不应忘记此事的教训。

向共产主义过渡，本是苏联首先提出的。1936年苏联宣布建成社会主义，但未提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卫国战争结束和国民经济恢复以后，至斯大林逝世前，苏联逐渐论及向共产主义过渡之事。不过，苏联只强调为向共产主义过渡创造物质技术基础，曾规定钢产量要达到

5000万吨/年,石油要达到7000万吨/年,把开凿土库曼大运河等称为共产主义建设工程等。总的看来,苏联的做法虽嫌过早提出向共产主义过渡,但倒也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

中国虽在苏联之后提出向共产主义过渡,但1958年起发动趁穷向共产主义过渡,是要抢在苏联前头过渡到共产主义,以便使中国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居于中心地位和社会主义阵营中居于首领地位。中国的做法与苏联不同,不强调

发展生产力和建立共产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而是企图走捷径,通过改变生产关系,使生产关系共产主义化,省力省时地过渡到共产主义。这种做法完全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两个阶段的理论,结果,生产关系和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发生了四年全国性的大饥荒,全国饿死了3755万人,教训是惨痛的。■

(作者为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离休教授)
(责任编辑 萧 徐)

书 名	作者或主编	定价	邮 费
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	金 雁	68.00	10.00
苏东剧变之后:对119个问题的思考	陆南泉 左凤荣等	246.00	20.00
超越左右激进主义——走出中国转型的困境	萧功秦	48.00	8.00
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	马立诚	39.00	7.00
金正日与朝鲜	高秋福	36.00	6.00
陈布雷与陈伯达——历史转折点上两个“秀才”	张希贤	56.00	8.00
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	沈志华	148.00	18.00
长河孤旅:黄万里九十年人生沧桑	赵 诚	38.00	6.00
孤舟独树	康国雄口述 何蜀整理	38.00	7.00
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	托洛茨基著 施用勤译	58.00	8.00
敬畏民意:中国的民主治理与政治改革	俞可平	45.00	7.00
邓小平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纪实	杨继绳	35.00	7.00
直言——李锐六十年的忧与思	李锐著	29.50	7.00
苏北利亚	于 疆	22.00	6.00
转折:亲历中国改革开放	吴思 李晨主编	36.00	6.00
起点:亲历中国改革开放	吴思 李晨主编	36.00	6.00
亲历记(一)(二)	吴思主编	58.00	11.00
天下得失 蒋介石的人生	汪朝光等	42.00	6.00
中山舰事件:国共关系史上的秘案	张聿温	32.80	6.00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	119.00	12.00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	150.00	12.00
国家记忆(一)	章东磐	98.00	10.00
国家记忆(二)	章东磐	88.00	9.00
可操作的民主	晏 欢 戈叔亚	28.00	7.00
红墙医生:我亲历的中南海往事	寇延丁 袁天鹏	28.00	7.00
张学良遗稿:幽禁期间自述、日记和信函	王 凡 东 平	36.00	7.00
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	窦应泰	38.00	7.00
走出腐败高发期	杨奎松	48.00	8.00
邓小平访美那九天	高 波	58.00	8.00
官场怪圈定律	陈天璇	32.00	7.00
黄埔恩怨	李若公	46.00	8.00
我想重新解释历史	王 晓 华 李庆军	38.00	6.00
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	吴 思	28.00	7.00
读史求实	萧冬连、谢春涛等著	88.00	10.00
历史的碎片:侧击辛亥	杨奎松	38.00	7.00
二十世纪中国史纲(共四卷)	张 鸣	26.00	7.00
绝密档案背后的传奇(全六册)北京电视台卫视频道《档案》栏目组编	金冲及	128.00	12.00
母亲杨沫	老 鬼	45.00	6.00
血色黄昏	老 鬼	39.00	6.00
血与铁	老 鬼	39.00	6.00
烈火中的青春:69兵团烈士寻访纪实	老 鬼	38.00	6.00
1911-1912 亲历中国革命	埃德温·J·丁格	36.00	7.00
亲历民主 我在美国竞选议员	龚小夏	28.00	6.00
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	史景迁	19.60	6.00
李锐反左文选	李 锐	22.80	6.00
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	杨继绳	42.00	7.00
通往立宪之路	刘刚 李冬君	60.00	8.00
1943 一盆红红的火(谢韬日记选编)	谢 韬	49.00	8.00
高岗传	戴茂林、赵晓光	59.00	7.00
西路军——河西浴血、生死档案、天山风云	冯亚光	126.00	12.00
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	陆南泉 黄宗良等	246.00	20.00
走向革命:细说晚清七十年	雷 颐	29.80	7.00
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	杨奎松	88.00	10.00
望九琐忆——一位老者的20世纪	白永法	22.00	6.00
底层的叩问——肖复兴人生笔记	肖复兴	25.00	6.00
地狱门前——与李真刑前对话实录(内部发行)	乔中华	58.00	8.00
共和国大审判(二)——特别法庭内外纪实	王文正口述 沈国凡采访	38.00	7.00
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雷日科夫	49.00	8.00
红墙知情录(一、二、三)	尹家人	95.00	10.00
苏共亡党十年祭	黄苇町	26.00	7.00
三野名将	吴东峰	28.00	7.00
四野名将	吴东峰	28.00	7.00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 I	杨天石	60.00	8.00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 II	杨天石	38.00	6.00
“中间地带”的革命	杨奎松	54.00	9.00
烙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集体记忆	林贤治主编	38.00	7.00
历史大转折中22个首任省长、市长和自治区主席纪实	孟庆春	49.80	7.00
裴绉弩旧体诗全编注释集评	侯井天	98.00	11.00
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	朱 正	26.00	7.00
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	萧 徐 李锐 龚育之等	28.00	7.00
走出个人崇拜	冯建辉	16.50	5.00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薄一波	88.00	11.00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	沈宝祥	39.80	8.00
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	戴 煌	21.00	5.00

代购代邮

《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
从专制到改良,从改良到革命,从革命到革命后的清算。深挖俄国知识分子的罪与罚。

本书的精彩观点:

1. 为什么革命不可轻言

统治阶级对知识阶层的打压和禁令,使思想蒙难者被赋予了圣徒般的光环与荣耀,进一步促使失业的“愤青”对激进主义产生更大的兴趣,促成了社会上的“革命党”崇拜。沙皇处于维护自己利益和惧怕革命,对革命者进行严酷镇压,这种举动加速了革命情绪和行动的高涨,致使俄国社会出现紧张对立的恶性循环。

2. 路标是一部强调“个性自由”的书

不论是雅各宾党人的“公安委员会”,还是“布尔什维克的红色恐怖”——以单纯与激进为解决前提的方法——往往最终势必导致压迫、流血与崩溃,砍掉旧暴君的脑袋,就会引出新暴君与新奴役。革命成功以后,把计划与紧身衣强加在民众身上,也会令追求自由的知识分子无法忍受。

3. 斯托雷平改革与俄国知识界的保守思潮

改革并非在任何时候都是革命的替代物。“改革引起革命”在历史上不乏其例。不少俄国学者认为没有斯托雷平改革就没有2月“雪崩”,俄国不公正的经济改革导致社会情绪激愤然后再转变为剧烈的政治革命,成为一种特殊的“斯托雷平现象”,这不无道理。因此要使改革真正取代革命,这场改革应当不仅是理智的,而且是公平的。

《苏东剧变之后:对119个问题的思考》:1989年先是波兰,之后东欧各国接二连三的发生剧变,到1991年底苏联解体,原苏东国家发生剧变20多年来,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等方面发生了哪些变化?可以肯定的是苏东国家剧变后转型的一个重要特点:其转型与整个制度变迁是同时进行的,其转型不再是对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修补和完善,而是朝着人类社会创造的共同文明和西方所认同的价值观念方向发展,即政治民主和经济市场化。这些问题会引发我们更深的思考!

《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

作者对今天各种社会思潮作了细致的资料搜集、整理和分析,认为当今中国的八种思潮分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即邓小平思想、老左派思潮、新左派思潮、自由主义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民族主义思潮、新儒家思潮和民粹主义思潮。

社会思潮的多元并存,形成了百家争鸣的趋势,社会思潮活跃是社会活力的表现,对于各种思潮需要妥协和包容,马克思·韦伯曾说过:一个国家现代化的程度,取决于对多元文化的包容程度。诚哉斯信,只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思想文化才能繁荣。繁荣文化最为重要的条件就是自由,特别是思想自由和思想表达自由。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 编:100045 收款人:北京炎黄春秋杂志发行部

(注:邮购三本书以上,可按总书价的10%付邮费)

炎黄春秋QQ在线:2368298257

我的“文革”经历与“红卫兵”

○ 丁 东

“文革”那年，我15岁，正在北京师大一附中读初中二年级。

“文革”前的我，学业一直顺利。小学考上了北京第一实验小学，即原来的师大附小，中学考上了师大一附中，都是名牌学校。那时虽然也开始讲思想革命化，但学校里还是功课好的学生吃香。从家庭到学校，对我似乎只有一种要求，那就是把功课学好，将来要考上名牌大学，以后当科学家或者工程师。从我来说，似乎也有这种能力。小学的时候，在数学竞赛里就得过两次奖，一篇作文，也上了学校铅印的小册子。

“文革”的风暴，过早地把我们这一代卷进了政治漩涡。

从旁观者到参与者

1966年6月1日，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公开发表。学校开始停课。当时还是贪玩的年纪，不上课觉得很兴奋。又过了几天，广播了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为废除旧的升学制度给党中央、毛主席的一封信。我当时还不可能理解这些变化可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自己的人生轨迹，对于突如其来的风暴既感到新鲜，也感到意外。学校里一些高年级的学生先是在礼堂贴出批判彭真的大字报，接着火烧到校领导的头上。校领导班子先是抛出一位名叫郑炎的副校长，但这根本满足不了学生的革命胃口，很快整个校领导班子都成了革命对象。当时，北京的中学由团中央派工作组。第一个工作组的组长是从农村四清工作队赶回来的，还不太适应学校的气氛。所以一进校亮相就被喝了倒彩。接着又组成以团中央某部长为组长的第二个工作组。这个工作组最引人注目的一点就是，吸收了当时还在学校读高一的刘少奇的女儿刘平等五个学生为组员，并任命刘平平为“文革”主任。我虽然只是一个旁观者，但已经感受到高干子女的特殊地位。如果

说，“文革”前学生中谁学习成绩好谁受尊敬，或者谁体育运动拔尖谁引人注目，那么，“文革”开始后，衡量三六九等的尺度就剩家庭出身这一条了。当时，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工人、贫下中农这五种家庭出身叫“红五类”，实际上工人、贫下中农子女也不过是陪衬而已，最牛的还是高干子女。我们那所中学，建于20世纪初，历史悠久，名气较大，离中南海又不远，所以光中央领导人的子女就有好几个在这里念书，爹妈是部级、司级的更是不计其数。“文革”开始后，高干子女先得上层消息，显得格外活跃，一派要接班的架势。我自己从小学到初中，考学一直顺利，经济上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所以精神上没受过什么委屈。“文革”开始后，强调家庭出身，我一下子就感到矮了一等。我父亲是民主建国会的普通干部，母亲是31中学的实验室管理员，按当时的成分划分算职员，既非趾高气扬的“红五类”，也非任人训斥辱骂的“黑五类”。虽然没有挨整，但内心的深处猛然感到一阵压抑。

我们学校的第一批红卫兵基本上都是高干子弟，“八一八”登上观礼台接受老人家检阅的非他们莫属。接着，他们大开武戒，把学校的领导和一些有历史问题的教师打入劳改队，剃了阴阳头，说骂就骂，说打就打，校长书记们都被整得狼狈不堪，记得有一次看见学校的一位女书记被剃了光头，成了小尼姑的模样。而从街道上抓来的“黑五类”，更是被打得头破血流。自己当时看到这种场面，内心并没有升起一种人道主义的同情与悲悯，而是一种轮不上自己充当革命主力的失落感。现在反思，这也没有什么奇怪，自己当时一共所受的八年教育里，没有多少人文主义的内容，越来越多的只是斗争，斗争，斗争，是对敌人要像严冬般冷酷无情。喝着狼奶长大，很容易失去人性。所以，我和那些在“红八月”里当过凶手的学生的区别，不是人性觉悟的高和低，而是打人资格的有和无。

那是一个争相革命的年代，在学校里，轮不上

我“革命”，我就在宿舍院里参加“革命”，跟着年纪大一点的学生，油印《通告》，要求全楼居民主动交出“四旧”。我们那个院里，不过100来户人家，交上来的“四旧”就堆了少年之家的一整屋子。光是书籍，就不下万册。有外文书，也有古书，包括成套的《二十四史》。院里住的都是民主党派成员，他们经历了反右之后，已经是惊弓之鸟；这次运动来头更大，全楼弥漫着一种朝不保夕的气氛。大家巴不得主动交出一点“四旧”过关，也顾不上心疼书籍的价值了。

但革命的风暴很快就越过了“文斗”这个层次。宿舍里一些人开始被赶出京城，遣送原籍。院里有一个从小在一起玩的朋友叫粟天延，天赋很高，知识面也很广。我不知道他父母是干什么的，只见他在爷爷家生活。他爷爷家挂着一张照片，是八一南昌起义的合影，里面有周恩来、朱德，也有他的爷爷粟丰。我不了解他爷爷的历史，只知道起义失败后几经波折，成了民主人士。但在1966年的夏天，已经过了花甲之年的粟老先生被当作地主，遣送广西老家，很快就被折腾死了。从此我再也没有和粟天延见过面。

那一阵，许多人都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销毁各种容易招来麻烦的东西。有一家在水马马桶销毁东西，把全楼的下水道堵了，粪便都溢了出来。

不久风暴就刮到我家。我祖父是城市贫民，成分没什么问题；但外公家比较富裕。外公去世很早，外婆一直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她是家庭妇女，所以多年无所谓成分可言，“文革”开始后，到处划成分。一个堂舅来信说，在我外祖母名下有二亩坟田。我父亲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一接到信，慌忙到同住一院的机关领导家里汇报，问是否要把外祖母赶回原籍。还好那位领导的妻子是一个善良妇女，她从旁拦住：二亩田算什么地主？老太太都80多岁了，赶回去不被红卫兵打死，路上也难保性命。外婆没走，也就没事。虽然虚惊一场，后来还是活到90岁，得以善终。我母亲现在说起那位领导的妻子，直夸她真是好人。

接着，有一天我从学校回家，正赶上一个中专学校的红卫兵来我们这片宿舍抄家，院里不知谁看我家不顺眼，唆使红卫兵闯进我家翻起来。家里人都慌了神。还好父亲的机关闻讯，赶来证明我家既不是当权派，也没有历史问题。红卫兵又把已经装



丁东与父母

了车要抄走的东西送回来。我父亲为了表示支持红卫兵革命，只好主动把一些有“封资修”嫌疑的东西让红卫兵拿走，其中有我姨的两件首饰，是前些年她害怕抄家，存在我家里的。

说到我这个姨，是我家在北京惟一的亲戚，她和我母亲是姨表姐妹。20世纪50年代初从上海调到中国外文书店工作。由我母亲做媒，和一个电气工程师结了婚。姨夫姓张，我小时候见过，没有别的印象，只记得他在家装的吊灯很特别。后来，他就被抓走了，也不知道是劳改还是劳教。我姨原先一直守着，直到“文革”前，压力越来越大，只好和他离婚，一个人搬进了书店的单身宿舍。后来才知道，姨夫其实什么问题也没有，就是因为母亲是日本人，便受到无端怀疑，先抓起来，后找罪名，反革命够不上，就打成坏分子，一关就是多少年。放出来之后，家也没了，最后死在福利院。我姨听说后，大哭了一场，说这一辈子对不起他。

我母亲又总是说，对不住她这位表姐。过去是后悔不该给她做媒，现在是后悔不该把她的首饰交出去。可这些悲剧，当时我根本不理解。心里最盼望的就是，怎么得到去革别人的命的资格。

后来破“四旧”的风暴过去了，就开始了大串联。我和两个同学从北京到武汉、桂林、湛江、广州、井冈山转了一圈，其中从广州到井冈山是步行，回来已是冬天。到家后，才知道我母亲作为中学教职员，也到武汉串联，实际上是串亲戚，到舅舅家住了半个月。

到了1967年，学生们大多串联归来，学校通知要复课闹革命。先是进驻了一批通信兵司令部的干部，主持军训。后来又进驻了工宣队。同学当中，也出了不同的思潮和组织。同班的刘洪生、周绍元、

陈小文、张光明四个同学已经开始对当时的主流路线发生怀疑，由中央文革而林彪，最后干脆怀疑到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当时他们成立了一个小组织，写了文章，直到把教室里的毛泽东像贴上房顶，终于东窗事发，被抄家逮捕。我当时思想很正统，支配头脑的是掺着宗派情绪的愚忠。因为自己参加的组织 and 这几个同学的组织有摩擦，所以写了长达万言的批判文章，批判这几个同学的“反动思想”。当时文章是怎么写的已经想不起来了，反正是刻意模仿戚本禹、姚文元那种大帽子唬人，以势压人的笔法和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霸道逻辑，感觉是这下子总算是走上革命前线。现在想起来，既十分内疚，又可悲可笑。那几个同学其实是最早的反抗者，被关押了半年多，吃了不少皮肉之苦，才放出来上山下乡。

我因为能写两篇文章，被吸收到学校革委办小报。平时住在学校，有时星期天都不回家。小报的内容无非是跟着当时隔一段就由“两报一刊”发表的所谓最新最高指示唱高调。哪天上级预报要发表最新指示，马上守在收音机前，边听新闻联播边记录。大多数师生，列队上街庆祝。我们则是按照宣传毛泽东思想不过夜的原则，守在油印机前，连夜印刷。老人家说的是什么意思，那些片言只语后面有什么背景，当时既不可能知道，也没有能力去想。只是怀着一种盲目，还以为干着多么高尚的事业。如果说革命也能让青少年上瘾，当时上的就是这种瘾。当然也不是没有一点收获，一点编辑业务的初步知识，就是在那时学下的。

如何看待“红卫兵”

“文革”年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登峰造极的年代。法西斯式的野蛮暴行在20世纪的中国竟然重演。对于老三届这一代人来说，绝大多数当时在个人崇拜的社会心理氛围当中都随了大流，其中不少人充当了阶级斗争的工具，批过人，整过人，甚至打过人。这当然值得反思。在现实生活中，有的人回避这段历史。这是有原因的。比如有些人当过群众组织的头头，后来又受到一种非历史态度的对待，在个人发展的道路上遇到重重障碍，他们当然希望尽量地回避，哪有心情去公开地反思？再比如，有些老红卫兵，过去总爱吹嘘自己当年如何过五关、

斩六将，现在又强调自己受迫害，走麦城。他们按照不同时期的要求不断改变自己“文革”年代的形象，这是为着在今天获得更加有利的社会地位。这些情况的出现都不足为奇。还有一些老三届感到委屈，觉得舆论对他们不公正。的确，这一代人，在“文革”发生的年代还是不到二十岁的青年，他们既不是“文革”的发动者，也不是“文革”的决策者。“文革”的真正发动者和决策者是老人而不是青年。在一些受害者的口中和笔下，“文革”往往被简化为红卫兵的暴行。从现象上看，也许这不无根据，但从实质看，这就放过了“文革”真正的始作俑者。某些青年人即使在“文革”中风云一时，说到底，他们不过是充当高层执政者的工具而已。如果不能按历史的本来面貌公正地追究责任，反思“文革”就失去了基本的前提。“青春无悔”的声音，从某种意义上讲，可能正是对某种不公正的舆论的情绪宣泄。

当然，问题还不是这么简单。即使弄清了“文革”发动者和领导者的责任，我们老三届这一代对自己的历史也是需要进一步反思的。十几年前这一代人曾经嘲笑老一代死抱僵化的传统不放。如果这一代人今天也死抱着“青春无悔”的心态不放，自己也将很快成为新一代人眼中的唐吉珂德。可悔的应该是造就这一代人的政治文化，无悔的是这一代人正好是这种文化的掘墓人。

当然，我也不赞成把“红卫兵思维”、“红卫兵心态”泛化，当作嘲笑每一代青年人的口实。即便是这一代里当过红卫兵或造反派的“文革”积极参加者，他们身上也还是有一些可贵的东西，是需要挖掘出来，加以发扬的。我们这一代，经历了从驯服工具到盲目造反，再到大胆怀疑，独立思考的转变过程。正因为这个过程是从这一代人身上发生和完成，所以我们在从传统社会走上现代社会的进程中成为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一代。为了说明这个进程，我想先追溯到红卫兵诞生之初。

现在，红卫兵已经被泛化为一代人的符号，其实红卫兵也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在最狭窄的意义上，红卫兵是指北京清华附中等校的一批中学生。他们在1966年夏成立了名为红卫兵的小团体，得到了毛泽东的直接支持。他们的代表作便是“三论革命造反精神”。这三篇文章当时上了中共中央主办的《红旗》杂志。这些红卫兵又称老红卫兵。1966年夏天的破“四旧”主要是他们干的，当然这种摧毁

文明的蠢事得到了林彪代表毛泽东的支持。老红卫兵多数是高级干部子女。当时有一个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成为老红卫兵的组织纲领。这种思潮的发生，也不是这些年轻学生的创造。在升学等方面搞唯成分论的“阶级路线”，在50年代已经开始，到红卫兵运动落潮后尚未结束。整个“文化革命”期间，招工、招生、入伍、入学、提干等方面无不是重家庭出身、社会关系，轻本人才能。只不过老红卫兵的对联把血统论表达得更加露骨罢了。但老红卫兵的好景并不长，原因一是他们的盲动很容易过火，为政权所不容忍，更主要的原因是他们的父母很快成为走资派，他们自己也从“红五类”变成了“黑五类”，地位的突然变化，使他们很自然地转向“文化大革命”的对立面。于是，以“西纠”、“联动”炮打中央文革被抓为标志，老红卫兵退出了政治舞台。

继老红卫兵之后，出现了造反派。他们在“文革”初期曾受工作组压制，有的被打成反动学生、反革命。毛泽东批判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这些青年学生被解放。其中比较有名的是“清华井冈山红卫兵”等组织。他们成为毛泽东利用的第二梯队。他们的造反行为不是破“四旧”，而是指向一批犯了“路线错误”的领导干部，当时所谓“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但由于造反中观点不一，权力再分配中瓜分不匀，造反派内部很快发生分裂，以致相互间搞起武斗。刘少奇被打倒以后，这些造反派红卫兵也成为不安定因素。以工宣队、军宣队进驻清华、北大为标志，这一批红卫兵也被赶出了政治舞台。

自发的红卫兵退出了政治舞台，红卫兵的名称还在。一度，红卫兵取代了共青团，红小兵取代了少先队。但自各地革委会成立之后，政权已经从体制上修复。名为红卫兵的青少年组织已经不具有“文革”初期那种造反的性质了。

现在，人们把红卫兵当成愚昧、血腥的符号，主要是指老红卫兵的破“四旧”、打老师和造反派批斗老干部。其实，这种愚昧和血腥在“文革”前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有，并非红卫兵首创。如果说中国也产生过纳粹式的“冲锋队”，并非自“文革”始，自红卫兵始。红卫兵、造反派和以前历次运动的不同点仅



1969年1月和文重萍在大寨

仅在于，以前搞运动整人，破坏生产力的行为来自政权组织本身。而红卫兵和造反派虽然一度为毛泽东所支持和利用，但他们的组织却具有自发性，游离于体制之外。所以，“文革”前历次运动中整错人的干部照样得以重用，而“文革”中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下场都很不妙。但也正因为这一代青年最先吞食盲从的苦果，命运本身就促使他们选择怀疑。这便是盲目造反和走向怀疑之间的逻辑联系。

造反作为一种破坏性思维和行为，现在已经为人们所唾弃。中国几千年历史上发生过的无数农民造反，曾被推崇为历史发展的动力，现在也已为历史学家所怀疑。“文革”中的造反本不同于历史上的农民造反。因为历史上农民造反是要打倒皇帝做皇帝；“文革”中的造反是一种奉命造反，是为捍卫毛主席、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造反。这种造反本身就是一种被利用，虽然造反过程也有自身的利益冲动。现代的怀疑精神与造反这种定于一尊、你下我上、你死我活的思维方式不同，它是要从一元走向多元，从舆论一律走向百家争鸣，从你死我活走向兼容并包。但从驯服与盲从到达怀疑与觉醒，造反恰恰成为这一代人中的觉醒者的精神过渡。“文化大革命”的动荡产生了这样几点值得注意的后果：

一是政治信息的扩散打破了高层的神秘性。“文革”前流行的是驯服工具论，一切听从党安排。每个单位，对支部书记都崇拜。维持这种格局所依赖的乃是上智下愚，是民众对国家大事的不知情。比如三年灾荒，上面说是天灾，就以为是天灾，说是苏修刁难，就以为是苏修刁难。其实那几年风调雨顺，灾荒的真实原因就是“大跃进”造成的经济失调。

上面也不想让下面知道,老百姓受到宣传的蛊惑,也就信以为真。“文革”开始后,毛泽东号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自下而上地揭露阴暗面,当然有他的目的。但在此过程中,大量以往被严密封锁的信息,通过大字报、传单和红卫兵小报披露出来,使得人们了解到许多以往被掩盖的真相。人们之所以盲目崇拜大大小小的书记,是因为不了解他们的真相。了解了真相以后,他们就不再神圣。“文革”前期,大大小小的神破碎了,只剩下毛泽东一个神,八亿人只崇拜毛泽东一个人。对大大小小的书记的崇拜,到对毛泽东一个人的崇拜,虽然都是崇拜,但毕竟是走出崇拜的一个中间环节。等到林彪沉沙折戟之后,毛泽东身上神圣的光圈也失去了。中国人丧失了近二十年的独立思考精神,从这时开始重新萌生。而当时老三届正处在求知欲最强的青年时代,他们经历了最狂热的崇拜,一旦崇拜崩溃,便渴望彻底的觉醒。

二是命运的波折打破了信仰的盲目性完整性。对于在“一切听从党安排”,“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等口号中走向社会的这一代人来说,他们在“文革”一开始确实是听从党安排,毛主席召唤的。号召红卫兵造反的,不是别人,是毛泽东。明明是让天真单纯的青年充当政治斗争的工具,却要捧为革命闯将,冲垮了对手,又发现年青人也很碍事,于是兔死狗烹;号召知青上山下乡的,也是毛泽东。明明是出现了就业困难,却说成是接受再教育,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下农村很容易,再想回城就得过五关斩六将了。现实是最好的教师。书本固然可以教人思考,现实更能让人不得不怀疑,不得不思考。这一代人中出现了一批怀疑者,思考者,正是一种必然。

三是体制外的经历使他们的性格中出现了难以磨灭的自发性。“文革”是毛泽东发动的。红卫兵是在盲目的热情中始被利用,终被抛弃,这都是事实。但有一点值得注意,毛泽东为了达到他的目的,在“文革”中采取了天下大乱的办法,红卫兵、造反派,一度在体制外活动。在1966年秋到1967年,红卫兵、造反派一类的组织可以自发成立,小报可以随便办,用不着谁批准。虽然后来不少组织或报纸被中央文革点名,顷刻陷入灭顶之灾,但大量的自发组织和报刊毕竟活动了一年左右的时间。这在毛泽东统治的二十七年间,是一段绝无仅有的体制相对失控的空隙。对于这一段体制失控的空隙,

过去一直缺乏单独研究,而是把整个“文革”捆在一起。人们喜欢说时势造英雄。不错,狂热的年代是造就了打砸抢的流氓。但体制的相对失控,也造就社会组织的萌芽。“文革”初期虽然只是相对的小失控,而且这些红卫兵小报和“两报一刊”基本上是一个调子,有独立思考内容的很少,但这种活动方式使得一部分青年有了体制外活动的体验,从而锻炼了一代人的自组织能力。与“文革”前十七年毕业的学生相比,“文革”中红卫兵的心理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文革”前的教育是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文革”中却是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一开始是一些高级干部的子女跃跃欲试要接班,接着一大批原来不出名的青年人登上了社会政治舞台。这里面当然有幼稚、狂热、野心、权欲,但驯服工具论,螺丝钉精神,从此也永远地失去了魅力。现在,人们较多地注意这种变化造成的破坏性。但是,我要反问,“文革”前那种精神格局,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上智而下愚的古代有何根本区别?现代社会是大众知情、大众参与的社会。中国社会一直没有进入这样一种现代格局。“文革”的发动者,未必真心愿意造就一个新格局,但事实上“文革”却成为旧格局崩溃的一个契机。

上述几个方面,最重要的是现实对人的教育。因为当时官方的意识形态已经失去了自洽性,青年人当然要寻找新的精神家园。文化的匮乏非但不会使这种寻找的冲动减弱,有时反而使这种冲动更加强烈。越是禁书,人们越想读。在知青当中,官方规范之外的读书活动实际上一直不曾停止。

当然,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文化的先天不足造成了思考的局限性。二十年国门的封闭,使我们无从了解当代世界的思想成果;传统的断裂,又使我们无从掌握民族文化的遗产。不论是中国的古代思想,还是西方的现代思想,我们都到了中年以后才有所接触。我们这一代的先觉者,即使做出挑战性的思考,所用的武器也往往仍然不超出马恩列斯毛的思想和语言。能够追溯到欧洲近代人文主义文化,已经很不容易了。北京的一些知青接触到一些外国当代的思想文化,也是零星的。远远谈不上系统性。但不管怎么说,“文革”的经历促使我们这一代走向独立思考,毕竟是一个事实。“五分加绵羊”的教育模式,到我们这一代,画上了句号。■

(责任编辑 徐庆全)

老报人办报记

○ 范 钧

1978年,全国当年通过邮局公开发行的253种报纸中,经济类的全国报纸只有1份。两年后,到1980年年底,邮局发行的382种报纸中,经济类全国报纸已增加到四份:《财贸战线》报(1978年7月由当时的国务院财贸小组创办,1981年改名《中国财贸报》,1983年在此基础上创办《经济日报》)、《市场》报(1979年10月由人民日报社创办)、《经济生活报》(1980年1月由浙江日报社创办,限国内发行)、《世界经济导报》(1980年6月由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和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共同创办)。

这四份经济类报纸,一份是由中央国家机关创办,两份则由中央或省级新闻单位创办,仅《世界经济导报》是由中央和地方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机构联合创办。本文主要介绍当时这两家学术研究机构如何会创办这份报纸,以及创办这份报纸中的一批老报人当时在三中全会精神的鼓舞下,又是如何解放思想,在经济报纸的创刊中寻求突破、有所创新。

从《世界经济资料》到《世界经济导报》

还是在1978年的7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吉林省长春市召开全国世界经济科研规划座谈会,会议期间与会专家、学者面对国内对外经贸人才匮乏问题,当时议定要在上海办一报、一院,即一份报道世界经济的报纸,一家教授世界经济的学院。

上海是中国近现代新闻业的发展中心,它曾经的繁荣,造就了一批知名的报业和一大批新闻从业人员。在上海办一份世界经济类的报纸有着得天独厚的人才优势和经济报业发展的深厚环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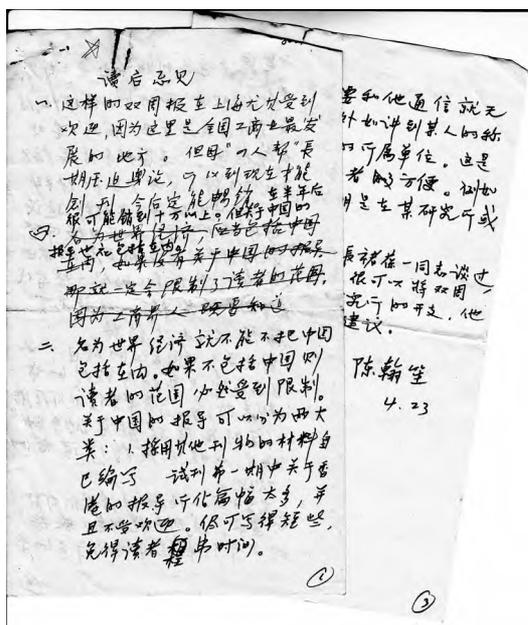
1979年下半年,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开始承担起创办出版一份报道世界经济的报纸。他们认为,建设现代化强国首先需要了解世界,由于长期闭关锁国,加上“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大家对国门外的世界知之甚少,不光是研究世界经

济的专家、学者急需了解和研究现实的世界经济理论、形势和发展趋向,其他方面的人士也都很想了解国门外面的世界经济究竟如何。同时他们还认为,当时在报道世界经济方面的各种限制框框要比报道国内经济少,因此办份报道世界经济报纸的政治风险也一定会小些。

在筹划办报过程中,有一批上海滩的老报人逐渐聚拢到上海世界经济研究所,参与创办这份报纸。这批老报人曾是上海滩的知名新闻记者和编辑,但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十年“文革”中,不是被戴上错误的帽子,就是归入到在新闻界不得重用的名册,他们多数被迫去做工、务农、从教等,留在新闻机构里的则也被边缘化,不能从事自己心仪的新闻事业。1978年,《光明日报》“真理标准”大讨论引起的思想解放,拨乱反正,以及这年末党的全会上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



《世界经济报》试刊号第一版(1980年4月19日)



1980年4月23日著名经济学家陈翰笙署名的《读后意见》

经济建设上,并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激起他们重新能够从事新闻工作的一种渴望。

到1980年初,上海世界经济研究所的办报方案最终形成,设想是:办一张四开八版的半月刊报纸。报名可选用《世界经济报》,《世界经济评论(报)》,《世界经济双周报(刊)》,《世界经济论坛报》,或其他。报纸的任务是要“反映当前世界经济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介绍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情况及经验。交流国内外世界经济研究情况。普及世界经济学科的知识。”读者对象将是“全国世界经济研究单位的研究工作者,大专院校有关专业的师生,涉外经济单位、研究单位的实际工作者,企业的领导干部和管理干部,对世界经济有兴趣的青年知识分子。”而办报的宗旨是:贯彻“学术民主”和“百家争鸣”的原则,研究世界经济的新情况、新问题,探讨世界经济理论,以促进我国世界经济研究工作更加有效地为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

申请办报在中国从来就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尽管这一年报刊的出版审查批准权是在省级党委,但是,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还是采用变通的办法,希望申请可以顺利通过。1980年3月上海世界经济研究所正式提出办报申请报告,申请的要求是将其所内已批准的油印内部资料《世界经济资料》,充实内容,改为四开八版的铅印半月刊《世界经济双周报》,作为报纸公开发行。办报申请报告经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市委宣传部逐级上报,

5月23日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批复,同意定期出版《世界经济资料》报。也就前后两个月的时间,报纸出版申请顺利获得了批准。

就在申请报纸出版批准的过程中间,也就是4月21日至28日,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在上海召开了成立大会。会议中间,一张标明4月19日出版,名为《世界经济报》试刊号的报纸送到与会的180多人手上。看到这份试刊报纸,当即引起与会代表的强烈反响和热情支持。会议主办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的所长、也是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筹备组组长的钱俊瑞马上表示: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很需要这样一个刊物,这个刊物可由学会与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合办。北京、上海两地的合作就此一拍即合。

5月底,在确认中共上海市委已经同意出版这样一份报纸后,北京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秘书长郑伟民来到上海,代表会长钱俊瑞与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商谈合作办报事情。

6月3日,钱俊瑞给上海夏征农(市委书记)、陈沂(市委宣传部长)、黄逸峰(上海社科院院长)发去电报称:“中国世经学会拟与上海社科院世经所合办的刊物,建议定名《世界经济导报》或《世界经济知识》,因为学会另一机关刊物的名称是《世界经济》(月刊),如双周刊(以后我们意见拟改周刊)也名《世界经济》似感重复,此意请再考虑,并复示。”对此,上海社会科学院向上海市委和市委宣传部报告,采纳钱俊瑞的建议,刊物名称由《世界经济资料》改为《世界经济导报》;并报告说:钱俊瑞同志提议,由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和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合办问题,我们原则上赞同,关于主编人员,出版发行等工作均由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负责,至于出版等有关问题,将由双方具体商订,立文作为根据,以便双方遵守执行。

关于合作办报一事,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和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当时达成协议是:

- 一、经中共上海市委批准出版的《世界经济导报》,于1980年6月正式创刊。目前定为双周刊。
- 二、《世界经济导报》的编辑方针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及时、准确地报导和评述世界经济情况和问题,普及世界经济知识,并适当报导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成就和中外经济关系的重大动向。

三、本报由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和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合办。编辑、出版、发行工作均由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负责。工作上遇有特殊困难时,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应给予支持并协助解决。

四、成立《世界经济导报》编辑委员会。编委会由若干人组成,设主任、付(副)主任。编委会下设编辑部,设主编一人主持日常编辑工作。另设付(副)主编若干人。

五、本报实行主编负责制。《世界经济导报》主编由钦本立同志担任。

六、中国世界经济学会指定专人担任《世界经济导报》付(副)主编,经常驻在北京,负责与主编联系,并在北京组织一部分稿件。

七、本报实行独立经济核算。如有亏损,双方负责。如有盈余,作为《世界经济导报》建设基金。

八、编辑部定期向上海社会科学院和中国世界经济学会汇报编辑工作。

九、遇到新情况,双方协商解决。

之后,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以中国世界经济研究所名义向中国社科院院务委员会,上海世界经济研究所向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市委宣传部分别上报“关于合办《世界经济导报》的协议”,报请各自主管部门备案。1980年7月2日,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批复,同意将《世界经济资料》改名为《世界经济导报》,由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与上海世界经济研究所合办。

在僵化的计划管理体制中寻求突破

要求办报从申请到批准前后只有两个月,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在上海世界经济研究所的申请办报报告中并没有申请划拨办报的经费、印报的纸张,以及下达必需的人员编制额度。反而是承诺:印刷、发行等方面的问题自行解决,连新闻纸张当年也没有让国家计划另行拨付。

这是因为,当时一切都是计划管理,加上十年“文革”的损失和破坏,国家百废待兴,政府财政能力极其有限。如按常规把办报相关的经费、纸张、人员编制等都申请下来,这张报纸还不知何时才能出版。

但是,经费、纸张、人员这三大问题是必须要解

决的,否则报纸无从办起。上海世界经济研究所和参与筹办的老报人集思广益,抓住资金经费这根主线,将其分成印刷、纸张、人员办公费用三部分,想方设法在计划管理的体制中找到合适的突破口,逐项分开解决。

他们找到上海解放日报社,希望在其报社印刷厂赊账排版、印刷,全部费用年底结账。同样找到文汇报,希望先借印报新闻纸30吨,也是年底结账。当时上海两大报社的报人似乎有一种默契,十分支持这份经济报纸在上海创刊,协商都成功了。办报的两大问题就这样迎刃而解。据说,当时解放日报社的夏其言、文汇报社的刘文华等人在这上面给予了很大的支持。

靠信誉抵押,通过赊账的方式,在没有政府财政一分钱直接拨款的情况下,这年《世界经济导报》共出了14期报纸(包括试刊号)。尽管当时报纸发行并不理想,如年底的第13期,印刷厂印了100200份,邮局仅承担发行了22404份。这主要是与当时邮局发行报刊一年只能征订一次,不能破月破季订报有关。但是,编辑部还是依靠这年报纸的发行和广告收入,不光结清了全部的排版、印刷和纸张等开支费用,而且当年账面就结余了13087.77元。老报人用了当时最时髦的新词“我们是万元户”。这年,办报的办公等费用则是由上海世界经济研究所承担的。

由于第一年办报就实现了盈利,再申请财政拨款已无必要,因此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创办的报纸中,这份报纸可以说是唯一一份没有获得过国家财政拨款创办的报纸。而且在之后的自主经营中,年盈利也是逐年有所增长。

解决人员问题相对比较复杂,只能在人事计划管理的条条框框内寻求合适、有利的政策和规定,采用多种方式设法解决。利用上海世界经济研究所的已有编制额度,尽可能商调进编制内的办报人员,但是由于人事管理制度的种种限制和管理框框,商调编制内人员进展一直不顺利。而利用当时研究所可以自主聘请已退休的专家、学者和专业人员这一政策,从社会上招聘已退休老报人,则解决了办报人员的来源问题。十多位已从不同单位退休的老报人,通过退休补差工资的办法来到上海世界经济研究所,参与报纸的前期筹备工作。按照当年的规定,聘用退休人员的薪金只需补到退休前工资

水平即可。当时这些老报人退休工资一般仅100元人民币左右,为原在职时工资的75~80%,应聘后实际每人每月补足金额一般也就十几到三十多元。老报人虽然只能获得微薄的这点补贴,但怀着重回新闻报业的一种激情以及对新闻事业的执著感情,他们无怨无悔。

老报人的激情和探索勇气

当时,参与这份报纸筹备和初期工作的老报人的经历就像一部当时中国的新闻报业史,他们有新闻从业的激情。曾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敌占区和大后方努力宣扬抗日、维护民族尊严;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国统区积极传播民主思想,揭露官僚资本真实面目;50年代,响应“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曾尝试突破千报一面,官样八股的办报形式,参与办张“知识分子喜闻乐见的报纸”。

他们有新闻从业者的强烈责任感。为国强民富,社会发展,追求真理;以多角度眼光,客观公正,寻求事实真相;怀着强烈的责任感和时代感,探寻社会发展中的问题。政治运动中所遭遇的诬陷和迫害,更增强了他们追求真理,追求民主的信念。

报纸筹创初期的工作条件非常艰苦。没有专门的办公室,只能挤在上海世界经济研究所的资料室。最初的十来位老报人挤占了资料室的半间屋子,他们几人合用一张办公桌,三人合坐一条长板凳。当时研究所资料室是在大楼顶层上的简易房内,冬天寒风、夏天酷暑。老报人为创办这张报纸与研究所资料室工作人员一起度过了近十个月。老报人不讲条件,只求工作,就是真正的新闻工作。由于聘用退休人员审批程序有时要花上几个月,但是,老报人一听说正在上报批准,就迫不及待地赶来上班,不少人往往开始的几个月还拿不到任何补差津贴,甚至连上下班的公交月票都要自己掏钱购买。有的老报人为了与作者联系,甚至自己掏钱买邮票寄信函。尽管这样,老报人寻稿源,找资料,访作者,编信稿,想的就是把过去因政治迫害而损失的工作时间都在这时补回来。

从“文革”和多年“左”的枷铐中解放出来的老报人,似乎找回了年轻时追求进步的激情,本着“学术民主”,“百家争鸣”的宗旨,不断探索在中国办经济报纸的方式和模式。他们逐渐摸索出办好这张

经济报纸的重要特色。1980年10月22日,以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和《世界经济导报》编辑部名义向学会顾问和理事提交的“《导报》汇报”中,就这份报纸的报道方针重新定位为:“针对我国四化建设中经济改革的实际需要,报道外国经济建设的成败经验,介绍各国经济发展情况,分析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普及世界经济知识,突出知识性(包括学术性)、针对性、战斗性,兼有新闻性、趣味性。”

针对性。报纸以显著的版面位置针对我国当前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突出地介绍国外真实情况,并有计划组织许多专题版面,从各个角度提供国外经济建设经验,以资借鉴和吸取教训。

知识性。报纸每期均有一定的篇幅刊登若干知识性文章和资料,帮助读者消化和理解各版的重点文章,增加读者世界经济方面的常识。这对当时世界经济知识还十分匮乏的国内读者来说,这张报纸知识性确实很强。而且这类文章同时还被全国各地报纸,甚至是香港的一些报纸转载。

新闻性。把专业性、学术性的文章通俗化、普及化。抓住新闻性,将枯燥的经济理论文章改编成短小精悍文章,将大量的经济数据绘制成图表,让专业读者在繁忙的时间里能快速了解主要内容,让普通读者尽可能读懂深奥的经济理论和繁杂的统计数据。

趣味性。把报纸的新闻性与期刊的相对稳定性相结合,报纸杂志化、杂志报纸化。在报纸的版式上不断创新,四开小报尝试对开大报的编排方式。专设“副刊”版,在大量经济文章的版面中还有一处刊登闲人趣事的轻松之地。

这份报纸开始就提倡一种简朴的文风。报道力求客观公正,力戒片面性。文字深入浅出,力避八股腔。从试刊号开始,报纸编辑部内部就规定:学者、专家的名字前不加“著名”等帽子,官员只用简单的官衔,名字后面也不加“同志”这一称呼,这些在当时已属全国唯一。

对于报纸的新闻管理体制,老报人更是怀着总结历史经验,本着“在商言商”办经济报纸的精神,探索、尝试新的模式。

探索、尝试报道内容“文责自负”的模式。就是报纸对内容把关,作者对事实负责。老报人在报纸创办一开始就尝试实行主编负责制。对版面内容、

文章实行副主编分工负责,主编最后“把关”的管理方式。报纸的两家主办单位从不要求预先审查或过日报纸的主要版面和重要文章。而且当时的上海新闻宣传主管部门也不要求对这份报纸报道内容进行预先了解和审看。不送审,不预审,创办初期就逐渐成为这份报纸经营者和上级管理者间的一种“默契”。

探索、尝试以内容择稿的选稿方式。老报人对于来稿,不看官衔、知名度,就看其内容。只要对社会发展、对四化建设有利的文章尽可能地编辑刊登。他们把这作为选稿、用稿的原则。当时的报刊,对一些不熟悉的作者有种不成文的规矩,就是会对作者进行所谓的“政治背景”了解。老报人自身的经历使得他们对这种做法“深恶痛绝”。因此,报纸编辑部从来不对作者进行这方面的了解和调查。如,报纸第4期曾刊登“资本主义没有进入第三阶段”一文,在当时引起很大反响。发稿时,编辑部只是认为这篇来稿思想解放,提出的观点很有针对性,便在学术版作为版面头条,并给予加边框的突出处理,但是对作者情况则一无所知。文章刊出后,作者来信说:“感谢你们对一个无名读者的热情支持。”“我今年刚满十九岁,是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的二年级学生。我自幼矢志于社会科学,写了几百篇文章。但我听说在报刊上发表有关世界经济文章的都是白发专家,一个乳臭未干者的文章是很难为编辑看得中的。因之,我就没敢写明自己的身份——事实证明你们并不在乎这些。”

报道世界经济应该包括中国经济

创办这份报纸,当时同样得到上海世界经济研究所上下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从各研究室专家参与内容策划、提供稿件、翻译资料,到资料室提供场地,以及办公室的人事和后勤支持,都为报纸的创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试刊号4月19日出版,报名为《世界经济报》双周刊,四开八版,报名下标明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主编(仅此一家主办单位)。

试刊号的内容完全按照最初“出版计划(草案)”中所设想的,全部报道境外的世界经济。第一版头条文章是“金价狂涨猛跌震动西方世界”,并为此在后面用两个版面配合刊登国际黄金市场问题的专

文。其他有“香港经济起飞的奥妙”、“评卡特反通货膨胀计划”、“苏联经济体制改革陷入困境”、“南(斯拉夫)、匈(牙利)、罗(马尼亚)经济体制改革的特点”、介绍“美国经济学的新流派——刺激学派”等。

6月,北京、上海两家研究机构决定合办这份报纸,并将报名正式定为《世界经济导报》后,报纸编辑部一位副主编即请好友书写了这六字报名,这位好友也是大师叫孙璞,即以后在海外声名远扬的木心先生。

创刊号6月21日面市。报名下是: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主编。报纸零售价为六分。

创刊号报纸为8版,其中第一版,刊登美欧经济消息4篇,主要是《美全国经济研究局宣布:美国出现战后第七次经济衰退》《石油输出国组织决定调整油价》,以及1篇当期报纸文章的提要。第二版刊登许涤新:《美国经济掠影》的整版文章。第三版为“世界经济”,有黄逸峰:《访日漫谈》和《美国经济衰退在深化——美国官方公布的数字》等。第四版为“国际金融”,除刊登当时国际金融市场形势分析外,专辟有“国际金融基本知识”专栏,介绍“国际结算”。第五版为“国际贸易”,有专访、市场信息,还专文介绍“三来一补”等对外经贸小常识;第六版为“学术理论”;第七版为“企业管理”,首篇文章在谈到中小企业时就提出“谈到现代工业生产,人们很容易单纯着眼于大企业,似乎中小企业已是微不足道。其实,这完全是一种错觉”。第八版刊登“答读者问”、国际金融行情,以及征订启事等。

这份报纸从试刊号开始就每期刊登近期国际金融市场行情,包括人民币汇率,这在中国当时公开发行的报纸还属首次。那时计划经济下的中国,人民币汇率属于国家机密,常人查不到,连要了解国外金融市场行情也很难。报纸首次把它公布在公开出版的报纸上,并一直坚持,以后还增加国际商品市场行情,这对当时中国开始的对外开放意义重大。同时,报纸还恢复了20世纪40年代上海经济报刊编辑每日“大事记”的这一传统。

试刊号出版后不久,编辑部就收到了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中国著名经济学家陈翰笙先生写来的“读后意见”一信。翰老在信中说:“这样的双周报在上海尤其受到欢迎,因为这里是全国工商业



1980年12月《世界经济导报》首任领导成员摄于上海虹口公园鲁迅坐像前。主编钦本立(中间), 副主编李鸿礼(左一)、陆平(左二)、胡塞(右一), 经理蒋湘军(右二)。(陆平提供)

最发达的地方。但因‘四人帮’长期压制舆论,所以到现在才能创刊,今后定能畅销。”“但关于中国的报道也应包括在内。名为世界经济就不能不把中国包括在内。如果不包括中国则读者的范围必然受到限制。”同时,他对于如何报道中国经济还提出了多条建议。

不过,报纸创刊号仍以报道海外经济为主,仅有少量的中国对外经济信息。主要是两篇文章,分别是钱俊瑞对记者谈“世界经济研究与我国现代化”,以及报纸编辑部记者采访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北华的访问记:《港澳人士关心八十年代中国经济》。只是从第2期开始,将中国石油开采对外开放合作的报道做了第一版的头条之后,报纸对中国经济报道篇幅才越来越多,中国经济的报道也逐渐占据了该报第一版的主要位置。

创刊号的这些老报人

《世界经济导报》在其试刊号的编者话中曾提到:“中国走向世界,中国需要了解世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同世界经济的关系正日益密切。”希望通过这张报纸“能为读者打开一扇了解和研究世界经济之窗”。几年之后,报纸明确提出自己是“中国读者了解世界经济的窗口”,“国外读者了解中国经济的窗口”。

这一“窗口”创刊时,先后加入并参与工作的老报人有:任嘉尧(61岁)、陈善政(61岁)、陈禾章(65岁)、王祖荣(62岁)、郑永欣(62岁)、李厚成(62岁)、胡塞(56岁)、邵琼(54岁)、朱嘉树(65岁)、孙征羽

(64岁)、蒋湘军(69岁)、刘洪尧(65岁)、魏滨(60岁)、钱台生(73岁)、汪飞鹏(61岁)等人。加上在编人员2位,平均年龄62.1岁。到1980年年底,整个报纸编辑部(包括经理部门)已有40人,其中聘用老报人30位,在编人员6位,借用其他人员4位。

参与创刊号出版的上海世界经济研究所在编人员是钦本立、李鸿礼,他们两位也是老报人,后来分别担任报纸编辑部的主编和常务副主编,筹备和初创时期的工作也是由他们两位筹划、主要运作的。

钦本立,当时62岁,职务是上海世界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兼副所长。他曾就读浙江联合高中、重庆朝阳大学政治系,都因为读书期间有严重的“左”倾思想,不能毕业,被肄业。1944年参加的第一份工作是做晚班记者,以后在重庆《商务日报》、上海《文汇报》任经济记者,所报道国民党官僚资本经济的文章内容,曾被1946年11月15日延安《人民日报》和这年出版的陈伯达《中国四大家族》一书所引用。上海解放时,以地下党员身份参与《申报》接管工作,任《解放日报》经济组组长,其间还出任《新闻日报》采访部主任。著有《美帝经济侵华史》一书和《粉碎美国武装日本的阴谋》小册子。1953年1月调《人民日报》任财经组组长、国际部美洲组组长。1956年参与《文汇报》回上海复刊工作,出任党组书记、副总编。1957年3月至5月,《文汇报》总编辑徐铸成访问苏联期间,作为第一负责人主管报纸的出版。后受党内处分,调华东局任内刊编辑。“文革”中受审靠边。1978年12月,错误处分撤销,调上海社会科学院任党委委员和该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兼副所长及《社会科学》主编。1991年因“导报”事件等错误,受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1991年4月15日3时10分因病逝世,享年73岁。

李鸿礼在报纸创办的第二年就因病逝世。他1945年参加党领导的进步新闻事业,历任上海《文汇报》记者和香港《文汇报》驻上海“地下记者”。全国解放时,参加全国政协筹备处工作,后任职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和工人日报社。1958年后蒙冤受屈20年,1979年获得平反,从黑龙江回沪就全身投入到这份报纸的创办工作,终因积劳成疾,患癌症医治无效,不幸逝世,终年57岁。■

(责任编辑 徐庆全)

我了解的西北革命根据地肃反

○ 宋金寿

《炎黄春秋》2011年第8期发表了王晓中的《中顾委主持解决“西北问题”》一文,对于中顾委解决“西北问题”作了一个较好的评说,但认为西北革命根据地肃反是“一场自上而下、自相残杀的‘肃反’运动”,“手段竟是刀砍和活埋”;并认为西北局高干会对“西北‘肃反’的性质和责任等重大原则问题终于有了一个完整的正式的结论”,还把“分清路线是非”作为解决问题的方针等,值得商榷。

对于“西北问题”,笔者曾因为协助李维汉整理初到陕北时期的回忆录,就西北革命根据地肃反问题作了些调查研究,查阅了许多历史资料,走访了一些主要当事人,如王首道、程子华、张秀山、刘景范、蔡子伟和郭洪涛等人,整理了他们的谈话记录,并经他们审阅,现在成了十分重要的历史资料。故而觉得《中顾委主持解决“西北问题”》一文,在西北革命根据地肃反的事实上和观点上有不少值得商榷的地方。

西北革命根据地肃反的基本事实

关于1935年九十月发生在西北革命根据地的肃反,如何界定,该称其什么,至今说法不一。1935年11月26日的《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称其为“陕甘区域内张慕陶反革命派案件”^①。1942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关于1935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及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则采用“陕北(包括陕甘边及陕北)肃反”的说法。^②1983年7月13日,《中共中央关于印发〈五人小组对于解决西北历史争论问题的分析和方针〉的通知》,即中共中央(1983)28号文件,则称其为“一九三五年的错误肃反”。^③同样,在许多老干部的回忆,或传记及文章中,对西北革命根据地肃反,在称谓和定性上,更为紊乱,极不一致,有的称:“陕北错误肃反”(李维汉),“陕北

(包括陕甘边)的错误肃反”(郭洪涛),或者“刘志丹案件”(王首道)和“刘志丹冤案”(聂洪钧),还有“陕北‘左’倾肃反”(张秀山)等等。这些称谓和定性存在着不少偏颇,而且容易产生误解和混淆,例如“陕北错误肃反”,容易误解为原陕北革命根据地的肃反;再者“陕北(包括陕甘边)肃反”,或“陕北(包括陕甘边及陕北)肃反”,在地域名称上内涵外延互相混淆,又不能包容;而所谓“刘志丹案件”、“刘志丹冤案”则把问题的性质改变了,范围也收窄了,似乎肃反只是针对刘志丹个人似的,不利于对事件作实事求是的科学评价。同时,几乎所有的回忆或文章,对整个西北革命根据地肃反缺乏总体和实质性的评估,且在许多主要问题上含糊其辞。

笔者以为应还其历史本来面目,以1935年11月26日《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的称谓“陕甘区域内张慕陶反革命派案件”为准。因为,这个称谓既有区域性的外延,又有明确的事件内涵——张慕陶反革命派。事实上,从逮捕人犯开始,直至中共中央抵达西北革命根据地重新审理和处置这件事,基本上发生于原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区域内,一直有所谓“张慕陶反革命派”这个主要因素。因此,称其为“陕甘区域内张慕陶反革命派案件”是合乎历史实际,并反映历史原来面貌的。但是,在肃反过程中确实又超越了这个范围,把事件“扩大化”了,包括所谓“来路不明”的人和从西安派来的“特务”等,及至逮捕刘志丹、高岗、张秀山、杨森等数十人,事情就闹得更大了。从这个意义上说,称其为“西北革命根据地肃反”,或“西北苏区肃反”(这两者应该是完全一致的)也未尝不可。就现在党史类书籍中称“苏维埃区域”为“革命根据地”的惯例来看,称“西北革命根据地肃反”(本文以下以此称为)是最合适的。

据亲历者,包括肃反主持者和受害者的回

忆,及历史资料,1935年9月底,或10月初,首批逮捕了蔡子伟、黄子文、张文华、姜旭、张庆孚、张文舟、李启明、李西萍等。这些人的逮捕标志着西北革命根据地肃反的开始。

逮捕他们,一是因为他们与张慕陶有“牵连”;二是因为他们“来路不明”,或者说是西安派来的“特务”。这是在以朱理治为书记的中央西北代表团领导下,在后方(先在永坪,后在瓦窑堡)由西北保卫局局长戴季英,前方由西北军委书记聂洪钧执行。当时,就是否逮捕他们,也征求过刘志丹、高岗等人的意见,并表示同意的。1939年9月《关于开除蔡子伟、鲍××、艾××党籍的决议》说:为着巩固党,严密党的组织,提高党的警惕性,开展党内反奸细的和反阶级异己分子,及贪污腐化分子的斗争,第二次党代会决定开除蔡子伟的党籍,说蔡子伟与“张慕陶等勾结活动”,“暗地进行破坏党的活动”,“从各方面证明他是久已混在党内的奸细。因此,决定永远开除蔡子伟的党籍,并交政府处以极刑。”^{注4}这样严厉地处理一个“高级”干部,高岗作为当时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书记,如果不是直接经手,也是应该知道的。到了1942年10月的西北局高干会,高岗在《边区党的历史问题检讨》的讲演中说:“这一右倾当时是以张文华、张资平等为代表的,后来这种右倾思想又为黄子文利用来一贯的反党活动。这一右倾立刻受到打击,1931年4月的省委全体会议坚决与这一右的倾向进行了斗争,开除了张资平、张文华等的党籍”。又说:“黄子文又由西安跑来了,他提议要成立陕西省委(1933年7月,陕西省委因杜衡叛变,遭到破坏——笔者注),名单是些什么人呢?他提出李杰夫、张文华、王林、蒲建生,还有他自己,并且要我参加。我晓得这些人全是右派分子,可以看出黄子文当时是想进行右派活动的,所以不但没有同意他,而且把他留在苏区,加以考查,并写了反对右派活动的文件派骑兵团到处发散,揭破其反革命活动的阴谋以后,黄子文就到处散布谣言,如说刘志丹和我是‘希特拉墨索里尼专政’,



刘志丹

说我们‘不要陕西省委会,走到反革命道路’等等,于是我们就将黄子文关起来进行考查,并揭破了黄子文的政治面目。”^{注5}这里,高岗不仅认为黄子文是“右派”,而且说李杰夫、张文华、王林、蒲建生也是“右派”。以上事实说明:把蔡子伟、黄子文、张文华作为“右派”,不只是朱理治、郭洪涛、戴季英、聂洪钧等人,至少高岗并不例外。

戴季英在主持肃反时,大搞“逼、供、信”,戴季英仅凭口供,甚至“辗转口供”,即捕人。张秀山、刘志丹、高岗、杨森等数十人先后被捕,就是这种“逼、供、信”的结果。

正在此时,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在下寺湾听取了郭洪涛等人的汇报,并决定由洛甫、博古、刘少奇、邓发、董必武、李维汉率中央机关从下寺湾直接去瓦窑堡(中央西北代表团和陕甘晋省委驻地,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心)。11月中旬,到瓦窑堡后,在博古指导下成立了由董必武(主任)、王首道(红军保卫局长)、张云逸(代表军委)、李维汉(中央组织部长)、郭洪涛(陕甘晋省委副书记)等五人的党务委员会直接审理和处置西北革命根据地肃反问题。实际工作由王首道负责,刘向山协助。11月26日作出了《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指出:“过去陕甘苏区存在着以黄子文、蔡子伟为首的反革命小组(他是直接受反革命的张慕陶指使的),假借着党与苏维埃公开的名义,戴着‘红帽子’混入边区南区与苏维埃政权和某些红色武装部队中,一方面夺取党与政权的领导机关,公开散布右派取消主义的主张和影响;另一方面秘密的进行挑拨离间与一切反党反革命的阴谋活动,造成边区党与陕北党的对立,红二十五军与二十六、七军的猜疑,来破坏党的一致与削弱和瓦解革命力量的团结;尤其是利用党内存在着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做他们的帮手,实行压制群众斗争,阻止分配土地,破坏扩大红军,取消党的领导,从各方面有计划的曲解党的路线,破坏苏维埃各种基本的政策与法令的执行,以致造成边区南区工作中严重的

现象。”又说：“过去陕甘晋省委领导反右倾取消主义斗争与坚决肃清反革命右派的斗争，一般的是必要的，正确的；但个别领导同志认为右派在边区南区和红二十六军中，有很大的基础，夸大反革命的力量，在反革命面前表示恐慌，因此在肃反斗争中犯了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和‘疯狂病’的严重错误。”最后，决定号召“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从各方面开展与右派和一切反革命的斗争”^{注6}。这就是说：西北革命根据地肃反是“必要的，正确的”，只是“个别领导同志犯了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和‘疯狂病’的严重错误”，有“扩大化”现象。并在11月底，开了一次平反会。在会上，宣读了《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王首道代表党务委员会宣布：刘志丹等数十名同志是无罪的，党中央决定立即释放，并且分配工作。

稍后，张庆孚（被证实确系上海临时中央派到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代表）、蔡子伟（与张慕陶的关系得以澄清）、姜旭、张文舟、李启明等也都无罪释放。

但是西北革命根据地肃反并没有就此结束。由董必武主持公审，判处了李西萍的死刑和黄子文、张文华的有期徒刑。这个基本历史事实，笔者是在采访王首道时，第一次听说的，王老说：“涉及肃反的还有一些人。记得有一个叫李西萍的，也认为他是右派，由董必武主持公审，最后枪决的。”^{注7}在朱理治回忆录中，也说：“中央到瓦窑堡以后，经过亲自审问，确定了李西萍等人的政治历史问题，并举行公审，枪决了李西萍”。^{注8}

关于判处黄子文、张文华的有期徒刑问题，虽然没有人说，但在1937年8月19日《新中华报》第2版上有一则《政府决定特赦许世友等八人》的消息，说：“苏维埃政府主席团日前开会，对于特赦许世友等八人案有所讨论。最后决定认为许世友等八犯在押期间，尚有悔悟，在抗日的大前提下，他们愿为抗日出力，为国牺牲，故决定在未满刑期前，特予赦免，俾其参加抗日工作。”在所列八名“案犯”中，除许世友等六人以外，有黄子文、张文华两人，说：“黄子文刑期三年，张文华刑期二年。以上二人因前与张慕陶等反革命派有关，破坏苏维埃法令，违反党的路线。亦予以赦免。”这是说：黄子文、张文华是因为与“张慕

陶反革命派有关”，而被判刑的。所谓“陕甘区域内张慕陶反革命派案件”，或者说西北革命根据地肃反，到李西萍被判死刑和黄子文、张文华被判有期徒刑，并实际执行，才算告一段落。

西北革命根据地肃反结束以后，刘志丹、高岗、张秀山等人的“反革命”帽子是摘了，但“右倾取消主义”的帽子没有摘。一些人仍然认为刘志丹、高岗、张秀山等人，虽然不是反革命，但思想右倾。李维汉在回忆录中说：“由于‘左’倾路线没有清算，陕甘边的地方干部和军队干部仍然戴着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所以对他们的工作分配，特别是对一些高级干部的工作分配，一般是不公正的。”“1937年去陕甘省委工作期间，在省委和关中特委，我先后听到习仲勋、张邦英、张策、刘景范等的叙述，才认识到错误肃反的根源和1935年《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也有缺点错误。回延安后，我向毛泽东、洛甫作了反映。”^{注9}1981年3月21日，笔者走访张秀山，他说：“党中央关于肃反问题的结论不彻底。当时，把刘志丹等的‘右派’帽子摘了，但是‘右倾取消主义’的帽子没有摘。一直到1938年2月，我给党中央写了信，中央在蓝家坪开会，这次会除了毛主席未参加，其他在延安的中央委员都参加了。高岗、郭洪涛也参加了。会上，批评了郭洪涛。这次会才把这些同志的‘右倾取消主义’的帽子摘了。”

以上就是西北革命根据地肃反的基本事实，也是评价西北革命根据地肃反的基本依据。所谓“一场自上而下、自相残杀的内部‘肃反’运动”之说，有点“简单”和“轻率”。至于“手段竟是刀砍和活埋”，纯属“子虚乌有”。

肃反与路线斗争，从根本上说是两回事

在西北局高干会期间，1942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1935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及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说：“中央根据10月陕甘宁党的高干会议对于陕北历史问题的检讨与结论，认为1935年九十月间朱理治、郭洪涛等同志所主持的‘肃反’将陕北苏区和红军创造者，刘志丹、高岗、张秀山、杨森等同志逮捕，并

杀害了二百以上的党政军干部,这种将党的最好干部,诬认为反革命分子,加以逮捕和杀害,不仅完全是错误,而且是革命的罪恶。从陕北历史问题检讨中,可以看出在这一错误肃反开始之前,陕北党内曾发生了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一方面是以刘志丹、高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这一路线之下,创造和发展了陕北的苏区与红军,另一方面是以朱理治、郭洪涛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这也是遵义会议前一个时期内在党内曾占统治地位的路线——这种路线几乎使陕北的苏区和红军全部塌台。由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发展的结果,由于朱理治、郭洪涛二同志个人主义、高度领袖欲和政治野心家的恶劣品质,以及他们打击刘高抬高自己预定的企图,就把党内的原则斗争发展成为党外对敌斗争的性质。他们企图用这种方法,来压倒刘志丹、高岗等同志所执行的正确路线,并满足自己篡夺整个陕北党政军领导地位的目的,这样就造成了当时杀害和逮捕执行正确路线的领导干部,造成了极大的罪恶。假若不是中央到达陕北制止这一错误肃反,且判定这些被诬陷的同志并非反革命,则陕北的苏区与红军有全部丧失的危险。”

又说:“朱理治同志是当时陕北党的最高负责人(代表团书记和陕甘晋省委书记)。他在1935年夏来陕北前,即抱着陕甘党内存在右倾机会主义的成见。来到陕北后,便以钦差大臣的架子,不与刘志丹、高岗同志作任何谈话,不作具体情况的调查研究,只是片面听信郭洪涛同志关于苏区红军党和群众工作及干部等方面的情况报告(郭是1933年底到达陕北,曾以钦差大臣的身份打击过陕北特委重要负责干部马明方、1934年7月在阎家洼子会议上又打击过刘志丹、高岗,企图夺取二十六军及陕甘党的领导地位,但这种企图受到抵抗而未能成功)。而郭洪涛同志所供给的报告材料,基本上又是挑拨离间造谣中伤的性质。这样就造成了他们对陕甘边及二十六军的主要干部是右倾取消主义者和右派反革命的包庇者(其实刘高曾对右派作过斗争的)的共同认识。在党的刊物上和会议上,有意识的打击刘高张等主要干部,而且在西北工作委员会执委扩大会议的决议文件中公开指出:‘这种右倾取消主义者,他们企图阻止党的正确路线的执行;这种右倾机会主义者,在事实上他们表明要取

消阶级利益,他们是阶级的死敌……(省略号是原有的,下同——笔者注)动员全党同志一致的揭发这些右倾取消主义与机会主义的欺骗叛卖作用,只有坚决的斗争与驱逐右倾取消主义与机会主义的分子……这样在思想上政治上作了‘肃反’的准备。而红二十五军的到达陕北,其领导者又带有过去鄂豫皖张国焘时代错误肃反路线的影响,以及在陕南错误处理张汉民问题的成见,因此他们的到达,对朱理治、郭洪涛实行错误肃反起了有力的支持作用。于是就促成了这一错误肃反的爆发。张国焘时代鄂豫皖保卫局任过审讯科长的戴季英同志,被任为当时的保卫局长,他在这一错误肃反中起了积极赞助作用。聂洪钧同志当时任陕北军委主席,他在前方主持这一‘肃反’,部队中二十六军的干部被逮捕杀害者特别多。”

决定就此作出处理:“朱理治、郭洪涛二同志本应开除党籍。估计他们曾为党作过一些工作,本着中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各予以最后严重警告之处分,撤销朱理治同志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之职务,撤销郭洪涛同志山东分局书记的职务,并限定朱、郭两同志在三年以内不能担负重要的党的工作。由中央组织部与西北局继续搜集材料,如果发现他们还继续对党欺骗,而不诚意改正他们的错误,党就必须重新讨论他们的党籍问题。”“戴季英、聂洪钧二同志是当时‘肃反’的坚决赞助者和拥护者,而他们在高干会上对自己错误的承认也还是不坦白不诚恳的。现在中央认为中央(当时称西北中央局)党务委员会1935年11月卅日的决议,对于戴季英、聂洪钧二同志的处分(给戴季英同志以最后警告,给聂洪钧同志以严重警告)仍然是有效的。同时应当指出:程子华同志在这一错误肃反中,也应该负一些责任。”“中央认为在1935年以前陕北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刘志丹、高岗等同志所坚持的政治路线和立场是正确的,而朱理治与郭洪涛所执行的路线是错误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注10}

上述内容应该说,就是《中顾委主持解决“西北问题”》一文作者所说的“西北‘肃反’的性质和责任等重大原则问题终于有了一个完整的正式的结论”。

笔者以为,从历史事实本身来说,有些问题还是值得探讨的。

首先,把肃反事件完全纳入了所谓“两条路线”的斗争,并不恰当。在协助李维汉整理回忆录时,李老有个交代:“陕北的路线问题现在未作结论。以后去访问调查,不要问路线。我们不管路线问题。只搜集史料。”^{注11}意思是只调查肃反问题,不管西北革命根据地的路线斗争问题。1981年6月11日,笔者走访王首道,王老说:“1942年召开的西北局高干会,认为这次



1935年5月,中共西北工委的同志与红26军、红27军部分领导干部合影(第一排左起:雷恩俊、王世泰、高启甫、白锋、胡彦英;第二排左起:郭洪涛、李仲英、李宗贵、吴岱峰、高长久、高朗亭、自治民、史秀云;第三批左起:龚逢春、鹏飞、齐渭川、许发善、张达志、张邦英、白如冰、白坚;第四排左起:黄罗斌、王达志、王国昌、孟寅生。)

审查肃反工作不彻底,进行了重新审理。其实,西北局高干会是解决党内斗争问题。我们当时只解决革命与反革命的问题。处理党内斗争不是保卫局的任务。当时,我们了解到直接主持肃反的,后方是戴季英,前方是聂洪钧,所以没有追究朱理治同志的责任,也没有追究郭洪涛同志的责任。”这里,王首道也说得清清楚楚,肃反是解决革命与反革命的问题,路线斗争是解决党内斗争问题,完全是两回事。在这个问题上,高岗、张秀山等人实际上也是这样认为的。在1942年的西北局高干会上,高岗在《边区党的历史问题检讨》中说:“能否说两条不同的路线斗争就一定要发生‘肃反’呢?不能这样说,从路线斗争转到肃反的关键是个人品质的问题,就是说朱理治、郭洪涛极端恶劣的个人品质在那里作怪,不然在党的路线正确的时候,朱理治在河南、郭洪涛在山东,为什么又搞了许多错误呢(此话为‘不实’之词——笔者注)?这次大会的检讨已经把朱理治、郭洪涛的个人品质完全彻底的暴露出来了,原来他两个是毫无党性的极端的个人主义野心家,一个追求的是‘钦差大臣’,一个追求的是‘土皇帝’,一切以个人利益出发,把党的利益服从于他们的个人利益,抬高自己,打击别人,一直发展到牺牲别人来满足自己个人主义的欲望。”^{注12}张秀山也说:

“两条路线斗争是否不可避免地要走到肃反?我说:两条路线斗争不一定要走到肃反。红二十六军党内进行思想斗争,也没有肃反。为什么陕北1935年两条路线斗争要发展到肃反呢?采取党外斗争的方法,用对付敌人的手段来对付党内思想斗争?这几天大会上许多同志都说到了。所以走到肃反,个别人是起了决定作用的。”^{注13}也就是说,肃反除了两条路线斗争,还有朱理治、郭洪涛“极端恶劣的个人品质在那里作怪”。高岗、张秀山是通过“极端恶劣的个人品质在那里作怪”把路线斗争与肃反联系起来挂上钩的。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本文在前面已经说过,在逮捕蔡子伟、黄子文、张文华等人的问题上,高岗等人也是同意的,至少没有反对。也就是说:他们与朱理治、郭洪涛在逮捕蔡子伟、黄子文、张文华等人的问题上没有根本的分歧,也无所谓“斗争”。后来,逮捕张秀山、刘志丹、高岗等人是逼供信的结果。蔡子伟承认“严刑逼供的情况下,屈打成招,违心地被迫错说了一些好同志”。据知:张秀山在严刑拷打之下,也供出了一些人。在肃反过程中,逼供信确实是非常严重的。王首道说:“材料上说,张秀山同志在被吊起来以后,就承认是‘反革命’;放下来以后,就反供。反反复复最典型。我们就知道这是逼供信一套的结

果。”由于逼供信，牵涉的人越来越多。应当说，肃反后来的发展，与朱理治、郭洪涛所持的路线和个人品质没有关系。相反，郭洪涛还说：“杀了我的头也不相信刘（志丹）、高（岗）、张（秀山）是反革命”（参见中共中央（1983）28号文件）。所以，把肃反说成是“以刘志丹、高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与以朱理治、郭洪涛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斗争的产物”，是不妥当的，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其次，这个“完整的正式的结论”不但背离和抹杀了西北革命根据地肃反的许多基本事实，而且夸大和虚构许多“事实”：逮捕蔡子伟、黄子文、张文华等人的事实不见了；也没有“张慕陶反革命派”的问题；更没有中央到陕北以后，董必武主持公审“处决李西萍、判黄子文、张文华徒刑”的事实；只剩下了所谓“刘志丹冤案”，把历史引入了歧途。而所谓杀害了“二百以上的党政军干部”的罪恶，是由原中央红军的一个同志在西北局高干会期间的一次批判大会上说的，当时在场的没有一个人附和，就写进了决议。实际上，朱理治、郭洪涛并没有主持过杀人；戴季英虽然大搞“逼供信”，但也没有主持过杀人。在后方（先在永坪，后在瓦窑堡），只杀了李西萍，还是在中央党务委员会主持下进行的。前方的聂洪钧确实主持过杀人。据聂洪钧自己说，也只杀了一个人——姜旭之妻（曾出卖过革命同志；材料是由高岗等人提供的）。在各种历史资料和回忆录中，对于“杀害了二百以上的党政军干部”一事，都没有提出过确切的证据。张秀山在回忆录中也只提到了“于震西被杀”^{注14}一事。《习仲勋传》提得多一些，也只列了四个被杀人的名字^{注15}（与张秀山说的并不重复），一共有五个人。但他们都没有说：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为什么被杀，由谁主持被杀的。在这五个人当中，既没有李西萍，也不包括姜旭之妻。至于姜旭本人，在肃反之后，因为他刻得一手好蜡版，而利用了他，直到1938年在延安被康生所害（王首道、李维汉都说过此事）。对此，笔者也翻了不少有关西北革命根据地的资料，特别是西北革命根据



谢子长

地肃反问题的回忆录，或传记，再没有其他人提到被杀害人的名字。如果确有“杀害了二百以上的党政军干部”的罪恶，为什么不追究责任人？！1942年的中共中央决定虽说：“委托西北中央局负责向过去在错误肃反中被冤屈的同志解释朱理治、郭洪涛所主持的‘肃反’错误，并审查和恢复在‘肃反’中死难同志的党籍，且妥善慰问和安置其家属。”^{注16}但是，据笔者了解，并没有人去认真地做过“恢复在‘肃反’中死难同志的党籍”的工作，更没有抚恤其家属的行动。

第三，中共中央决定说：西北革命根据地肃反“不仅完全是错误，而且是革命的罪恶。”这个“完全”错误，包括不包括逮捕蔡子伟、黄子文、张文华等人，以及处决李西萍、判黄子文、张文华等人的徒刑？如果是，要不要为他们平反昭雪？如果不是，当然不用为他们平反昭雪。那么，西北革命根据地肃反是不是“完全”错误？这种不顾事实，不仔细慎重斟酌的结论，也是很轻率的。

第四，在一些具体史上也有失偏颇，例如“1934年7月在阎家洼子会议上又打击过刘志丹、高岗，企图夺取二十六军及陕甘党的领导地位”等的说法。实际情况是阎家洼子会议的主要内容有三项：一、总结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四十二师革命斗争；二、传达上海临时中央局、中央北方代表的两封信；三、研究商讨陕甘边、陕北革命根据地今后工作的方针、任务。会议肯定了陕甘边党和四十二师的工作。对于两封信，都感到那些空洞的议论，不符合实际的批评，没有也不可能解决任何问题，没有进行议论，就过去了。会议的中心则集中于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并取得了较为一致的意见。会议确实撤销了高岗的四十二师政委的职务，但接替四十二师政委的，不是郭洪涛，而是谢子长。

第五，对朱理治、郭洪涛的批判和处分“过头”了。正如胡乔木说的：“朱理治、郭洪涛的问题比较麻烦。朱、郭对当时的结论不服气，认为说得太过分了，他们个人的责任没有那么大。他们也不是说当时执行的路线是正确的，但许多事情不是他们个

人决定的。”¹⁷于是,西北局高干会前后出现了一种“诉求逆反”的现象:在西北局高干会前,高岗等人一方,不但要为他们平反,而且要摘“右倾取消主义”的帽子(其实早就做了),并承认他们为革命作出的贡献,实属正当(到西北局高干会也实现了);西北局高干会后,朱理治、郭洪涛要求得到公平公正的处理(由西北局高干会上的不当批判和中共中央决定的“过度”处分造成的),也属正当。但高岗等人当时处于强势地位,因此困难重重。由于高岗出事,朱理治、郭洪涛有了说话的机会。于是,才有1959年11月中央监委的《关于郭洪涛同志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意见》和《关于朱理治同志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意见》。这两个审查意见,纠正了郭洪涛、朱理治所谓“反对迎接中央和中央红军”、“有意陷害”刘志丹、高岗和在山东、河南“继续做坏事”,以及指责郭洪涛为肃反“主持人”等的错误观点。这就是《中顾委主持解决“西北问题”》一文作者所说的所谓“西北问题结论的反复”。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因为,朱理治、郭洪涛并没有在所谓“以刘志丹、高岗等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和以朱理治、郭洪涛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问题上翻案。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不敢”翻案,当时也不可能翻案,直到现在也没有翻案。

分清路线是非的标准

笔者在这里所说的“分清路线是非”,不是说笔者认可所谓“两条路线”斗争的观念。只是就处置西北革命根据地肃反过程中所牵涉的所谓“路线”问题,就事论事。

据知,由李维汉、王首道、冯文彬、荣高棠、何载组成的五人小组,其宗旨在于分清上世纪30年代前期以错误肃反为中心的一段历史的“路线是非”问题,以结束长久以来的激烈争论。由此形成的《五人小组对于解决西北历史争论问题的分析和方针》(以下简称《方针》)和中共中央的通知,即中共中央(1983)28号文件,订正了西北革命根据地肃反的部分历史事实,许多结论是有利于团结和谐的,应该肯定,但在说法上也有相互抵牾之处。

《方针》中说:“1935年的错误肃反是不是王明‘左’倾路线的产物?是不是王明‘左’倾路线

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恶性膨胀的产物?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¹⁸回避了1942年西北局高干会,及中共中央决定关于“以刘志丹、高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和以朱理治、郭洪涛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之间的斗争”的结论,这是一个进步,是正确的,也是有利于团结和谐的。但《方针》又说:“1942年中央直接领导的西北局高干会对错误肃反问题的处理是正确的。《中央关于1935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及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正确地分清了路线是非,指出:刘志丹等同志所坚持的政治路线和立场是正确的,而朱理治、郭洪涛所执行的路线是错误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从而回到了1942年西北局高干会,及中共中央决定关于西北革命根据地肃反是“以刘志丹、高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和以朱理治、郭洪涛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斗争产物”的结论。

如果说,后来逮捕刘志丹、高岗、张秀山、杨森等是以刘志丹、高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和以朱理治、郭洪涛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之间斗争的产物,那么逮捕蔡子伟、黄子文、张文华和姜旭等又是什么“路线斗争”的产物呢?因为刘志丹、高岗是同意逮捕蔡子伟、黄子文、张文华的(已在前面论述过)。董必武主持审判处决李西萍、判黄子文和张文华的徒刑,又算什么“路线斗争”的产物呢?再者,郭洪涛说:“杀了我的头也不相信刘(志丹)、高(岗)、张(秀山)是反革命”又是哪门子“路线斗争”的产物?显然,这是说不通的。以这样的“路线斗争”观念是不能分清西北革命根据地肃反问题是非的。只能造成,如《中顾委主持解决“西北问题”》一文所说的“事实上形成了不同的派系”。1980年3月4日,李维汉与协助整理延安时期,含初到陕北这段回忆录的同志进行了长达两个半小时的谈话,在谈到西北革命根据地和陕甘宁边区问题时,说:“边区党委在1937年开过一次党代表会,那时选郭洪涛当党委书记,高岗等反对。我奉命前去做工作,要他们拥护郭洪涛做书记。1939年又开党代表大会,要选高岗当党委书记,一部分代表又反对高岗。我作过这两方面的团结工作,都是中央指定我去做的。”在西北局高干会以后,这种情况更突出。在1945年7月初召开的西北党史座谈会上,李仲英与黄罗斌有次针锋相对的争论,李仲英

说：“对陕北党的估计是不够的，郭洪涛同志前，陕北党的正确路线的代表人物是谁？”“高干会上提出干部政策要看干部的德才资。我说，盲从为‘德’，吹吹拍拍为‘才’，服从个人为‘资’。干部政策发生这些偏向，说得重一点是闹宗派，说得轻一点是‘吃不开’，好象有亲娘后娘之分。”这显然是批评西北局，也就是批评高岗的。对此，黄罗斌则说：“李仲英同志认为我党在毛主席正确路线下，西北党在高岗同志正确领导下是‘以宗派反宗派’……这简直是造谣，侮辱我党的正确领导”。与此类似的还有：刘志丹与谢子长的地位问题，李仲英说：“对谢子长同志的估计是不够的。四二年高干会上决定修子长陵，现在还未修成，我不满意，对一样的领袖，为什么三等两样对待？”黄罗斌认为：“领袖问题。有三种意见：1、谢第一，刘第二；2、刘谢平行；3、刘第一，谢第二。我同意最后一种意见。”其结果，只能是“派系”分裂的进一步恶化。

王首道曾对笔者说：“在那个环境里，一是我们思想上的‘左’倾。二是对于陕北的情况也不了解，当时也认为有右派，以为黄子文、蔡子伟等是‘定型’的右派。于是在决定中就说：‘过去陕甘苏区存在着以黄子文、蔡子伟为首的反革命小组（他是直接受反革命的张慕陶指使的），假借着党与苏维埃公开的名义，戴着‘红帽子’混入边区南区与苏维埃政权和某些红色武装部队中’。”又说：“张慕陶确有其人。原是共产党员，是罗章龙右派集团的成员之一。后来在张家口搞察绥抗日同盟军。察绥抗日同盟军失败以后，张慕陶到山西活动，黄子文、蔡子伟参与了一段张慕陶的活动。张慕陶的组织是什么性质的，中央党史委员会应该研究。现在看，即使是右派组织，对其成员究竟应该如何处理也要研究。总不能把参加的人都说成是右派，至少也是应该争取的。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来看，把黄子文、蔡子伟作为右派也是不对的。黄子文后来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蔡子伟现任农业部副部长，工作得很好。实践证明：这些同志是好的，不是右派、反革命。”¹⁹这里，王首道说黄子文、蔡子伟等是“定型”的右派，是非常恰当的说法。它表明当时对于黄子文、蔡子伟等人，是不是肃反对象的问题上，不仅朱理治、郭洪涛、戴季英、聂洪钧认为他

们是右派，就是高岗也认为他们是右派（已如前述），即使是王首道、李维汉、董必武也认为他们是右派（董必武主持审判李西萍、黄子文、张文华一事就是明证），是肃反的对象。这就不能用以刘志丹、高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和以朱理治、郭洪涛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之间的斗争来解释，只能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来说明。

笔者特别欣赏《方针》中的一段话：“三十年代前期，我们的党还没有脱离幼年时代。武装革命和反对武装反革命，特别是创造农村根据地，还缺乏知识和经验。革命武装和根据地，由无到有，由小到大，不可能不经过‘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的过程。在这样曲折的过程中，犯一些错误，存在许多缺点，是不可避免的。各地发生这些错误和缺点，只能有性质和程度的差别，没有有无之分。”²⁰也就是说，在各个革命根据地的革命过程中，会有这样那样的错误，或大或小的争论，也就是所谓“两条路线”的斗争，怎样才能分清是非呢？唯一的标准就是革命实践。

拿西北地区来说，在1935年2月成立西北革命根据地以前，有两块革命根据地：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陕北革命根据地。这两块革命根据地，实际上都是在谢子长、刘志丹等领导下发生和发展起来的。在这里还排不上高岗等人的名字，高岗等人与谢子长、刘志丹对于西北革命根据地创建的功绩还是有一定距离的。简单地讲，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从1930年夏起，谢子长、刘志丹在陕甘高原进行革命的兵运工作开始，到1932年4月在甘肃正宁寺原村成立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从1933年初，至10月，建立了以陕西耀县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从1933年11月，至1935年2月，建立了以甘肃庆阳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并稳固下来，先后经历了六个年头。陕北地区原有大革命时期的发展基础，进入土地革命时期革命活动始终活跃，于1932年春开始进行武装斗争，并取得了胜利。1933年11月，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任命谢子长为西北军事特派员，回陕西领导游击战争。1934年1月，谢子长到陕北，与陕北特委共同领导工农割据武装斗争，革

命形势不断发展,1934年7月成立了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红二十六军配合,共同粉碎了西北军阀的第一次“围剿”。农历年底,在安定白庙盆成立陕北工农革命政府,宣告陕北革命根据地正式成立。两个革命根据地的建立,都是一个“‘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的过程”。1935年2月,两个革命根据地联合,成为西北革命根据地以后,革命形势有更大的发展,原来在地域上相互隔绝的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二十六、二十七两支红军,也得到了进一步壮大。所有这些,都很难用“以刘志丹、高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和以朱理治、郭洪涛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之间的路线斗争”来解释。

再者,高岗在西北局高干会上的讲演《边区党的历史问题检讨》中把1934年3月至1935年5月归结为与“郭洪涛‘左’倾机会主义与反郭斗争”时期,又把1935年7月至10月归结为与“朱理治‘左’倾机会主义与反朱斗争”时期。即使在这两个历史时期,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同样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土地革命也不断深入。

这就是说:就算朱理治、郭洪涛有“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也有发展;刘志丹、高岗的正确路线,也有挫折和失败,否则革命根据地何以“三移”其中心?!这是历史事实,也就是革命实践。

注释:

注1 《六大以来》(下),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72页。

注2 原件存延安革命纪念馆。参见《朱理治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417页。

注3 中共中央(1983)28号文件,第8页。

注4 《解放》1939年第95期第44页。

注5 高岗:《边区党的历史问题检讨》(高干会文献之四),1943年6月西北局印发第18页。

注6 《六大以来》(下),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72页。

注7 笔者1981年6月11日访问王首道的记录(已经审阅)。

注8 《纪念朱理治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452页。

注9 《回忆与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373页。

注10 中共中央的这个决定当时发到陕甘宁地方县级为止;军队发到团级为止。笔者是在延安革命纪念

馆,根据当时的文件抄录的;可参见《朱理治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417-419页。

注11 1980年3月4日,李维汉与协助整理延安时期回忆录同志的谈话(记录稿)。

注12 高岗:《边区党的历史问题检讨》(高干会文献之四),1943年6月西北局印发第35页。

注13 《我的八十五年》,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140页。

注14 《我的八十五年》,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85页。

注15 《习仲勋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08页。

注16 参见《朱理治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419页。

注17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7页。

注18 中共中央(1983)28号文件,第8页。

注19 笔者1981年6月11日访问王首道的记录(已经审阅)。

注20 中共中央(1983)28号文件,第6页。■

(责任编辑 徐庆全)

社科人文 文学小说 党建管理 经济管理 书画摄影

正规出书 约稿通知

书稿内容:(一)社科人文类书稿:回忆录、自传或人物传记、年鉴、社科著作等;(二)管理和学术类书稿:党建管理、行政管理、经济、金融或企业管理等研究专著;(三)文学类书稿:散文、诗歌、杂文、时评、游记、通讯等;(四)小说类书稿:历史、当代、言情、武侠、反腐等长篇、中短篇小说;(五)美术类:画册、书法作品集、摄影作品等。

书稿要求:书稿(作品)内容健康,艺术性强,底蕴丰厚,文笔流畅。字数为6-8万字以上,个人专著、多人合集均可,公开发表或未公开发表均可。

出版发行办法:以丛书形式或独立书号形式出版,以畅销书或合作出版方式运作;达到畅销书要求的,签订标准出版合同,按版税或买断方式支付稿酬;根据作品和作者意愿,面向国内或海外公开发行。其中国内公开发行的,由专业权威出版社出版,国家标准书号,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备案查询。

全国免费投稿热线:400-680-8368

投稿邮箱:北京朝阳区八里庄东里3号654信箱

综合编辑部收;邮编:100025

电话:010-57733088、57733087、57733086;

传真:010-89506878;在线投稿:bookbj@126.com

联系人:文馨、嘉悦、高晶(编辑)

新书欣赏、订购,请登录:<http://www.bookhk.net>

北京东方朝阳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在上海

○ 金大陆

1966年9月18日晚7时多,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印制了五千份《最最最紧急呼吁》(通过同济大学印制,申请数为一万份),全文如下:

全体在上海进行革命串联的北京红卫兵战友们:

我们决定于九月二十日(明天)开展一场更广泛、更深入的大张旗鼓的宣传毛泽东思想、十六条,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的群众运动。请首都红卫兵战友们于九月二十日上午八时在人民广场集合,统一行动。可以事先带好“武器”,如主席语录、十六条及推子(理发工具)和剪刀等,如有困难,请向有关单位联系解决。欢迎其它各地红卫兵积极参加。

显然,这是一项准备在上海市中心采取集体行动的通知,尤其标树“大破四旧”及要求带上推子、剪刀等,更是明确告知了行动的内容。19日晚,南下兵团红卫兵二三十人为在南京路上占据制高点,来到国际饭店,因与饭店交涉借用广播未获同意,便大骂国际饭店是“帝国主义的乐园”,职工是“洋奴”后,悻悻而去。一场由南下兵团发动的街头造反行动即将爆发了。然而,第二天早晨(20日),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却在人民广场贴出布告,紧急宣布“统一行动”改期,理由是“各校来不及准备”;“因筹备国庆活动,人民广场不好借用”等。或许确因准备不周;或许还有更隐讳的秘密,总之,箭在弦上的事态骤然停息了,即一场即将发生的街头武斗终于向着“统一宣传日”的目标回归,只是北京红卫兵与国际饭店之间的颀颀仍在继续。

20日晚7时半,一卡车属南下兵团第四、第十四纵队的红卫兵到达国际饭店。他们利用安装在卡车上的两个喇叭,不断地向南京路上的行人广播:“国际饭店不许住外宾”,“不要见外宾就鼓掌,谁知是帝国主义者?还是修正主义者?”。8时半左右,法国航空公司的人员到达国际饭

店,北京红卫兵勒令“下车、下车”,并高喊:“在中国的土地上,洋奴为什么不能走路”。一戴臂章的红卫兵陡然上前拉开车门,指着外宾大骂。外宾“非常紧张,低着头,举着手,从人群中挤进饭店”。宴会完毕,因国际饭店门前仍挤满了人,“外宾看也不敢看,都从后门出去”的。

21日上午10时半左右,又一卡车北京红卫兵来到国际饭店。当一日本旅行团到达时,因领队机智地高呼“向红卫兵致敬!”、“毛主席万岁!”,日本旅行者也跟着喊,才没有惹出事端。至晚9时半,一百多名第四纵队的红卫兵继续围住国际饭店,高唱“鬼见愁”歌,并再次向饭店借用广播器材,一直闹到深夜。

22日下午,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总部在闸北区新中中学召开会议,正式部署第二天“南京路统一宣传日”的任务。上海一些中学的红卫兵也列席参加。例如上海时代中学红卫兵总部负责人回校后,即向全校发出通令:限令“黑六类”子弟“狗崽子”(此时的用语亦已“北京化”了)交出自行车,否则“要采取行动”;上交的自行车“由红卫兵总部调配”(损坏则由原车主负责)。据统计,当天即有“黑六类”子弟的七十余辆自行车被集中起来,听候处理。同时,时代中学红卫兵总部还宣布:学校25名“牛鬼蛇神”的月票“一律没收”。自然,这些交通方便都是为了配合北京红卫兵的行动而筹措的。

23日清晨,首都南下兵团红卫兵和部分上海中学生红卫兵“陆续集中到南京路上”。因为是“统一行动”,现场“比较有秩序”。有的每队约三五十人列队行进,北京红卫兵在前,上海中学生随后,齐声高唱“造反歌”和“鬼见愁”;有的张贴对联、大字报等宣传品,并沿街散发传单,主要内容是“论红色恐怖万岁”、“自来红站起来”等。

7时半左右,几十名北京红卫兵冲上国际饭

店三楼,在正门沿街口的窗上贴起“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后又爬出窗口在外墙上贴了“反帝反修大楼”六个大字(在此,值得注意的是,在整个事态的发展过程中,19日至22日北京红卫兵一直没有贸然进入国际饭店。在学校,在街道,北京红卫兵可以一往无前,为什么恰恰在这座上海最高的建筑面前怯步了呢?这是因为国际饭店是上海的象征和地标,它敞开门户,正面对世界往来的客人。它的运作,它的权威,标志着一种属于国际城市的秩序仍在进行。这种秩序不仅具有威迫的效力,更是难测深浅的。所以,尽管北京红卫兵心犹未甘,愤愤不平,只能在外面叫喊和闹腾。23日,北京红卫兵终于乘行动之机闯入国际饭店,在外墙上贴完对联、标语后,旋即退出)。整个南京路“霎时满街都是大字报”,据统计,“从外滩到上海图书馆这一段,墙上和地上贴了对联一百三十多副,以及漫画多幅(再见附录)”。同时,北京红卫兵利用设在南京路上的宣传站,广播传单和大字报的内容,有的还攀高宣读传单,并提出谁反对“红色恐怖”等观点,可以到国际饭店门口辩论。但“来往行人和串联学生停下来看大字报和听他们宣传的不多”,只有一副对联上有人写了不同意见,“路上也没有辩论的人群”。

上午10时左右,“人群自东向西,尤以大光明电影院周围到王家沙一带最为集中”。此时,北京红卫兵的“宣传”活动渐渐变成了“斗争”行动,从南京西路999号到石门路口的一段路上,“有五个四类分子被南下兵团揪住斗争,挂牌低头”,“一个老太婆头发已剪掉”。同时,南下兵团的红卫兵指挥上海学生拦下三轮车,责令乘客报成分,叱喝年轻人一律下车步行。北京红卫兵还在许多商店门口贴上“红五类欢迎进来,黑六类不准入内”、“进店一律报成分”的标语,并在新泰百货店、霞芳服装店、博步皮鞋店、伟康棉布店及新华书店门口设岗,“逐个询问顾客成分,凡是红五类可进店买东西,黑七类均不能进店”。

真实地说,尽管“南京路统一宣传日”中也发生了武斗,却是相当克制的,即整个行动有效地维护并实现了“宣传日”的主旨,那就是北京红卫兵针对上海的情况和形势,通过在上海最繁华的南京路上大批量地张贴对联、标语、漫画和大字

报;大规模地举行游行、集会、宣讲和辩论,集中而又广泛地张扬了自己的观点和立场。其内容主要是:一、“阶级路线万岁”,因为“没有阶级路线,就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无产阶级的一切”。二、“红色恐怖万岁”,因为“恐怖是人民对敌人的专政,是对一个阶级的专政”,这是“红卫兵的历史使命”。三、关于十六条和武斗,因为“上海人的心目中,十六条只剩下‘要文斗’一条,而且是文而不斗,稳斗、温斗”,尤其“奇怪的是资产阶级乌龟王八蛋、狗崽子,以及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也在大讲‘要文斗,不要武斗’,这简直是形革命实反动”,所以“要坚决粉碎这个阴谋”。北京红卫兵的态度是鲜明而坚决的,它直指一个方向——“上海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官僚买办盘踞的老窝,在上海必须造成一个短期的红色恐怖现象,必须有一个极大的革命热潮”。

由此可见,“南京路统一宣传日”确属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的精心部署,它以“非武斗”的行动方式为“武斗”辩护,为“武斗”伸张,既是为了驱散周遭的指戳和责难,更是为了搭建往后的台阶和进路。这就是说,北京红卫兵正试图通过收缩而张放,一边摒弃前期的莽撞,一边立足于标树理念,稳扎稳打,长期作战,以求通过制造更大规模的武斗事件,彻底打开上海的局面。

然而,恰恰就在这个转捩点上,中央以“参与维护国庆游行秩序”为理由,下达了“南下兵团集体返京”的指令。其缘由源自何处呢?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下卷第68页)材料:其实,23日南京路宣传行动后,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立即趁热打铁策划25日在上海举行全市群众大会,并将强制一二百名资本家游街示众。24日,周恩来接报后便主持召开中央碰头会,商定给中共华东局、上海市委并北京市红卫兵南下兵团、北京市各大中学校在沪的红卫兵组织发出电报。电报指出:必须严格执行《十六条》中“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决定,明天强制资本家上街游行示众和开群众大会,应当停止。电报经毛泽东同意后当夜发出。25日行动取消。■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责任编辑 徐庆全)

日本“开拓团”中“大陆新娘”

○ 孟月明 张 洁

20世纪上半叶,日本侵华过程中,在中国东北策划并实施了长达40年之久的移民侵略并将移民活动美化为“开拓”。日本“开拓团”入殖中国东北,就其历时、数量和规模而言在世界移民史上都是罕见的。“开拓团”人数高达30余万。历经“试点移民”、“武装移民”和“国策移民”三个阶段,动用了全日本和伪满洲国一切可以动用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建立大量相关机构和协助团体。特别是“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政府更加无所顾忌地进行大规模移民,并把移民侵略列为日本政府的“七大国策”和伪满洲国政府的“三大国策”之一。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的根本动机,是通过日本人口的增殖,从根本上改变伪满洲国的人口构成和民族分布,使中国东北殖民地化达到永久占领和领土延长之目的。在这个移民大潮中,有为数众多的女性,他们被冠以“大陆新娘”或“花嫁新娘”的称谓,是日本“开拓团”中的一个特殊群体。

(一)“大陆新娘”政策的缘起

日本于1932年2月开始实施的第一次“武装移民”,在遭受了中国人民的多次武装袭击后,几经波折于翌年4月抵达入殖地。“由于对治安状况的担心、迁入初期的艰苦生活和缺少娱乐等原因,第一批移民团有198人(占47%)退团。”1933年7月,第一次武装移民团中还爆发了激烈的排斥干部运动,尽管运动被镇压了下来,但是退团者依然很多,达到了100人以上。日本关东军为稳定移民,以每垧1元的价格强征大量土地分给他们,尽管待遇优厚,仍然无法吸引移民定居。第二次武装移民团“千振村”,1933年出现集体骚动,有一半以上移民要求退团。

面对此种情况,日本殖民主义者们开始设法

稳定移民情绪,寻找使日本男性移民定居下来的办法。推行“满洲移民”计划的核心人物,日本关东军司令部陆军大尉东宫铁男认识到,安抚、慰问全部由男子组成的移民,最重要且最适合的方法是解决他们的配偶问题,让这些移民配偶也来到中国东北,并详细提出了在迁入地夫妇共同参加田间劳动,开展适合女性的副业和在“开拓村”团聚的方法等“愉快积极”的生活设计。日本政府一方面改变了原移民方案中“无论有无妻室,愿在满洲独身3年”的规定,积极促使移民配偶及早入殖中国东北;另一方面,积极为没有配偶的单身男性移民制定“新娘招致”计划。

1933年2月8日,东宫铁男寄信委托他奉天的朋友陶艺家小仓圆平,委托其绘制“招募新娘”宣传画,主题是“让内地的少女及其父母安心,劝导她们嫁到满洲”。

不久,根据东宫原案设计“招募新娘”的招贴画便在日本各地张贴起来,进行大肆宣传。东宫铁男还煞费苦心地点作诗一首“新日本的少女啊!嫁到大陆来”。

1934年,在东宫铁男的积极鼓动下,移民团的干部被派回到日本国内募集“大陆新娘”。据炮兵中尉兼农事指导员佐藤修日记记载,他回到了宫城县,在当地爱国妇人会的协助下,经过两个月努力,募集到30名新娘。第二批招募“大陆新娘”130名,于1935年6月到达入殖地。1936年3月中旬到4月中旬,移民团干部8名,又分别从各自的故乡,按照预定计划招募第三批“大陆新娘”65名。这一时期,日本政府送出的“大陆新娘”全都是通过移民出身地的市、町、村政府,以相亲结婚的形式进行,规模较小,数量也不多,尚处于试行阶段,但却为之后“大陆新娘”招募工作奠定了基础,成为日本“大陆新娘”政策的前身。

(二)“大陆新娘”政策的国策化

1936年8月,日本广田弘毅内阁通过了“二十年百万户移民”计划,并确定为日本政府的“七大国策”之一,决定从1937年开始实施。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进入大规模入殖阶段,“大陆新娘”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招募“大陆新娘”的活动从民间逐渐过渡到日本政府层面。在“满洲移民”大量输出的同时,日本国家的“大陆新娘”政策也随之出笼并具体化。

在1939年的日本第74次日本议会上,“关于女性移住者培养场所设立”这一所谓“新娘问题”的建议由伊东五郎议员提出。允诺女子拓殖训练的费用将由1938年的91650日元增加到1939年的163500日元。

1939年1月8日,日本拓务、农林、文部三省联合提出“百万新娘计划”。同年12月22日,由日本关东军起草的《满洲开拓政策基本要纲》在日本及“满洲国”政府的内阁会议上通过。“要纲”通过正文及附属的参考资料阐明了“大陆新娘”政策,明确提出“大陆新娘”政策的基本方针为:“为期培养旺盛的开拓思想,并使开拓地区人口构成协调发展,对一般妇女积极鼓吹其进出,采取适宜而又有效的措施。日本各地都整备开拓民配偶者养成设施,并设立女子指导者培养训练设施。”至此,“大陆新娘”政策便被正式确定为日本及伪满洲国的重要国策的一环。

日本又制定了《开拓女塾设置要纲》,“要纲”中的“方针”指出:“积极招收、训练开拓青年配偶者和女性进出大陆的推进者,并对可成为开拓地区中坚的妇女进行培养训练”,使之能起到稳定“义勇队开拓团”的中坚者和带动者的作用。开拓女塾的训练时间一般为1年,每塾的定员为3至50人。从1941年到1943年,开拓女塾的设置数及训练人数是:1941年是3所100人,1942年是8所330人,1943年是12所452人,其中1941年和1942年两年的训练生中90%都在开拓地结了婚。

日本拓务省于1942年制订了《满洲开拓女子拓殖事业对策纲要》该“纲要”是1942年以后实行的“大陆新娘”政策的具体内容。该政策的基本理念记述如下:“随着满洲开拓事业的进展,

尤其是‘满洲开拓青年义勇军’开拓团的移动,对女子拓殖思想的启培及开拓民配偶的斡旋的要求日渐紧迫,为有效对应之,将整备扩充组织机构,更新提高其机能以期完全实现满洲开拓事业之目的。”“大陆新娘”政策,一直持续到日本战败为止。通过该项方针,也可看出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日本政府对“大陆新娘”政策更加重视。

日本在推动女性移民的过程中,可谓极尽煽动、诱惑之能事,极力营造“大陆新娘”心动的理想蓝图,同时鼓吹报效国家的崇高使命,以唤起年轻女子积极主动地成为配偶者的意愿。在实施“大陆新娘”政策之初,便以给予礼遇和荣誉为诱惑手段。其政策规定,如果丈夫是“武装移民”,妻子便是“武装新娘”了,前往迁入地的时候可以领到步枪。这个时候作为“大陆新娘”的女子们第一次感受到了社会地位的提升,平等和女权意识对她们有着莫大的吸引力。而且“为了国家”而前往“满洲”的“新娘”,出发前往往要参加县政府举办的欢送会,县知事夫人致辞勉励并设午宴招待等,以至于她们常常是“怀着感激的心情”走上“报效国家”的移民道路。

1938年,在日本拓务省的协助下,在全国各地举行女子拓殖讲习会,命名为“大陆新娘讲习会”,让未婚女性参加讲习,使之“增强对满洲的充分认识”和“唤起主动要求成为配偶者的气氛”。报纸杂志也都开辟专栏大肆刊登有关“大陆新娘”的宣传、启蒙信息。日本拓务省和文部省派往“满洲”进行视察的作家、评论家以及妇女团体的领导人在报纸、杂志、广播和讲演会上煽动女性的“满洲”热。在宣传中,以“结婚的理想”,诸如“满洲是新娘的乐园”、“从国内的封建生活到夫妇二人自由的结婚生活”等诱惑日本女性。

在日本当局的大肆宣传下,日本国内争当“大陆新娘”“开拓新娘”之风盛行。1938年8月,哈达河“开拓团”上野胜和菊枝就是由县属社会科介绍,在日本国内结婚的仪式上,新郎穿国民服,新娘穿女子青年团的制服。县知事、县学务部长也出席仪式,在联合妇女会馆举行,这在熊本县还是第一次。第二天的报纸上就登了“红太阳的结婚式”、“赴满开拓团的花姑娘”的消息。《横滨贸易新报》刊登消息,为出生于“爱甲郡”的

四位团员寻找“新娘”，一位18岁的女子马上往县政府社会科寄信，信上说：我一生唯一的愿望，就是能成为“满洲的妻子”；很早以前我就想，将来一定要找一个可以信赖的人带我去满洲，与前辈们一同开辟满洲的“国土”。我心中充满激情，志愿守护日本的同胞们，作为女性，我也要与大家一同到海外大展宏图，为“日满亲善”尽自己所能尽的一切力量。……住在横滨的阿部花枝也看到了报纸登载的消息，她给一位山形县青年写了信，接着成为移民团员的妻子到“千振村”住了下来。当时，为了成为“千振村”开拓团员的“新娘”，全国共有130位女性应召。可见，当时对“满洲新天地”的“憧憬之情”已遍布于日本女性之中。

除了以满足个人幸福和需求的“动之以情”虚假宣传外，日本还打着“为了祖国”的幌子，以“国策的大义”来煽动，“使女性们自觉意识到移民中国东北对祖国肩负的一大责任”，提倡大陆新娘“打破个人主义的结婚观，树立皇国结婚观”、“遵循皇国之道，培养温顺贞淑的皇国女子。”

移民东北作“地主”的理想蓝图成为吸引日本少女的又一张王牌。日本移民一度从中国农民手中掠夺较为充足的耕地，却无力耕种。失地的中国农民则被迫接受雇佣，日本移民于是成为地主。在日本仅有1町步左右的自耕农，移民东北后成为拥有20町步土地的自耕地主。主妇只管家务，生活可谓轻松惬意，以至于有人在战后回忆起这段时光，还认为那是“人生最幸福的时期”。据1942年3月的调查材料，日本移民出租土地，少者占其所有地的1/4左右，一般占1/3至1/2左右，多者竟占60%~90%，有的高达95%。“就是说，日本人农业移民在到达强制从农民手中征用的土地上，马上就成为了那块土地的地主。”这种地主式的“幸福生活”理所当然成为诱惑日本女子移民满洲的一个诱饵，迎合了一部分日本女性的“投机”心理。

日本各府县行政机构在认识女性移民的重要性后，在中央尚未下发指令前，便开展了各种以启蒙和培养“新娘”为目的“女子拓殖讲习会”。1936年3月，宫城县南乡町南乡高等国民学校成立了全日本最早的培养“大陆新娘”的讲

习会。1937年，日本国民高等学校女子部最早举办了女子拓殖讲习会。1938年起，拓务省在日本全国23个府、县开办了女子拓殖讲习会。以未婚女子为对象的女子拓殖讲习会的开设，目的是使日本未婚女子加深认识“大东亚新秩序”建设的意义和“满洲开拓”国策的重要性，灌输积极移住“满洲”的思想。以一般女子为对象的讲习会，则进行范围更广的启蒙宣传。不只以培训“大陆新娘”为目的，而且帮助日本农村子女增强对“满洲开拓”的认识，协助组编移民团及顺利输送“青少年义勇军”。

(三)“大陆新娘”的功能

日本当局实施“大陆新娘”移民计划的动机和目的就是使移民能在中国东北长久定居。事实上，“大陆新娘”也确实起到了稳定情绪，使日本移民有扎根中国东北的愿望。在有家庭为依托的条件下，日本移民的归属感大大增强，这与日本移民到达中国东北初期“屯垦病”频发的现象比起来有很大的改观。

除了以“新娘”的身份稳定移民情绪外，还有一种情况女性移民作用更大，那就是1938年以后为“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配备“准新娘”和“寮母”。为了稳定青少年移民的心理状态，使之永远扎根于中国东北“充实国防，确保治安”，日本政府一面为义勇队准备“准新娘”，一面建立了“寮母”制度。“准新娘”指的是那些十四五岁的女孩甚至更年少的女孩，被强征为“预备新娘”。“寮母”制度，实际是为青少年移民配备代理母亲，做法是将20岁至50岁的独身女性安插到各训练所，负责照顾青少年移民的生活。一般大训练所配置10名，小训练所配置2名。从1938年到1945年，共募集8期，总人数229名。

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从数量方面来讲，计划是在20年内达到100万户，500万人。从血统方面来说，必须要保持日本民族的纯血统，移民当局不允许这500万人当中存在任何混血。换句话说，在保持民族血统问题上，日本政府重视的是民族的“质”，而女性移民无疑对保持日本民族的纯血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1937年，日本拓务省公布《满洲移民第一期计划实施要领》，大声

疾呼“要以日本的妇道覆盖满洲的新天地”、“站在女性的立场上……打入土著民族的核心中去”，“必须主动地成为血液防卫部队”。因此，女性移民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尽量多生孩子，并耐心培养，让这些孩子成为日本移民的后继者，继续完成所谓“满洲开拓”事业。

“大陆新娘”多为18~25岁，正值生育最佳年龄，于是形成了极高的生育率。据《拓务时报》刊登的“满洲拓殖公社”的调查：“1936年第一次移民团‘弥荣村’出生率为112人，妇女总数是262人，出生率达42.7%，第二次移民团‘千振村’的出生率为129人，妇女总数是265人，出生率达48.6%。”从1938年到1941年这四年间，移民地区女性的产儿率平均是75.75%（以人口10000人计算），与日本内地婴儿的出生率相比（市26.6%，郡34.1%），明显居高。

（四）“大陆新娘”的悲惨命运

1942年以后，“开拓团”里的青壮年男子陆续被征入伍。1944年，日本侵略战争面临全面覆灭的局势。为挽救败局补充兵员，凡“开拓团”团长以下有兵役关系的男性“开拓团”员，全部应征入伍。剩下的都是老弱病残和妇女，所以各部落作业队都以妇女为主。日本妇女不但要操持家务，照顾老人和小孩，还要承担全部农活。

1945年7月10日，日本移民中18~45岁的男性全部被征召入伍，“开拓团”只剩下妇女、儿童和老人。8月2日，日本关东军报道部长广播说：“关东军安如磐石，邦人特别是在国境开拓团诸君，应安心地致力于生业。”8月9日，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对日宣战参战。10日，日本大本营向日本关东军首脑部传达“可以放弃满洲全土”的命令。日本政府和东军在危机时刻竟然对“开拓团”封锁消息，不使其知晓具体战争战况。而是优先将日本军人、军队的文职人员、家属撤退输送回日本，却将在偏远内地的一般移民抛弃。

日本妇女带着老人和孩子，一路颠沛流离，踏上了漫长的逃亡之路。被日本政府和日本关东军抛弃、丈夫死了或杳无音信，饥饿、伤病、无助、没有方向，让大量的女性移民选择了放弃，由于负担太重，他们忍痛把自己的孩子扔在了路边，或直接送给了当地的中国人，也有狠心杀死

孩子或带着孩子共同自杀的，“瑞穗开拓团”的妇女儿童就有495人集体自杀。活下来却无法回到日本的妇女就被迫流落他乡，成为日本“残留妇女”，她们成为日本侵华战争无法磨灭的罪证。据沈阳“日侨俘管理处”的不完全统计，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前后，在东北三省突击寻夫——与中国人结婚、同居，以及做佣工的女日侨有10万之众。当然，这些人当中，在大遣返时，不少人回到了日本，但遗留在中国的也绝不是小数，被称为日本“残留妇女”，他们与当地中国人结婚，黑龙江省方正县地区尤为集中。“大陆新娘”是日本女性作为日本军国主义移民侵略政策牺牲品的真实反映，“残留妇女”是日本政府在战败撤退时对移民弃之不顾的结果。善良的中国人民却以博大胸怀接纳了不能回国的日本“残留妇人”，并未对她们有任何报复性行为，反而与她们结婚组成家庭，使日本女性移民在中国得到了重生。■

（责任编辑 杜明明）

本刊声明

最近，有人冒用《炎黄春秋》杂志编辑人员名义进行采访并搜集资料。为此，本刊郑重声明：《炎黄春秋》杂志编辑部成员均刊登在杂志的版权页上，本刊目前没有外聘和实习采编人员。

炎黄春秋杂志社

启事

《炎黄春秋》杂志尚有少量
往期刊物零售，有需要的读者
可电话咨询购买。

联系人：崔秀岭

手机：13611159388

电话（传真）：010-60342528

汇款地址：

北京市房山区102488信箱3分箱

邮政编码：102488 收款人：崔秀岭

张学良痛斥国民政府腐败

○ 张友坤

1990年6月,张学良在台湾接受日本NHK记者采访时说:“我开始认为国民政府要比军阀好,后来感到比旧军阀还坏。我这才知道国民政府军队的作风比老式军队还坏。特别是政治上比原来的政客还腐败,别的地方更差。我到了南京后,看得更多、体会更深,不满更强烈。简单地说,概括四个字:争权夺利。国民政府内部争权夺利,他们都不是为了国家。”(周毅、张友坤:《张学良文集》(下卷)第597~598页,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版。)

他在1934年的多次讲话中,都说到当时的腐败问题。他说:“说起来,救国家救民族只有从自己做起,也就是要管好了自己之后,才配谈救国,那么,难道要自己好还不容易吗?不容易。……在这外侮内忧交相煎迫的苦闷中,假定你是个意志比较薄弱的人,很容易使你受打击,以致灰心、消极。尤其在今日社会几乎形成了一种风气,不止是不奖励好人,有时还真使作好人的不出来气,这种现象不一而足。张伯苓先生曾说过:‘好人在屋里叹气,坏人在台上唱戏。’这也可以说明今日社会不容许好人存在,而且好人难作的事实。”(同上,第167页)“中国之所以弄到这个地步,都是中上层社会的罪恶!无论是军人、政客、学者……多半是太自私自利了。正因为有地位、有知识、有学问,所以做好事有能力,做坏事也有能力。譬如一个做文章的人,他只为一时的快意而信笔写作,出出风头,弄点稿费。当他提笔的时候,毫无顾忌说出这些话之后,对于国家、民族、社会、人心有什么不良影响。就是一般做官吏的也绝不问他的贪污行为对于国家社会有怎样的危害。就使中国国势濒于如此危急,一般民众蒙受重大苦痛,我们作军人的还不是要负大部分责任吗?推求过去一切罪恶的形成,就是由于国人过于自私自利了。”(同上,第168页)

讲到政治、经济、生活方面的派系斗争时,张学良对某地的教育界人士说:“自身的派系之争,真是太无谓了。人类原来是应该斗争的,但是斗争要有

斗争的意义和价值;绝不该只知从事于‘勇于私斗’怯于公敌的斗争。所以我说诸位尽可以充分的准备斗争的精神,所可惜的是自身派系之争毕竟是把斗争的精神运用得太错了。斗争、反抗,都是推动一个时代必具的精神,也可以说是人类所应有的美德,尤其是今日的中国人更应该养精蓄锐的准备未来的斗争、反抗。然而每个中国人都应当认准了谁是我们的敌人,也就是必须认清楚我们共同斗争的对象。譬如教育界自身的派系之争,那除了破坏自己的对外阵线和暴露自私自利的弱点之外,绝没有半点益处,真是何苦来!”(同上,第191页)

“日本人说‘中国人是一盘散沙’,这话实在近乎情理,沙的本质是坚硬的,可是他不能团结,就没有了力量,我们要把这些散沙团结得像铁桶一般,来挽回中国衰弱的厄运。”(同上,第231页)

他说:“许多人心口不一致,凡是口里说的非常冠冕堂皇,肚子里却肮脏不堪。遇着一桩事情,先打算于自己有没有利益,要是认为于自己没有利益,无论怎样容易,怎样有益于旁人,也不肯去做。要是于自己有利益,虽然特别艰难,或明知道妨害旁人,也要去做。于是大家的利害互相冲突,结果大家都受害,以致民族整个文化不能进展,事事落伍。这能说不是由狭义的自私引发的弊病吗?”(同上,第239页)

“有人口里说忙,他却有功夫打麻将、吃花酒、抽大烟,以及和不相干的人拉关系、应酬,这也绝不是武断的胡说。我曾到过个县,有人说这个县城三千多户人家,有一千多户都抽鸦片烟。我觉得很惊奇,普通人家我不好随便进去调查,我专找公务员的家内去看看。看了许多家,真是没有一家没有烟具的。看了这种情形,县长家里便不好意思进去了,禁烟这件事难办吗?必须要钱才办得了吗?公务员的禁烟这件事,不是办不到,完全在我们自己去做,并不用花钱的。专员县长多下回乡,看看民间疾苦,便可以发现许多事情,想出许多方法解除。

但下乡决不要打扰百姓。我听说以往竟有县长下乡，区长设法招待，叫百姓摊钱，结果发了个小财的事情。像这样以解除民众痛苦为目的的行为，其结果，非但没有稍减民众的痛苦，转而立时加重了民众的痛苦，人民和国家又何必有这些官吏下乡呢？”（同上，第287页）

“现在大家都说苛捐杂税是使民间发生疾苦的一大端。其实苛捐杂税之危害，不完全是因为税率太重，使人民负担不起，大半是因‘苛’、‘杂’足以扰民。中国的老百姓实在是太好了，你如果不扰他，他宁肯多拿一点钱而无怨。从另一方面说，这也就是官场中贿赂风行的原因。譬如检查员要检查一批烟叶，他本来并不一定要受贿。可是他检查时把烟掀动掀动，贩烟的人便会受不了。所以在检查之前，贩烟的人宁肯送一点人情，请求通融通融。做长官的人本来无意受贿，如遇类此事件，有人来送人情，复经属员的怂恿，或者会不经意的收了下來。你这样收了人家的一块钱。部下的人便会收人家的十块钱，寝假贿赂公行，恬不为怪了。我们的老百姓真驯良，吃了你许多苦，他们也还不感觉这是为什么，只是自己难受，自己在那里叫苦。”（同上，第287~288页）

他说：“彼此应酬，虽为礼尚往来，虽不可缺，究亦要有节制。否则今日甲宴客，明日乙请酒，专以酒食相征逐。事实上难免不将有用时光和精力，消磨于无用之地，影响到个人的正当业务。况且‘富人一席酒，平民半年粮’，亦非为天地惜物，为国家惜财之道。”（同上，第292页）

张学良主张革除钻营恶习。说：“行营成立之初，找事的人特别多，有求试用的新人，有望提升的旧属，或请人写介绍信，或自己来求，一切情形，总不出奔走钻营四字。推尔至于全国各机关，往往主管长官一有变动，这种现象也就不一而足。品相比较低的人，他于工作中，既难求表现，这是我国政治上亟待纠正的现象。不过以我个人经验所得，真有能力的人绝对不钻营，只有在工作成绩上求表现。反之，凡是钻营的人，无一不是缺少工作能力，又患得患失，遂不得不出种种卑劣的方法，以冀侥幸成功。试问天下事，哪有几桩侥幸成功的？结果终不过‘弄巧成拙’而已。”（同上，第292~293页）

“而目前民间痛苦，最大者在捐税奇苛，名目不一，而正当征税堪少。苛捐杂税概有地方收取，几

乎无地无捐，无物不税，如卖一猪，抽捐四毛。一筐菜抽捐一毛。又有运一车烟叶，经某地至某地者，原价九元，可售之四十余元，而结果甚至尚需亏本。因一地一捐，一，地一税，名目繁多，难以统计。至若保安队饷项，地方豪劣从中渔利。县私幸其不能发饷，便于籍端抽收，而少数不肖官兵，亦有甘为利用者，可见民众受苦之深。”（同上，第159页）他在视察部队时，“曾发现躺在大烟馆里抽烟的，有聚在一起赌钱的，又在客栈里嫖妓女的，这些坏军誉军纪的人，大部分都是长官随身带领的随从兵。”（同上，第226页）“我们当兵的，要算是丰衣足食了，可是许多老百姓，还是没有吃的，没有穿的。试想我们的吃，我们的穿。是从哪里得来的呢？那都是有老百姓血汗赚来的，都是从老百姓身上取得的。我们的老百姓为什么这样的贫困？就是我们国家的富源，老百姓的现金都被帝国主义剥夺去了，压榨去了。”（同上，第231页）

张学良还说，做官的无所事事，专以应付，极不认真。认为“认真”就没有饭吃。他说：“有次孔子陈蔡落难，断了粮，叫老实的自贡去买米，店主一听是读书人，就指着墙上的一个字叫自贡认，认得就卖之，自贡一看简单，说这是‘真’字，米店老板，挥之去。自贡返，孔子率弟子再去，一笑看墙上字，说乃‘直八’也，米店老板称善，乃得米。子路性直，不解，问老师，孔子答称：‘不能认真，认真就没有饭吃了。’”（郭冠英：《张学良在台湾》，第13页，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年版。）

张学良曾对人说过：“当年‘剿共’得不到人民的支持，人心在共产党一边，才导致了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早在1947年，张学良就预感到：“现在就是明朝末年那个样子，大势已去，人心全失，政府官员和带兵官都暮气沉沉，积习太厉害了，我看已无所挽回，老百姓实在是太苦了。陈诚到东北去，等于火上加油，更糟。东北的颓势，决不是陈诚可以挽回得了。”（《张学良幽居岁月》，第11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当张学良得知中国共产党创建新中国时，他说：“共产党会得到天下的。得民心者得天下。共产党赢得人民的支持，是会得到天下的。”

1991年6月，他在美国纽约会见他的老部属吕正操时，谈到国民党败退台湾时的腐败情况时说：“国民党刚到台湾时更加腐败，跟在大陆一样，也搞‘五子登科’（引者按：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接收大员



斯图亚特·施拉姆(1924-2012)美国历史学者、毛泽东研究专家

老友施拉姆

○ 李 锐

及我应邀到美国访问,我们都开门见山侃侃而谈,使我受益匪浅。2005年我88岁时,他为我写了一篇祝寿文章《李锐是我的朋友》,其中有对我的勉励之言:“我们每次见面,他的直率和富于挑战性的见解总是令我耳目一新。”毛泽东是20世纪重要的历史人物,施拉姆先生多种有关著作,国内都有译本,尤其《毛泽东的思想》影响很大。他不仅是被他的西方同事,也为我们中国致力于将毛泽东其人的理论和实践搞清楚学者所尊敬的大专家。

美国友人传来施拉姆先生的噩耗,使我非常悲痛,我们是研究毛泽东而结识的好朋友。1980年后,他多次作为这方面的美国学者来中国,以

(上接第63页)到收复区后,先抢金子、银子、房子、车子、女子,被人们讽刺为“五子登科”),不是人干的事都干出来了,硬是把台湾人逼反了,台湾人民起来反抗是完全应该的。我在台湾看得很清楚,有人说这是共产党搞的。依我看,要是共产党领导,就不会失败,他们(引者按:指国民党及其军队)就完蛋了!”

(张友坤:《伟大的爱国者张学良》,第238页,东北大学出版社,2006年。)

可见,腐败是导致国民党及其军队败退台湾的重要原因。■

(责任编辑 杜明明)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SIEMENS

西门子助听器 Hearing Aids

服务热线 :010-84608877

SW 声望听力
www.sw-tl.com

请认准西门子听力集团授权证书 西门子听力仪器(苏州)有限公司

数字型耳背式助听器 苏食药监械(准)字2010第2460986号 数字型耳内式助听器 苏食药监械(准)字2010第2460987号
注:请认准西门子标识/请详细阅读产品说明书或在医务人员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苏医械广审(文)第2010040048号

两个倒霉的艺术家

○ 杜 高

由哈维尔想起了王正

2011年12月18日,哈维尔辞世的噩耗传出,不仅使捷克和欧洲沉浸在一片哀痛之中,中国的《南方周末》也在22日以整版篇幅刊载了悼念他的文章:《剧作家哈维尔,谢幕了》。哈维尔的价值正日益为世人所认识。

说来很巧,21年前的1990年12月18日这一天,我正好到达捷克斯洛伐克,正赶上东欧剧变,旧政权解体的历史时刻。我当时是以中国电视艺术代表团受邀访问斯洛伐克的。那年7月,哈维尔刚经过自由选举,连任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而他在1989年12月第一次当选总统的10个月前,还被关在专制政权的监狱里。我那时对哈维尔一无所知,不仅没有读过他的剧作,更不了解他的思想。但在我之前,王正曾于1988年率领过一个中国戏剧家代表团访问捷克,接待和陪同他的,是捷克的一位女汉学家安娜,她翻译过王正的剧本,和他有过深入的思想交流,建立了真挚深厚的友谊。他们高度评价哈维尔戏剧创作的独特成就,还为那一年哈维尔参加民众大示威被警方拘留的事件,敬佩他的人格和认真地探讨了哈维尔的社会思想。因此,我第一次听安娜女士介绍剧作家哈维尔,竟是从她赞美中国剧作家王正开始的。

1990年12月的一个晚上,在多瑙河畔的一家小小的咖啡室里,安娜女士和我有一次很亲切的交谈。让我惊讶的是,她不但翻译过许多中国作品,汉语说得流利,而且对中国文艺界的情况十分熟悉。她忽然问我认不认识写话剧《报童》的剧作家王正?因为她听说王正又受了处分,所以很挂念他。安娜坦率地对我说,在她接待过的中国文艺界的朋友们中,她最喜欢王正。“他是一个真实的,不说假话的正直的人,他很有感情,而且很有见识。”安娜对我说:“作为一个剧作家,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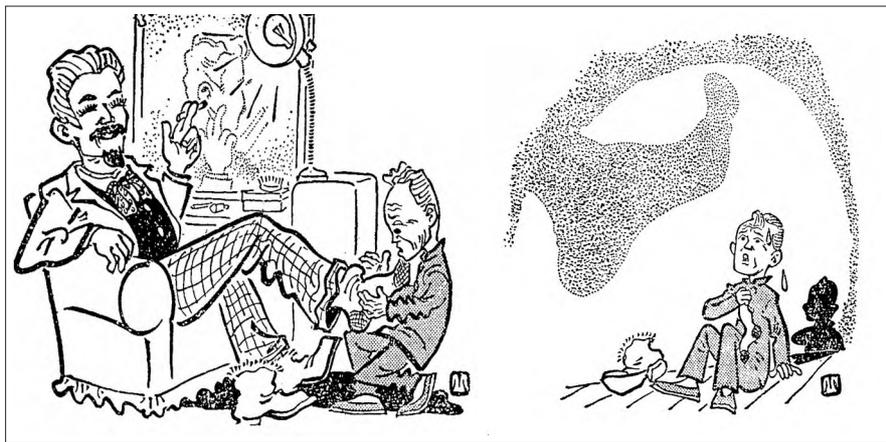
深刻理解哈维尔荒诞戏剧的意义,但他对哈维尔的反极权主义思想有着更强烈的共鸣。”而后,她摊开手,深沉地叹了口气:“我知道他在中国的处境不好,他因为支持过一出叫《我们》的话剧,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去年的那场风波又把他的职务免除了。他年轻的时候就被打成了右派。他遭遇了许多苦难。”

面对着这位坦诚的异国学者,我的心情激动。但我没有告诉她,王正和我是青年时代同命运的好朋友。

我从斯洛伐克回来,就急着同王正见面。除了转达安娜对他的赞赏和问候,更想向他请教哈维尔。王正对我说:“他的剧本我们这里看不到,但是台湾有了中文译本。他揭露了极权制度下的荒诞的生活现象,他引导人们寻找生活的意义。他的思想的穿透力,在于揭示极权制度下的人,无时无刻不处在恐惧中和无处不在的谎言的包围中。因此,他的政治奋斗就是为着人摆脱恐惧和谎言,生活在真实中。这也是他的艺术理想。”王正的这一番话,是他在21年前对我的一次思想启蒙。

2011年12月31日,中国戏剧文学学会召开了一个小规模迎接新年的聚餐会。我在这里见到了王正的夫人方掬芬和当年导演《wm》而被撤职的王贵。戏剧文学学会是1985年以王正为首的几位戏剧家发起成立的,它的宗旨是扶植民间戏剧创作,帮助底层戏剧作者成长。王正是第一任会长。20多年的风雨岁月过去,现在的负责人曾献平是当年王正的年轻助手。学会坚持着王正时代的方针,工作取得成效。

我们举杯迎接新年。这一刻,我又想起了王正和刚去世的哈维尔,我提起安娜对王正的赞佩。我的话勾起了方掬芬的回忆,她激动地说:“1984年我随戏剧家代表团访苏时,恰好在莫斯科遇见了安娜,她听说我是王正的爱人,对我特别亲热,像老朋友一样,她翻译了王正的剧本《三



契诃夫悲剧幕后插图

个爬山人》，还把一笔稿酬交我带给王正。那时她还没有见过王正哩！”

生活中有一些巧合使人难忘。也就是在1990年的12月31日这一天，斯洛伐克的朋友把我送到了东部边境著名的塔达拉雪山上过年。后来我才知道，这座美丽的雪山，正是当年哈维尔和他的朋友们秘密集会的据点，1988年由哈维尔起草的《公民自由运动宣言》就是在这里写成的。我在塔达拉山顶上举起酒杯，迎接了1991年第一个黎明的到来。

直到2003年，我才读到崔卫平女士翻译的《哈维尔文集》。当我读完《无权者的权力》这篇长文后，我禁不住以一颗感荡的心，遥向这位无权者的代言人致敬。

使我伤感的是，这时王正已于2002年末病逝。我多么想和他深入地探讨哈维尔啊。

由储安平想起了肖里

2012年的春节刚过去，就收到了二月号的《炎黄春秋》。读到一篇题作《储安平在〈光明日报〉当主编》的文章，是讲述储安平先生在1957年被各民主党派推举主持《光明日报》编务，4月1日就任，6月8日请辞，短短69天的一段令人悲叹的史实。特别引我注意的是，这篇文章既没有配发储先生的旧照，也没有附录相关的历史图片，而是刊登了一幅“漫画家肖里1957年6月为《光明日报》画的漫画草图：《戴着宗派主义眼镜的人》”。我猛地一下被带回到了55年前的那个6月，一个额前垂着一绺头发、笑嘻嘻的小伙子，

又活生生地站在我的面前。对着这张漫画，想起了这位故友，眼眶涌满了泪水。

储安平当年说过，他最欣赏肖里的漫画。肖里那年才二十五岁，是一个敏锐地感受现实，敢于针砭时弊，敢讲真话的青年艺术家。

不料到了1966年，这一老一小两个很有勇气的文人，两个被打倒在地地的右派，又遇到了更为凶险的

“文革”风暴，这时他们已无力抵挡，两个被摧残的弱者只能选择同一个结局：毁灭自己，反抗凌辱。年老的储先生愤然出走；年轻的肖里坠楼自尽。他们用生命，在我们的民族史上留下了永远的伤痛。

我和肖里是1950年结识的朋友。我那年20岁，他大概比我小一点。他原名李润生，都叫他小李。他是济南的一个铁路工人，会画画，调到北京铁路文工团来当美工。我那年正在写一个铁路工人的剧本。我们成了好朋友。年底我参加抗美援朝到前线去。出发的那天，小李跑到车站来送行，他不停地挥着帽子，放声高唱着，他是一个热情澎湃的小伙子。这以后的几年，我们没有联系。只听说他向李苦禅先生学画，后来就考进了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后，他开始发表漫画作品，引起社会注意。而1955年，我被卷进反胡风的政治运动中，隔离审查了整整一年七个月。熬到1956年末，才恢复行动自由。我在运动中受到了伤害，情绪很低落。那时文联在朝阳门外芳草地盖了几排平房宿舍，乔羽夫妇搬到了那里，他们有心宽慰我，约我去喝酒。没想到他的邻居是声名鹊起的漫画家肖里，也就是我多年不见的朋友小李。他调到了美协办的《漫画》杂志社工作，所以也搬来文联宿舍。小李结婚了，有了一个小宝宝。但他还像过去那样热烈地拥抱我。我第二次去芳草地，就是他邀我去喝酒了。

我到肖里家的那一次，天还没有全暗下来，有几个孩子在路边跳猴皮筋，我忽然看见了路翎的小女儿也在里面，便急忙走过去，拉起她的手。她把我带进了一间小屋，我见到了路翎的夫

人余明英。我没有想到路翎被捕后，他的一家四口会塞在这间小屋里。我问路翎现在在哪里，她们不知道。我不敢多呆，立刻离去，我怕被文联的人看见。但我还是被人发现了。两个月后，它就成了我的一条右派罪行，在批斗会上揭发出来。人们指控我虽然经过“肃反”运动的“挽救”，阶级立场还是站在反革命一边，内心深处同情胡风反革命分子。

1957年6月的一天，王正、肖里和我，在王府大街新建的文联大楼里碰面了。大楼里设有一个茶室，我们便坐下喝茶聊天。那时，“整风”运动正在热气腾腾地开展起来，党号召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大胆地批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而且“言者无罪”。一时群众大受鼓舞，平时压在心里不敢对领导提的意见，总算可以畅快地说了，于是到处都贴出了大字报。王正在青年艺术剧院工作，出于对群众情绪的支持，他在《文艺报》发表了一篇《致刘芝明的公开信》，呼吁文化部领导不要压制剧院群众的鸣放。（刘是文化部的副部长，整风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后来又成了反右运动的领导人。）文章发表后反应强烈，《文艺报》又约他再写一篇批评戏剧理论中的教条主义的文章，这一天正好是他送去稿子，从《文艺报》编辑部出来（这篇文章未能发表）。他从四楼（作协）下来，我在三楼（剧协）碰见他，又在二楼（美协）遇着了肖里。就是这么一次巧遇，铸成了一个历史悲剧，改变了三个年轻人的命运。

那天，王正很动感情地向我们讲了剧院整风座谈会上，一些多年受到压抑的人都站起来说话了，许多人一边流泪一边诉苦，他也是含着眼泪听那些发言。尤其是一个服装管理员倾诉的，因为一双黑丝袜受到领导训斥的事，使他感慨万端，想不到在新社会，人还有人还有这种贵贱的等级之分，更想

不到在台上演同情小人物的契诃夫悲剧，在台下是欺侮小人物的官僚！我和肖里一边听着，也都情绪激动。我立刻联想起了契诃夫的那篇《小公务员之死》，我说我要模仿契诃夫的风格，写一篇小品讽刺那个领导，批评官僚主义！肖里接着说，快写，你写好我就画插图。

就这样，由王正提供素材、我执笔、肖里插图的《契诃夫悲剧的幕后》一文，很快在七月初出版的《新观察》发表出来了，先是受到赞扬，后是受到猛烈批判。因为形势突变，党的整风运动变为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了。《新观察》不得不连续发表大批判文章，《契诃夫悲剧的幕后》也就被定性为右派分子“射向社会主义的一支毒箭”了。

我们三个人都被戴上了右派帽子。我们被隔开了，分别挨批斗，1958年分别受了处分。我受的处分最重：开除公职，劳动教养，关进了公安局的劳改农场。王正受的处分是：保留公职，监督劳动。他和吴祖光、丁聪、聂绀弩等一批文化界的右派分子发配到北大荒劳动改造。肖里的处分是降职降薪，调往黑龙江另行分配工作。

漫长的22年，毁灭了我们的青春。我们音信隔绝，天各一方。

1979年春，55万右派改正。我和王正劫后重逢。可惜再也见不到肖里了。

在肖里家的夜饮和畅谈是温（下转第94页）



劫后重逢：1979年春，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庆祝建院30周年联欢会上。（右起）王少燕、吴祖光、杜高、王正、肖崎。

潘家铮与三峡工程

○ 李 楮

2012年7月13日,潘家铮先生辞世,享年85岁,带着他曾经有过的水利电力部总工程师、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副组长及技术总负责人、三峡总公司技术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公室专家委员会主任、两院院士、政协常委等头衔,以及“新中国第一代水电人”、“三峡大坝的总设计师”等称誉,离开了这个世界。在其追悼会上,钱正英、徐匡迪、陈雷等亲往吊唁,官方传媒报道有称其去世是中国“水电工程建设事业的重大损失”,但也终难掩其因与三峡、水电等相关联而生的争议。

我与潘家铮先生无一面之缘,他是水电工程方面的专家,我是法学、社会学和公共政策方面的专家,而同时又是为数不多的既非工程技术专家,也非环境生态专家,而参与过国家重大水电工程环境评估的人(我参与过紫坪铺、怒江、红水河龙滩、瓯江滩坑等4个水电工程的评估),此外,我还参与过三峡移民调查,参与过作为水利部项目子课题的“水资源的补偿与恢复机制”研究,因而对与潘家铮先生工作相关的水电工程等在中国转型时期的表现有着多年的关注,对潘家铮其人,及其可能代表或显现的那一切,有着比一般人更多的思考。

钱正英曾说:潘家铮先生“是新中国水电人才成长的缩影”,因此,他的经历,及通过他表现出的一切,“有历史的必然性”。

对三峡工程,中国有着诸多的美誉,但无论怎样,对三峡工程可能因非战争或战争原因引发的安全问题,对环境和生态的影响问题,对文物和文化遗产的破坏问题,甚至是对防洪的作用到底如何的问题,人们仍质疑不断,而对强制移民的权利和生计问题,对公共利益的认定标准问题,对决策的程序和更多相关联的制度设置问题,则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成为不可避免、必须给出明确回答的问题——正因为如此,在潘家铮先生晚年及潘家铮先生辞世之后,水电正在

并将更加努力地抢时间,以使更多的工程在必须回答前述问题及新的法律制度设置之前,成为已经完工或较难停建的“既成事实”,这些年来,中央政府职能部门不断叫停的违法未经环评即先动工的水电工程,以及国家主流传媒央视对“建在地质断裂带上的水电站”、“揭开‘跑马圈水’背后的秘密”等的持续报道,都证明了这一点。

相当多的人知道作为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副组长及技术总负责人后的潘家铮先生坚决主张修建三峡工程,潘家铮先生自己也说当时他是“一听到有人说反对意见我就感到恼火”的人。后来,作为“三峡大坝的总设计师”,潘家铮先生在各种公开场合回应、抨击异议,但很少有人知道潘家铮先生在此间所著《三峡梦》中写自己的一个噩梦——梦见自己在“国际生态环境法庭”上受审,被判“开除人籍,永堕魔道,发往阴司地狱,去受凌迟之苦”。

潘家铮先生曾说:在担任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副组长兼技术总负责人之前,自己对三峡工程可能面临“爆发核战争”(带来的灾害),以及“景观被淹、古迹被毁”、“珍稀物种灭绝”、“环境恶化”、“地震、滑坡、水库淤积、航道堵塞等等”,也“忧心忡忡”,而在其后,经3年时间的论证,就从“反对者”变成了“支持者”,因为“发现自己原来担忧的问题均已迎刃而解”。但潘家铮先生直至去世也没有就这些问题是怎样“迎刃而解”给出明了的和使世人能够信服的解答。

据传,潘家铮先生曾说三峡工程确实还有一些问题没有解决,但他相信将来子孙后代自然有办法、有能力去解决。而我认为当一种技术的采用,一项决策的实施会产生难以逆转或不可逆转的后果时,人类必须谨慎;认为“人定胜天”,认为人类能够“征服”、“战胜”自然,是工业革命后一种“科学的狂妄”的表现,今天,人类正在自食其果。

潘家铮先生在其著述中曾列出水坝“20罪

状”——1,淹没大量土地、树林;2,动迁居民(侵犯人权);3,影响陆生和水生生物,特别是珍稀物种;4,水库表面蒸发损失;5,水库内泥沙淤积;5,影响景观和旅游点;7,诱发地震;8,引起库岸滑坡;9,淹没文物、古迹;10,影响人群身体健康(孳生蚊蝇害虫);11,影响局部地区气候;12,恶化水质、改变水温;13,影响渔业;14,下游河道发生冲刷,河口海岸侵蚀;15,清水下泻,减少游水中肥分;16,引起下游农田盐碱化;17,引起下游农田潜育化、沼泽化;18,施工弃渣、废水引起污染;19,妨害通航;20,垮坝风险。

在列出水坝“20罪状”后,潘家铮先生的结论是:还要建坝,不能“因噎废食”,要建高坝、大坝。——理由是上世纪60年代逐渐关注水坝的安全、水坝的老化和水坝对环境的影响,以致使潘家铮先生能够列出前述水坝“罪状”,并为坝工建设设置更严格评估制度、决策制衡机制,甚至提出“反坝”主张的,主要出自西方;“反坝势力的活动”,虽使“一些发达国家的坝工建设明显萎缩”,但“主要矛头是指向发展中的国家的”。在潘家铮先生看来,不能受“西方”影响,水电发展是“国家富强”的需要。

不区分因建坝而获利的人和利益受损的人,不区分主张经济增长或发展中生态、文物被破坏、环境被污染是难免的、主张“保护要服从发展的需要”的人和主张必须尽一切力量限制对生态及文物、文化遗产的破坏和对环境的污染的人,只区分中国和西方(或表述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把基于对人类在工业化以来发展中问题的反思而提出的高坝弊端、保护生态环境、保护自然、文化遗产和文化的多样性、尊重和保护人权,都看作是西方借以“限制穷国的发展,以免对他们造成威胁”(潘家铮先生语)的说法,其实只是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形成的思维定势的表现。一方面说和平、发展、合作是世界主潮流,一方面骨子里近于强迫症的“敌情意识”又不断表现出来,这真是我们所处时代的一种特有景象。

“中国要发展,发展需要能源”,水电系统以此回应各种批评、指责。但是,我们到底需要多少能源?水电的数额是根据“翻番”的要求推算出来的。“电荒”与中央监控的主要产业大多产能过剩并存,与浪费和使用不当并存,与中国等量能耗对GDP

贡献远低于一些国家并存。所谓的“发展”——高速增长的经济指标和财税收入与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比重日低、国民的收入差距日大并存,与环境-生态恶化、能源安全渐成问题并存。这种“发展”是不可持续的,是与执政党早就提出、未能做实的“改变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和“建设生态文明”相悖离的。

我们不能在人类已经认识到过去的错误后,借口“你们已经修了那么多坝,我们还没有修够,你们已经污染过了,我们还没污染够呢”,去继续做对人类有害的事。更何况水电系统所言的“发展”包含了巨大的部门利益。

潘家铮先生和他所处时代的许多人一样,有着同样的思维方式:人只分两类,非敌即我,因此,潘家铮先生自认为是可以代表“中国人民”的。由此,他就代表“中国人民”宣称:“决不允许江河自由奔流”,“将进一步开展世无前例和史无前例的宏伟的水利建设”,将在21世纪“修建更多更伟大的高坝大库”,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的头号水电大国”。潘家铮先生所言正在成为现实,但这对生活在中国的人,是福是祸呢?

潘家铮先生不同于水电方面的许多人,他在自己的著述中讲述了由水坝而带来的灾害——1960年,三门峡工程蓄水后泥沙淤积、25万亩农田被淹、5000人被水围困;1975年,板桥和石漫滩水坝溃决2.6万人遇难(一说为8万余人遇难,一说20余万人遇难)。潘家铮先生认为以现在技术能力,这些不再会发生了。作为一个工程技术专家,他像中国的多数技术专家一样,“科技”不分,相信有资金支撑的技术发展力量是无穷的。但实际上,科学是一种系统化的、按照一定规范的、对自然现象的一种认识,这种认识始终处于过程之中。而技术则是建立在一定时段的科学认识基础上的践行,技术可以使自然界带来改变、变化和改造;技术,从来就是一把双刃剑,技术发展的程度越高,它可能给人类带来始料不及的危害就越大。对“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的关注,对科学家、技术专家的伦理要求的提出,对科学研究和技术应用的法律限制和制衡机制的建立,正源于此。更何况我们正处于一个相当多的人“在科学的名义下迷信技术,在市场的名义下迷信金钱”的时代。

潘家铮先生在其著述中还讲述了他亲历的移民情状——他去了新安江水库蓄水前的库区，“那里简直像面临大瘟疫或大战役的前夕，遍地狼藉，一片混乱和凄凉”，潘家铮先生说：“我们确实对不起移民”。今天，移民安置的经费大大地增加了，但移民问题真的解决好了吗？

潘家铮先生说：对三峡工程贡献最大的人是那些反对者。问题是反对者的声音没有通达决策者、通达国民的制度性保障。反对者承受不当的巨大压力，尚在其次，而言路不通，则常使潘家铮先生所说的“反对者”（或只是不同意见持有者）的“贡献”无从产生。在决策可能为利益相关者左右或可能因认知错误而致失当时，需要两种制度：一是保证决策是在充分听取各种不同意见之后做出，二是保证决策时能够协调、衡平不同利益。这两种制度，我们今天都还没有建立起来。

三峡工程是至今唯一一个交全国人大表决的水电工程（出席代表2633人，1767人赞成，177人反对，664人弃权，25人未投票）。当时，有评论：“大型工程建设的民主决策，三峡工程首开其端”。20年过去，这个“端”后无续，至今再没有一个工程（包括那些比三峡更大的工程和争议颇多的工程）进入全国人大的“民主决策”。这使我们考虑到是否应该建立规定哪些工程必须由人大表决和在何种情况下必须举行公开的听证的制度。

三峡工程论证报告中的生态环境报告，先后有两个，第一个结论是工程“弊大于利”，第二个则相反。

参与过整个论证的有403名专家，其中9人拒绝在报告上签字。

作为参加过国家重大工程评估和参与过立法和决策咨询的人，我的感受是：今天请你，你就是专家，明天不请，你就不是专家；在压力和说服之下，不签字是很难的。我曾建议：设立专家库，听取专家意见时，采取以专家类别随机抽选和异议优先相结合的办法；改变在拟好的稿上签字的做法，每个专家都必须自己写出自己的意见，所有参与决策或者参与决策咨询的专家姓名和他们给出的意见一律向社会公开；专家要有伦理底线，专家因利益或认知错误而支持了不当决策，固可不像官员那样被问责、惩处，但也应承担名

誉上的责任。

在决策中要有制度保障，使不同主张能够针锋相对、充分地论争辩驳，对决策不采纳的主张及不采信的证据，决策者要给出不采纳和不采信的理由；对不同利益，要能够协调、衡平，这样，社会才能趋于和谐，发展才能持续，人类才不会自取灭亡。

近些年来，常在有人逝去时，人们会感叹“世上再无某人”！这昭示着一个时代即将过去。正是在这种情境下，潘家铮先生的辞世，使我同样慨叹——“世上再无潘家铮”。潘家铮先生的心永远是不平静的，因为只要他活着，就永远不得不面对，不得不思考，而许多不及潘家铮先生的人是无须面对、思考的，因为他们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无所畏惧；他们一心牟利，不计其他；他们早已为一种机制造就成机会主义者，言行各异，里表不一，且应对自如。

最后，潘家铮先生称“三峡工程是一项优质工程、安全工程、争气工程”。优质、安全，须待时间检验，且不断加大成本，以“小正确”去改“大错误”，是多少会消解一些“大错误”的负面影响的。至于“争气”，则显现了时代的问题所在。“出生于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像梦魇一样一生都压在潘家铮先生们的心上，“救亡”、“图强”，“科学发展”、“国家兴盛”遮掩下的争强斗胜，与人为敌心态，成为他们奋力向往的全部。60余年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现今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自谓制度世界最优，经济排名第二，却时时担心不被别人看重、认可，在做出来的强硬下，不时显露出底气不足；天天说别人欺负自己、限制自己发展，却不检讨自己为什么至今未进入发达行列。

80余年前，在中国，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以“国家-社会本位”为自己政策法律的核心理念，80余年后，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提出了“以‘以人为本’为核心”的新执政理念。“以人为本”，而不是再以“国家”及其他为本；把民生放在第一位；以和谐社会，和谐世界，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为目标，不是想方设法地使已经难以持续发展勉强再发展下去，而是通过改变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去探索另一种新的可持续的发展，可否能开启潘家铮先生这一代人逐渐离去后的一个新时代呢？■

（责任编辑 杜明明）

从“天王圣明”说最高思想权威

○ 刘泽华

一、“天王圣明”的思想意义

在中国学界有一种相当普遍的看法,认为“道”与“王”是二分的,在儒家看来“道”掌握在孔子手里,因此孔子是最高的思想权威。这种看法从孔子在世时就逐渐兴起。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论语·子罕》)后来孟子说:“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荀子更明确提出“道高于君”,孔子则是道的化身,自然也高于君主。明儒吕坤总结前人的认识,进一步明确了道与王是两端,而“道”(理)高于权势,他说:“天地间惟理与势为最尊。虽然,理又尊之尊也。”(《呻吟语》卷一之四)孔子不仅是中国的最高思想权威,也是世界的最高思想权威。

这种说法不仅有极大的片面性,也充满了扩张性。试问,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是多元的,在儒学之外的其他思想里孔子的地位完全是另一种境况,比如在道家看来孔子的地位是很尴尬的,在佛学中也近似,另外还有全否定孔子者。至于世界范围,我无能论说,但把孔子推到世界思想的顶端,恐怕只能引作人们的笑谈。

尽管帝王们给孔子加上“至圣先师”“文宣王”等等尊号,但还有一个更大的观念在旁边,这就是帝王冠上的“天王圣明”、“圣王”。圣王是高于一般的圣和王的,正如荀子所说:“圣也者,尽伦者也;王也者,尽制者也。两尽者,足以为天下极矣。故学者以圣王为师,案以圣王之制为法。”(《荀子·解蔽》)“天王圣明”四个字,应该说把最高权力与思想权威统一在一起。

自从秦始皇之后,帝王们地位、行为、话语、事业、衣食住行都以“圣”为旗号。由于王权太强大,一方面王要占有“圣”,把“圣”变成王的一种品格,并使“圣”为王服务,为王张目,成为王的合理性的依据;另一方面,我们的思想家们,由于大

多数依赖于王权,认同王权,又把“圣”的理想寄希望于王,所以在理论上也不可能把圣与王分开,更多的是把圣交给了王,特别是当朝的王。

有意思的是,儒家认为孔子已经占据了“圣”,可是并没有到此止步,进一步追求却是“王”。孔子本人就有点以“王”自居之味,他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论语·子罕》)很明显,他以文王的继承人自居。他的弟子们把他置于尧舜之上,宰我认为孔子“贤于尧舜远矣。”(《孟子·公孙丑上》)《墨子·公孟》篇记述儒家信徒公孟认为孔子应为天子。孟子也是雄心勃勃的,豪迈地称:“夫未欲平治天下;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虽然我们不能说孟老夫子要称王称帝,但他同孔子一样,把自己同文王视为一系。儒家主张内圣外王,修齐治平,其中也包含了强烈的政治雄心。荀子在《非十二子》中把君子、圣人、圣王视为一系,君子只要继续努力,是可以成为圣王的。荀子在《儒效》中就论述了大儒为帝王的可能性,文中曰:大儒“势在人上,则王公之材也。”又说:“通则一天下,穷则独立贵名。”大儒与帝王之路是相通的。《礼记·学记》中有一段论述也同样耐人寻味:“君子……能为师然后能为长;能为长然后能为君。故师也者,所以学为君也。”总之,更上一层的目标是当王。孔子没有当上王,无论如何是儒家的一大遗憾。后来的儒生们,为了填补心灵的不平衡,把孔圣人列入王之列。荀子率先发此议:“孔子仁且知不蔽,故学乱(作‘治’解)术足以为先王者也。”(《荀子·解蔽》)其后的儒生尊孔子为“素王”,像吸鸦片一样,在精神上过过瘾,圆了圣人当王的梦。后来有些儒生一直在这个梦中盘桓,清代的曾静说:“皇帝合该是我学中儒者做,不该把世路上英雄做。”(《知新录》)在他看来,孔子、孟子、二程、朱熹、吕留良等都应该做皇帝。内圣外王、修齐治平显然是由圣而追求“王”。总之,在

儒家的观念中“王”比“圣”更高一层。

帝王对圣的占有,是对理性占有的一种表现,也是权力支配理性的证明。在中国古代,理性虽然比神性有更突出的地位和展开的空间,然而,在君主面前,多半不得不低下高贵的头,进而沦为王权的辩护词。这里我再把传统思想文化特点概括一下:理性夹杂神性而高于神性,权力挟裹理性又支配理性,神性与理性总体上都是帝王的婢女,受王的支配。

二、“天王圣明”是最高思想权威

下面对“天王圣明”再做些解析,来说明君王在思想领域是最高权威。

1. “天王”在思想上的整体控制性意义

“天子”之称本来已经神化了帝王,但君王们还嫌不够,干脆径直称“天”。看到“天王”、“天元”、“天公”、“天父”、“天皇”、“天皇大帝”等等类似概念,需要细细体味,它既可以指天神,也可以指帝王。

君王为天之子,受命于天,代天施治,君是天选定的“民主”。王者参通天地人,“天胙之,为神明主。”(《法言·重黎》)“天子至尊也,神精与天地通,血气含五帝精。”(《春秋纬·保乾图》)帝王通神或即是神。天是人的曾祖父,天和天子是父子关系。“天子号天之子也”,“天子父母事天,而子孙畜万民。”(《春秋繁露·郊祭》)这就在观念上把宇宙世界也神秘化和宗法化了。君主代天行事,君命即天命,“人主立于生杀之位,与天共持变化之势。”(《春秋繁露·王道通三》)“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一国则受命于君。君命顺,则民有顺命;君命逆,则民有逆命。故曰一人有庆,万民赖之,此之谓也。”(《春秋繁露·为人者天》)天是泛宗教性的崇拜对象,而天子则是这个泛宗教的教主,其他宗教基本都处于王权之下,或受王权支配,其中包括孔教。

在传统思想中“奉天承运”是个大命题。先哲虽有“天听自我民听”的哲言,但只有天子才能奉天承运,在悠悠的岁月里与“奉天”含义完全相同的词很多,唐以后帝王的尊号、谥号一开头,大多是什么“统天”、“法天”、“仪天”、“应天”、“感天”、“体天”之类的词,都是表示帝王同天有着特

殊的关系,是天命的体现。这里仅举几位雄才大略的帝王有关之论。隋文帝说:“帝王岂可力求!孔子以大圣之才犹不得天下。”(《资治通鉴》卷一七八)唐高祖说:“帝王自有天命,非小子所能取。”(《资治通鉴》卷一八六)唐太宗说:“帝王之业,非可以力争者矣。”(《帝范序》)朱元璋说自己“本无意据有天下”,作皇帝是“天特命之”的结果。清太宗说:“天运循环,无往不复,有天子而废为匹夫者,亦有匹夫而起为天子者,此皆天意,非人力之所能为也。”(《清太宗实录》卷五)司马光的以下说法大体代表了思想界的主流认识,“王者受天命,临四海,上承天之序,下正人之统。”(《策问王道·第五道》)

我们应特别注意“奉天承运”这类套语的政治文化意义及其潜移默化功能。就政治意义而言,“天王圣明”、“奉天承运”和“听天由命”凝结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有关“决定论”的最深邃的、最普遍的认识成果,将宗教意识、宗法意识与政治意识交织在一起,将神性与理性交织在一起,是传统政治文化中历久不衰的支配性的范式。同时也是人们的政治认同的最后、最高价值准则。就潜移默化而言,只要在习惯和无意中接受了这些观念,帝王就是无可争议的绝对权威,同时也成为自身社会定位的依据。这就是韩愈说的:“天王圣明,臣罪当死。”柳宗元说的:“臣等得生邦甸,幸遇盛明。身体发肤,尽归于圣育;衣服饮食,悉自于皇恩。”

2. 王“体道”——王与道一体化

“道”虽有神性,但主要是理性的最高理念。圣人、圣王“体道”观念在先秦已经相当完备。先王体道由来很久,现实的王“体道”则是从秦始皇开始的。他说自己的胜利是“原道至明”、“体道行德”、“诛戮无道”。圣人是道的人格体现,作为“体道”者的秦始皇称“圣”也是合乎逻辑的。于是,他被称为“大圣”、“秦圣”;他是圣的化身——“躬圣”、“圣智仁义”;他立的法是“圣法”;他的旨意是“圣意”;他做的事是“圣治”;他撒向人间的是“圣恩”。总之,圣与现实的帝王合为一体,与“道”也一体化。秦祚很短,但帝王称圣体道被继承下来,传之后世而不败。

关于王、道一体,在理论上作了最简洁论述的要属董仲舒。《春秋繁露·王道通三》中有一段

极著名的话：

“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是？是故王者唯天之施，施其时而成之，法其命而循之诸人，法其数而以起事，治其道而以出法，治其志而归之于仁。仁之美者在于天。天，仁也。”董仲舒把王、王道、天道、地道、人道混通为一体，王居于枢纽的地位。又说：“道，王道也。王者，人之始也。”（《春秋繁露·王道》）《汉书·儒林传》说：“《六艺》者，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也。”儒家的“六艺”本身就是“王教”。

歌颂王的流行思维，是颂扬王与道一体。韩愈和柳宗元写过不少表奏，其中有说不尽的歌功颂德的妙文，为了简明，我把颂扬帝王的功能的词组摘录一些，如：“神化”、“神功”、“大化”、“与天合德”、“法天合德”、“感通天地”、“参天两地”、“功参造化”、“整齐造化”、“政体乾坤”、“移造化”、“革阴阳”、“仁化”、“德化”、“统和天人”、“顺时御极”等等。总之，神化、自然化、皇化是三位一体的。

在君主的溢法中，首先是说与天的关系、接着就是说与道的关系，有诸如“应道”、“法道”、“继道”、“合道”、“同道”、“循道”、“备道”等等，这些都说明一个问题：帝王是道的体现者。

王总是以道自居，又有那么多理论支持。所以在传统社会，道理多半是皇权的附庸。

3. 御用之学必然是受帝王支配的政治部件

儒家所奉的“六艺”原本于先王，庄子假老子的话说：“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庄子·天运》）儒学以先王之道为旗号，因此从主流上说，孔子压根就是维护帝王之学。由于孔子的主旨是尊王，为当权者说话，尽管他没有受到特别的重用，但依然受国老的尊敬，死后被哀公尊称“尼父”。其后诸侯王们对儒学还是青睐的。韩非说孔墨是“显学”，受到东方六国的重用，《吕氏春秋》载，儒家弟子“充满天下”。说明儒家门庭兴盛。刘邦之所以开祭孔之先河，就是源于叔孙通制礼仪，让刘邦真正体会到了儒家的大用。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儒家上升为官方的意识形态，由于是帝王决定的，儒生们造出了孔子为汉家制度说，意思是孔子所言所论都是为了汉家而预设

的，当时被尊为经典的讖纬中反复宣扬“墨孔生，为赤制”之类的神话。孔子的母亲与黑龙交而生孔子，“黑”通“墨”、“玄”，因此孔子被称为“墨孔”、“玄孔”。汉从阴阳五行推算属“火”，“火”通“赤”，“赤制”就是“汉制”。

历代帝王尊孔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孔子之说是帝王的护身符。元成宗说：“孔子之道，垂宪万世。有国有家者所当崇奉。”（孔继汾《阙里文献考》卷三十三）朱元璋说的很清楚：“孔子明帝王之道以教后世，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纲常以正，彝伦攸序，其功参于天地。”（《明实录》太祖实录，卷一百四十四）雍正说：孔子之道“在君上尤受其益”。（庞钟璐《文庙祀典考》卷一）一些儒臣、儒生也有诸多相似的论述。

被帝王尊崇的思想，自然也就成为政治的组成部分，是受帝王权力支配的部件，试想，思想本身最具权威呢，还是掌控思想的权力更具有权威呢？我想这点无需论证。儒家和孔子的显赫地位，乃至成独断之势，都不是自身学说的内在魅力，而是帝王和统治者倡导的结果。

统治者独尊儒术也并不是整个儒学都被置于同一地位，在儒家内部分很多派别，受尊的也只是更符合自己需要的那些派别。比如汉代儒家内部分化更加繁杂，分为不同的“学”、“派”、“家”，不下几十种。官方所立的“经”博士，实际是某一“家”博士，因此独尊的是某一家，而不是整个的儒学。

著名石渠阁会议和白虎观会议两次会议都是评定《五经》异同，使《五经》的解释“整齐归于一是”，并“永为后世则”。当然都是由皇帝“称制临决”。

两汉统治者用行政方式把思想政治化、规范化、统一化、固定化，决定权在帝王，当然也附属于王权。

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宋宁宗时一度被划入伪学，遭到打击。后来被宋理宗平反，但也没有达到官方意识形态的地位，直到元仁宗时被定为官方意识形态。后来明清两朝统治者对朱熹的理学更加尊崇。从明朝开始，科举更严格以理学为准，理学独尊的地位显然是由帝王确立的。不属于理学的儒学就只能坐冷板凳。

从另一方面说，帝王对儒家经典也有选择



孔子被誉为“圣人”，在他的家乡曲阜到处都能见到与他有关的遗迹。

权。朱元璋就命令删节《孟子》一书，编成《孟子节文》，于洪武五年（1372）颁发各级学校，作为钦定的教材。朱元璋一度还要把孟子从孔庙中驱除出去。

孔子被历代尊为“至圣先师”，“帝王之师”等，这是否意味着“师”是最高权威呢？从一隅而论，有这层意思。但从总体看，“师”的地位及其思想是从属于君主的。

首先，师是分等的，创建先王之道的先王、圣王，三皇五帝，是帝师合一，有时称为“帝师”。当世的帝王可以自称帝师，如康熙。而孔子只是承继性的先师，虽然也常称圣师，但属于次一级的，因没有当过王。

其次，孔子是臣，在地位上是从属于君主的，这点是绝对的不能乱的，孔子被封为“文宣王”，那是帝王之下的王。明朝嘉靖皇帝为了压一下孔子，把他的王号也给取消了，师与帝王是不能并列的。

再次，君可以与师合一，但孔子这样的师则不能为君。有些儒生，像清朝曾静一厢情愿地空说孔子、孟子等等应当为君，雍正视为大逆不道，兴起了一场文字狱。雍正说，孔孟再世只能尽臣子之道，岂能做皇帝！

孔子有许多封号，但都是帝王赏赐的。帝王们出于种种考虑，封号上下起伏，并规定享受不同的祭祀，这些都是帝王手中的用具。

儒家、孔子得到独尊的地位，是由帝王确定的。假如是民间的自由竞争，儒学处于什么样的地位是很值得怀疑的，孟子哀叹孔学不兴。魏晋南北朝佛、道的兴起就冲击了儒术，使其趋向衰

落。唐朝除提倡儒之外，还提倡佛、道，儒家就被挤到了一边。说明儒家的竞争力并不是绝对能占上风。

另外，中国的思想是多元的，在多元中各有自己的祖师或圣人，但这种圣人只在自己的派别内被视为权威，超出派别则可能是另一种地位，比如儒家视孔子为圣人，但在庄子学派那里则视为祸首。在一部分法家看来，儒家也是属虱子、臭虫之类的秽物。

4. 帝王举措可以超越经典的“道”，

自行其是

这类的事举不胜举，这里仅说两例。武则天称帝并不符合儒家的“道”，但她靠势径称“圣神皇帝”，骆宾王的讨武氏檄满篇儒家的道论，能奈何武则天？倒是武则天利用佛教中的《大云经》主张的东方女王为自己张目。此时的“道”随“势”转，其实在这个时候，“势”即“道”。

以明代大礼仪之争为例，明世宗嘉靖以藩王身份继皇帝位，登基后不顾礼制，追封自己的生父兴献王为睿宗。由此引起了所谓的“大礼仪之争”。首辅杨廷和等认为生父只能为皇叔考。另一些人为了迎合世宗心意，上书应尊兴献王为帝。双方争论激烈，朝臣二百余人跪于左顺门前反对，激怒了嘉靖，下狱者一百三十四人，廷杖而死者十六人。按说，嘉靖违儒家的“道”，但他也讲了一通“道”，而他讲的“道”有最高权力作后盾，因此是最高权威，只能按照他的决定办。

权力高于思想“权威”的事多多，最高权力的决定就是最大的思想观念权威。

5. 祖宗之法的至上性

中国社会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家国一体，或曰“家天下”。汉人“每称天子为国家”，因此家法与国法是没有原则区别的，在许多事情上家法与国法是混通的。中国又是一个宗法社会，尊祖敬宗、家长制是其根本法则。尊祖敬宗是维护后继者合法性的重要依据。继体之君对其开国祖宗，都视如神圣，并把祖宗的举措、言行上升为“法”、“制”、“训”、“道”。从有文字记载开始就有这类的观念。商王每每以“先王”为旗号。周代有“文王之法”。《诗经》中有“不愆不忘，率由

旧章”。秦始皇则想为万代立法。汉代常称“汉故事”、“汉家故事”、“国家故事”、“汉家旧典”、“汉典旧事”、“祖宗旧事”。这些“汉家旧典”、“汉典旧事”、“祖宗旧事”也就是“国体”。宋代更为强调“祖宗之法”、“祖宗家法”、“祖宗法”、“祖宗之制”、“祖宗法度”、“祖宗典制”、“祖宗故事”等等,这种祖宗之法既是制度性的,又是精神性,正如邓小南所论:“诸种说法的共同之处,在于对本朝前代帝王所施行法度中一以贯之的精神之追念与推崇。”“说得浅白一些,就是‘一切按祖宗的既定方针办’”(《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疏略·序引》)。

其后各朝也仍旧高扬祖宗之法。祖宗之法不仅具有制度性,也同样具有思想权威意义。慈禧整治光绪变法就是打着祖宗之法的旗号,慈禧说:“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汝何敢任意妄为!诸臣者,皆我多年历选,留以辅汝,汝何敢任意不用!乃竟敢听信叛逆蛊惑,变乱典型。何物康有为,能胜于我选用之人?康有为之法,能胜于祖宗所立之法?汝何昏愤,不肖乃尔!”“变乱祖法,臣下犯者,汝知何罪?试问汝祖宗重,康有为重,背祖宗而行康法,何昏愤至此?”(转引雷颐:《慈禧与“祖宗之法”》)在祖宗之法面前,光绪战战兢兢难于应对。当然更根本的是慈禧拥有大权,祖宗之法也才有权威。

6. 圣谕是最高权威

圣谕是皇帝训诫臣下的诏令或教谕,就是现在常说的“最高指示”。

中国历史上的帝王都特别注重以帝王的名义颁布诏告,秦始皇到处筑立的刻石,就是最高的训诫。其后历朝历代都仿效。就以清为例,顺治有“六谕”,康熙仅一步完善,增加为“圣谕十六条”,内容涉及治理国家的方方面面,依次为:《敦孝悌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意》《训子弟以敬非为》《息诬告以全良善》《诫窝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联保甲以弭盗贼》《解仇愤以重身命》。雍正又有《圣谕广训》。每月初一、十五要进行宣讲,人人都必须听教,而且定为考试内容。圣谕被视为神明,设专门的“申明

亭”,进行供奉。圣谕无疑是更加神圣的权威。

7. 文字狱无疑是更严酷的思想权威的标志

中国历史上的文字狱数不胜数,文字狱有各式各样,其基本点就是思想犯上和异端罪。文字狱对思想有着全局性的控制意义。

帝王既然是圣明的,就必然成为思想观念最高的导师或最高的权威。

三、极度个人崇拜时期的“天王圣明”

“天王圣明”观念在我们的经历中历久不败,在极度个人崇拜时期,以其新旧混合的方式,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两者相较,有过之而无不及。现代版的“天王圣明”观念主要表现为如下几点:

其一、规律出自领袖论。科学昌明时代,规律被视为科学的精华,而我们生活时代的一切社会规律都是由领袖发现的和规定的。按恩格斯的说法,社会规律是很少的,但我们经历的时期规律被泛化,如农村一律吃“大锅饭”都是规律。在规律面前,所有的人只能服从,犹如服从“天命”一样。我辈由崇信规律而崇拜领袖是我们一代人最深切的经历。

其二、“最高”说的话句句是真理论。“文革”初起一位重量级人物提出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本是对的,但由“最高”定稿的“五一六通知”说这是“是资产阶级的口号”,把“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打得粉身碎骨,这也是我们经历的历史!

其三、最高指示论。上级指示何其多!但有“最高指示”在,其他指示就相形见绌或作废,“最高指示”形成了压倒一切之势。落实“最高指示”不过夜,晚间新闻播送了“最高指示”,我们需连夜上街游行庆祝。

其四、一贯正确论。独占正确性,势必把其他人都认为是错误的载体。那时几乎天天讲两条路线的斗争,“最高”则是绝对正确的体现。

其五、舆论一律论。舆论是公众的意见或言论。人们对客观事物认识的多样性,决定了社会舆论的多样性。社会舆论不可能完全纳入一个模式。当然占据主导地位者也会以自己的意愿

制造和引导某种特定的舆论,这也是合乎常情的,但强行舆论一律论则违背舆论多样性的客观事实,箝众人之口,造成天下哑语。我们经历的时期所有媒体是一个声音,听国外广播是有罪的。

其六、统一认识论。在某种范围内统一认识有其必要,但要求全社会的统一于特定的“思想”,既不可能,也做不到。非要“统一”,靠“批判的武器”是做不到的,只能靠“武器的批判”,于是文字狱就必然接踵而来,死难者遍寰中!

其七、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要执行,在执行中理解论。在行政范围内这种要求也许有某种合理的一面,但未必全合理。要求全社会的人都如此,人们只能作“工具”和顺民。

其八、意识形态领域全面专政论。这是很可怕的,恐怖笼罩着全社会,窒息了全民族的思考能力。

我胪列了八条,与前相对,意在说明“天王圣明”的影响是何等严重呀!

“天王圣明”与当年我们天天高呼的“英明、正确、伟大的导师”是一脉相承的,所有的人只能

匍匐在脚下聆听教育、做子民,是永远长不大的孩子。

“权威”一词的初始意思就是权力、威势,《吕氏春秋·审分》:“万邪并起,权威分移。”在传统观念中“权威”总是与外在权力的威慑密切不可分的。近代以来权威的概念的内含不断拓展,在不同领域含义不尽相同,时下对权威的态度既有主动的认同,又有被动的服从,也有被动与主动两种意义的混合,即权威既是客观的支配力量,又被自己认同或盲目的崇信。权威通过令人信服或盲目信从的威信、知识、声誉发生作用。在一元化的体制下,在许多场合,权威和权力是结合在一起,相互为用、相互增强。以“孔子是非为是非”和“非圣无法”的态势依然盛行。所谓权威思想依然由权势所定夺。

在公民社会通行的是思想自由,在这种环境下依然会有杰出的思想家,但我建议在思想界无需与“权威”两个字搭配和挂钩。我不是无政府主义者,让“权威”留给行政与管理去用吧。■

(作者为南开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 徐庆全)

欢迎订阅2013年
《同舟共进》月刊

邮发代号:
46-56

专题策划 · 凝聚改革共识,再造改革动力 ·

- 邓小平南方谈话二十周年
中国,是否需要一次新的“南方谈话”
中国站在新的历史十字路口
当元老派成为改革家之后
——中国与苏俄改革战略的反思
再次呼唤敢闯敢冒的小平精神
陈开枝:南巡是“老船长”的“最后一搏”
叶选基讲述粉碎“四人帮”与邓小平复出
亲历齐奥塞斯库时代
——罗马尼亚前驻华大使罗明夫妇访谈录
- 公共话题
从“哲学已死”看当下高教改革
大学:如何“宁静”,怎样“致远”
“美国高考”一文定终身?
广东“乌坎转机”的范本意义不可低估
“刑场上的婚礼”与刑场外的真相
陈昭礼:不该被遗忘的百色起义领导人
- 议政论坛
中国千年外交的空间问题
- 往事历历
乌龙会的乌龙事
- 以史为鉴
1941年夏苏军惨败的不解之谜
肖洛霍夫:“左”“右”逢源的代价
- 四海之内
冯友兰历史沉浮的标本意义
舟边絮语
忽然想到——文化如何繁荣
“国军俘虏国军”

- 周瑞金
马国川
萧功秦
鄯烈山
郭英秀
程冠军
孔寒冰
刘道玉
陈平原
薛涌
马立诚
刘统
钟兆云
袁南生
聂作平
述 强
陈为人
施京吾
陈四益/文
黄永厚/图
许家祥

· 以上为《同舟共进》2012年第2期主要目录

可直接汇款到本刊发行部或到当地邮局订阅
订阅价(含邮费): 每期10元,全年120元(港澳地区300元)
地址:广州市明月二路66号同舟共进杂志社 邮编:510600
电话:(020)38308908 传真:(020)38308918
电子邮箱:tongzhougongjin@gmail.com

欢迎订阅2013年度
邮发代号82-688 中国钓鱼

《中国钓鱼》杂志(月刊)由国家体育总局主管,中国体育报业总社主办。创刊于1984年,为全国性垂钓专业刊物,内容以信息量大、实用性强、趣味浓厚而广受读者赞誉。

《中国钓鱼》作者队伍由业内资深专家和经验丰富的钓鱼爱好者组成,各地读者均有很多机会刊登稿件和图片,是广大钓鱼爱好者交流经验体会、分享钓鱼人生的理想平台。

常设栏目有:大鱼榜、库塘钓、江河溪流钓、海钓、野钓百计、竞技有术、我的一招、饵料篇、答钓友、赛事报道、钓协之声、渔具城、名人在线、天下好钓场、钓四方、钓鱼人部落、钓鱼与健康、海外一览、鱼的知识、哈哈鱼、钓鱼漫画、诗歌、摄影、绘画欣赏、鱼拓教室等等。

订阅抽奖:凡于2012年12月31日前将2013年全年《中国钓鱼》杂志订阅单复印件寄(或传真)至编辑部者(请寄:100061北京体育馆路8号《中国钓鱼》杂志读者意见调查组收。也可将订阅单照片或扫描件发至编辑部电子邮箱:zgdy@vip.sina.com),均可参加1000名幸运奖(钓鱼用品)的抽奖活动。请务必留下电话号码,以备联系。

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 每册定价10元 全年订价120元

编辑部地址:100061北京体育馆路8号 电话/传真:010-67158584

“如丧考妣”与“山呼万岁”

○ 张绪山

一、民族间哭丧行为的相似性

最近,父子世袭相传执掌大位的某国政治强人亡故了,媒体上每天展现的图像是,“无限热爱领袖”的朝鲜民众,无论男女,也无论老幼,无不痛哭流涕、捶胸顿足、呼天抢地,撕心裂肺、肝肠寸断……举国号啕的悲壮场面,让我们这些旁观的“局外人”得到的印象是,即使是高明的文学高手,用尽所有形容悲伤的词汇,都不足以传达该国民众内心的悲伤于万一。如果不得不使用一个词汇加以形容的话,我觉得似乎只有一个“如丧考妣”勉可当之。

其实,对于当今四十岁以上的中国人而言,这样的场面实在是再熟悉不过了,因为那就是我们的亲身经历。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驾崩”的消息传来,对于我这样接受“红太阳”观念教育的小孩子,第一反应便是不相信!神一般的伟大领袖如何能死?!“阶级斗争”理论灌输下的人们近乎本能地认定,这种“恶毒”的消息一定是阶级斗争新动向,是不甘失败的阶级敌人对伟大领袖的丧心病狂的污蔑与攻击!当官方广播传出播音员以极其沉痛的语调一字一顿地正式宣布领袖“驾崩”时,我们的反应也像如今的某国民众一样:先是晴天霹雳、五雷轰顶;继之天塌地陷、头晕目眩;然后捶胸顿足、呼天抢地、悲痛欲绝、如丧考妣。当时见诸官方报端的最常见的惯用词,就是“阴霾沉沉、日月无光”,“草木含悲、江河呜咽”等等。

2008年我去台湾辅仁大学参加学术研讨会,会议主办方组织参观“两蒋”博物馆,从馆内电视播放的节目中看见1975年4月5日蒋介石过世后的安葬场面。当时的“行政院”宣布4月6日起开始为期一个月的“国丧”,此间军公教人员一律着素服,并佩戴宽二寸半的黑纱,为蒋戴孝。彩

色电视画面一律改为黑白,停止娱乐、宴会及各项庆祝集会30天。蒋介石移灵大溪陵寝时,全台民众就地肃立致哀一分钟,从台北到大溪62公里,二百多万人沿途设案路祭、跪拜迎送,场面可谓壮观,其中不乏哭天抢地、如丧考妣的情形。台湾民众对蒋介石的态度,竟与大陆民众对毛泽东的态度如出一辙!

毛、蒋作为独裁者在执政手法的相似性,此二人葬礼的一致性,以及两岸民众哭丧行为的相似性,让我想起年鉴派史学家马克·布洛赫提到的一句谚语:“同辈相似,胜似父子”(men resemble their times more than they do their fathers)。毛、蒋二人虽被流行一时的阶级理论分别冠以“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的标签,其实,从历史学家的眼光看,他们都跳不出相同的时代所固有的局限;而如今的某国如丧考妣的哭丧行动,竟如几十余年前的中国民众对蒋、毛的态度一模一样,这个事实说明今日之某国与毛、蒋时代的中国可谓半斤八两,彼此彼此。

由此我注意到另一个现象:与“如丧考妣”哭丧方式密切关联的,是这些被人视为“考妣”的丧者,生前都被视为民众的“救星”,“伟大领袖”、“伟大将军”,被民众奉为神灵,三呼万岁。没有生前的“山呼万岁”,死后被人哀悼“如丧考妣”就是不可想象的;同样,在“山呼万岁”的国家,领袖之死民众间不呈现“如丧考妣”的现象,也是不可想象的。可以说,“山呼万岁”与“如丧考妣”乃是不可分割的关联现象,犹如同一个钱币的两面。这似乎是政治学上的一条不可改变的规则。但对于这样的现象,应该做怎样的解释呢?

二、“如丧考妣”与“山呼万岁”所展现的前现代政治伦理

“如丧考妣”,词典的标准释义:“考:死了的

父亲；妣：死了的母亲。好像死了父母那样悲痛。”最早出处：《尚书·舜典》：“二十有八载，帝乃殂落，百姓如丧考妣。”在中国历史上，皇帝乃至官员都习惯以民众的父母自居，皇帝称治下的百姓为“子民”，官员自称是百姓的“父母官”，站在帝王立场上的正史的作者，将帝王驾崩之后百姓的表现描述为“如丧考妣”，从情感上讲虽属矫情伪饰，但以前先代政治伦理，实属“理固宜然”。

作为一种独特的标签，民众对帝王的“如丧考妣”与“山呼万岁”，所体现的是执大位者至高无上的神圣性和权威性；这样的标签具有独占性，断不可用于他人之身，否则便是犯上作乱，罪不容诛。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上，国家首领的前身是巫师，即承担与神秘大自然沟通的神秘人物；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帝王取代了巫师的地位，成为俗人与上天沟通的媒介，得到国家意识形态的肯定。董仲舒《春秋繁露》从“王”字上解释帝王的“天性”：“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通之，非王者，孰能当是？”又说：“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一国则受命于君。君命顺，则民有顺命；君命逆，则民有逆命；故曰：一人有庆，兆民赖之，此之谓也。”由于帝王身系上天与人间的重任，帝王成为人神两性兼具的“神人”，其本身的存亡祸福关系到兆民的切身利益，所以帝王的健康及生死就被渲染成了“天大”的事。

帝王神圣与尊贵的“神人”特性，集中体现在“天人感应”上；反映帝王神圣性的“天人感应”主要由帝王神话来表现，故中国正史中一以贯之、必不可少的内容便是帝王神话。最具代表性的是汉代开国皇帝刘邦的神话。刘邦神话的典型性在于他的完整性：包括出生神话：“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於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行为神话：芒砀山斩蛇起义，“赤帝子斩杀白帝子”的传说；还有个人“异象”神话：所谓“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等等。翻开绵延不断的所谓“正史”，诸如此类的神话几乎是不可或缺的内容，尤为开国皇帝传记所不可缺少。

从心理上，现代社会的“领袖崇拜”与古代神

学政治乃是一脉相承，由同样的信仰元素构成的。首先，领袖神话也像帝王神话一样，首先的手段是将领袖作“超人格”的比附，最常见的是将领袖比喻成光热无穷的“太阳”。古代埃及的法老，古波斯的帝王，乃至近代的法国国王，或者被描述成“太阳神”之子，或者干脆了当地自比“太阳”。朝鲜将金日成的生日定为国家节日“太阳节”，当年中国的领袖则被称为“最红最红的红太阳”。诸如此类的领袖神话可谓渊源有自。其次是图腾的确立，如领袖像、像章与塑像的广泛流行，钱币上领袖形象的塑造；反映领袖丰功伟绩的各类图像、标语；充当领袖思想灌输工具的“红宝书”“绿宝书”等等。第三，“天人感应”。作为一种心态，“天人感应”心态既是领袖崇拜得以形成的土壤，也得到领袖崇拜的推动。据最有名的官方资料记载，金正日出生在神山上，出生之时，天空出现的两道绚丽斑斓的彩虹和一颗光明星，一只喜鹊飞来，宣告一个将来要拯救全人类的领袖的诞生。另据朝鲜中央通讯社报道，金正日逝世前，他出生的神山（长白山）天池的坚冰破裂，山头刮起暴雪；第二天凌晨骤停，地平线上又泛起红霞，一只丹顶鹤在金日成铜像上空盘旋三周，在树枝上低头停留，十时许才向平壤方向飞去。这种“天人感应”的领袖神话在第二代执政者手里更加发扬光大，其原因不难理解，世袭制下的子承父业，继承大位的后继者没有人所共知的战功可资宣扬，在治理国家的政绩乏善可陈的情况下，其权威的建立只有依赖超自然的“奉天承运”神话。诸如此类的官方报道，均可以成为我们研究现代社会“领袖崇拜学”的鲜活样本。

领袖神话所要表达的是领袖“超凡脱俗”的超自然力。朝鲜小学生的课本里有一个流传很广的“金爷爷石子打卫星”传说：有一回金爷爷（金日成）在户外走的时候，从花坛里，拣起一个石子，冲着天上骂了一声，该死的美国佬，就把这个石子扔上天，一刹那间，天上闪出一道强光，一个发光物体坠落在地上烧毁了，原来是美国间谍卫星。与领袖超自然力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是领袖智慧的包罗万象：领袖是真理的化身，对人间的一切真理无不掌握；领袖对社会发展的规律了如指掌，以其“超凡脱俗”的智慧为我们创造了今日的美好生活，并将我们引向更加美妙无比

的极乐园；只要听从领袖的指示，人世间的一切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一言以蔽之，领袖及其神圣家族掌握着通向未来幸福之门的钥匙。所以，对领袖超自然能力的信仰，与对人类美好未来的希冀，以及领袖将带领人类进入美好理想天国的幻想，构成领袖崇拜最主要的内容。这种观念几乎无例外地成为家族世袭制国家宣传机器极力灌输的内容。

在这种观念支配下，人们除了对“人间神”的感恩戴德，对身沐领袖恩泽感到无限幸福外，最大的恐惧莫过于失去领袖的前景。“山呼万岁”与“如丧考妣”所表达的正是这样一种感激与恐惧错综交织的复杂情感。杨澜（中央电视台前主持人）在金正日逝世后发表在微博上的感言说：“毛泽东去世时我才上小学二年级。当时师生都泣不成声。记得我满怀恐惧地问老师：‘毛主席不在了我们会不会去做童工？’那种全民幸福系于一身的洗脑和催眠真不可思议！”杨澜与笔者大致属于同一代人，她的这种感情并非孤例，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都曾有过，是“太阳神”光辉照耀下成长的一个人的“整体心态”。

“如丧考妣”与“山呼万岁”的集体行为还展现前现代政治伦理的另一个方面，即对自由与平等的恐惧。自由与平等本来是人类的根本状态，但人类现实社会却处处存在束缚，正如卢梭《社会契约论》开篇所说，“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不在枷锁之中”。这种无处不在的枷锁带给人们的是长期的奴役，然而，一旦这种奴役为人们所熟悉，就逐渐演变为一种约定俗成的生活方式。在这种熟悉的生活方式中，人生的目标和全部内容从很早就一览无余，确定不移，不再是一个难以预测的因素；这种“确定性”较之处处需要自立自为的社会，更能给人们带来某种“稳定感”和“安全感”，所以接受既定的不自由和不平等，就演变成为一种“自由”与“自愿”的选择，而对事事由自己决断，自己承担行为后果的“独立行为”，则感到“天然”的不适应，乃至莫名其妙的恐惧。这就是弗洛姆阐述的“逃避自由”的道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有一段话表达的是同样的道理。他说：“甘受奴役的现象发生于整个中世纪，在德国直到三十年战争后还可以看到。普鲁士在1806年战败之后，废除了依附关系，同时

还取消了慈悲的领主们照顾贫、病和衰老的依附农的义务，当时农民曾向国王请愿，请求让他们继续处于受奴役的地位——否则在他们遭受不幸的时候谁来照顾他们呢？……无论如何，我们必须认定，平等是有例外的。对于缺乏自我规定的意志来说，平等是无效的。”处于不自由状态的人所拥有的“安全感”与“幸福感”，是习惯于自由意志、拒绝外力强迫的人们所难以理解的。

经过意识形态的反复灌输，人们的自由思维能力被降至最低点，怀疑精神几乎被完全遏制，处于这种精神状态的人们，面对“人间神”的谬政，即使本能地产生些微的朦胧的心灵不满，仍不会也不敢对“人间神”产生根本的怀疑，所以仍会在充满幸福幻想的状态中对活着的领袖“山呼万岁”，对驾崩的领袖“如丧考妣”。这份情感，在现代眼光看来是如此不可思议，但并不是完全虚伪。它蕴含着前现代的政治伦理。几十年前，我们看到数以亿万计的民众集体拜倒在活着的“大救星”脚下“山呼万岁”，对“人间神”的驾崩“如丧考妣”，不是同样的道理吗？！从这个角度，回过头来反思几十年前我们沉浸在“拜神”氛围中的那份“幸福感”，反思那段令人倍感羞耻的民族经历，我们对如今朝鲜民众在领袖生前“山呼万岁”、死后“如丧考妣”的行为，就会由“同情的理解”而在内心深处多一份“理解的同情”。

三、“如丧考妣”与“山呼万岁”为何不见容于现代民主制度

“如丧考妣”与“山呼万岁”所展现的前现代政治伦理，除了包含对国王神秘中介能力的信仰外，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即民众对自身福祉的期待；不过，这种期待不是通过个人奋斗去实现，而是通过具有超自然能力的国王（或皇帝）去实现。正如原始生活状态中的爱斯基摩人所坚信的那样：“我们相信我们的巫医、我们的魔法师。我们相信他们，是因为我们希望自己能活得长久些，是因为我们不愿受到饥荒和饿死的威胁。我们相信他们，是为了使自己的生活安全、食物有保障。如果我们不相信魔法师，我们要狩猎的动物就会全无踪影。如果我们不听从他们的劝告，我们就会生病、死亡。”（《全球通史》上，第72页）在

心理上,集权制度下的领袖崇拜,与蒙昧状态的人类对巫师的崇拜同出一理,都是最大程度地将领袖幻化成无所不能的“人间神”,相信这个人间神可以将美好天国的理想变为人间的现实,可以消除无所不在的人间苦痛,将微不足道的芸芸众生从苦海中拯救出来,过上美好生活。这种情形恰似宗教徒相信宗教领袖掌握着通向天国的钥匙。

作为个体之人,每个人的力量在任何时候都是弱小的。这种弱小感又往往通过自我贬低而加剧。但这种自我贬低有时并非出于自愿,而是来自外部有计划、有系统的强加,如“文革”时期来自权力当局有计划“组织”的“自我批评”。在一个社会中,个体之人的权益不能通过有效的社会机制得到保护,人们的期望就必然转向一个无所不能的“超人”即人间神,期待这个人间神给个人和整个团体或族群带来利益。这种心态在民族冲突中多半演化成民粹意识;而具有独裁倾向的政治家多半会有这种民粹意识和心态,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这里有一个真实的故事。1933年8月1日,德意志第三帝国总理办公厅收到一位普通的果农从家乡寄给总理希特勒的来信,信中写到:“我终于如愿以偿,成功地研制出一个全新的珍贵草莓品种。为了展现对帝国总理的敬仰和爱戴,我恳求将这个新品种命名为‘希特勒草莓’。”信写得诚恳,情感也很真挚。这一时期,类似的信件,帝国总理办公厅每天都要收到成千上万。写信者是普通的工人、农民、士兵、知识分子、政府公务员,还有中小学生。来信的内容五花八门,多数是表达对元首的崇拜和感激之情:“阿道夫·希特勒,我们相信你,没有你,我们就是一盘散沙;有了你,我们就是一个民族。”“你递给我们你的手和你的目光,这目光至今仍使年轻的心荡漾;美好的幸福永远将我们陪伴,这一刻产生如此强大的力量。”希特勒在德国虽然没有被民众“山呼万岁”,但他以纳粹领袖特有的手势向民众致意所引发的民众海啸般的欢呼,与我们看到的“山呼万岁”在形式与本质上都属于同一个范畴。在德国的这些普通人的心目中,元首是美好理想的化身。

然而,人类历史的经验无数次地证明,不管多么了不起的人物,也不管他曾经做出过多大的

贡献,一旦被民众视为真理的化身,被奉为“大救星”而取得至高无上的权力,民众无条件地拜倒在“大救星”脚下,绝对地服从“大救星”指挥,成为历史舞台上被领袖操纵的木偶,那么一个可怕的暴君迟早就会出现,而由他导演的人间悲剧也迟早必会上演。正是基于这样的逻辑,现代民主社会绝不会将政治领袖视为不犯错的“圣人”,更不会视为充满神圣性的“人间神”;相反,政治领袖的“凡人欲望”——权力欲、性欲、贪物欲——与权力结合形成的潜在权力犯罪,成为必须防范的对象,这就是“权力趋向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这一现代民主理念所确立的政治理念。

两千多年前,希腊的伯利克里在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说过:“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是因为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解决私人争执的时候,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让一个人负担公职优先于他人的时候,所考虑的不是某一个特殊阶级的成员,而是他们有真正的才能。任何人,只要他能够对国家有所贡献,绝对不会因为贫穷而在政治上湮没无闻。正因为我们的政治生活是自由而公开的,我们彼此间的日常生活也是这样的。……在我们私人生活中,我们是自由的和宽恕的;但是在公家的事务中,我们遵守法律。这是因为这种法律深使我们心服。”

从最原始的民主思想中,我们可以明白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第一,主权在民,权力开放,非一家一姓所垄断,也不是哪个集团可以垄断;第二,民众平等参与公共管理,以其能力担任公职,为社会服务;第三,法律至上,人人平等。换言之,民主政治的应有之义是,社会是所有公民的社会,每个公民都平等地享有管理社会的神圣权利,任何个人不享有对公共权力的垄断权。在人人平等参与的民主政治环境中,每个人不可能因自己对社会的贡献而自视为神圣,更不可将自己的贡献视为排斥他人参加政治的资本与理由。

因此,在民主政治体制下,人人都是这个体制上的一个分子,老百姓不会将当政者视为具有超自然特性的“人间神”而赋予他垄断权力的特权,更不会对当政者感恩戴德。尽管整个社会和民众对杰出人物的善行及为社会立下的功勋表示高度赞扬,但绝不会放弃一个基本的常识:整

个社会就像一部运转的机器,每个人只是这个机器上的一个零件,一个零件的损坏或报废,可由新的相应零件所取代;即使是才华超群绝伦、经天纬地的领袖人物死去,整个社会也不会停止运转。从这种意义上,我们就便可以理解英国首相丘吉尔的一句名言:“不对人感恩戴德是一个伟大民族的特点”(Ungrateful characteristics is a great nation)。丘吉尔说这句话的背景是,二战结束后为英国立下丰功伟绩的丘吉尔在竞选中失去了首相宝座,有记者采访丘吉尔:“你在二战中战功卓著,却失去了首相宝座,这是否意味着英国人的不知感恩?”丘吉尔肯定地点了点头之后,出人意料地说出了这句富有哲理的名言。

可以说,“山呼万岁”与“如丧考妣”的存亡有无,是一个国家是否步入现代国家行列的标志之一:只要“山呼万岁”与“如丧考妣”的奇观存在,这个民族的思维和心态就仍然停留在前现代政治伦理中,这样的国家就不可能是现代国家,其民众就难以称得上是现代公民,而是神权观念和皇权思想支配下普遍处于奴役状态的臣民。

四、中国社会仍然需要新的思想启蒙

当年邓小平针对“文革”时期领袖“个人崇拜”给国家和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明确地表示,一个国家将希望寄托于一个人身上是极其危险的。他推动的改革开放以及由此带来的国家进步,不仅阻止了在他主政时出现“山呼万岁”的景观,而且也阻止了在他逝世时出现民众“如丧考妣”的一幕;中华民族安然地接受他谢幕后离去,显示了这个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变的印迹,这个民族的政治思维正在走向成熟。如果没有迈出这一步,我们与当今朝鲜民众的行为就不会有什么两样;“如丧考妣”与“山呼万岁”就仍然是我们生活不可缺少的政治内容;我们的民众也不会产生今日普遍拥有的觉悟,更不会清醒地认识到一个领导人死去使整个民族“如丧考妣”,这种情形对国家与民族而言是何等的可悲与可怜。

中国社会自20世纪初叶以来,一直经受着世界风云的冲击,接受着外来先进文化的激荡;“天朝上国”幻觉破灭、闭关锁国状态不在状态的中国人,终于认识到“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

昌,逆之则亡”的道理。经新文化运动之启蒙,中国社会进入一个民众觉醒的时代,《国际歌》所表达的“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的现代政治理念逐渐为民众所接受。这是几代文化先觉者筚路蓝缕,致力于民众启蒙与社会伦理改造的重要成果。

然而,《东方红》所代表的中国传统“大救星”观念,一度狂飙突起、如痴如醉的领袖崇拜,排山倒海的“山呼万岁”,完全淹没了《国际歌》所表达的现代公民精神。即使在改革开放三十余年后的今天,传统“天人感应”的领袖神话仍然有其土壤。笔者近年来多次听到一个插曲,1993年毛泽东百年诞辰纪念发生的几件“天人感应”的奇事:(1)上海制造的毛泽东铜像在运往韶山的途中,经过江西井冈山时,车忽然开不动了,经检查车辆没有问题。当地民众说,毛主席在这里闹革命,想在这里住一住。第二天早晨,司机向铜像三鞠躬,说:主席我们要赶时间,如果完不成任务,责任太大了。车没有修理又正常行驶了。(2)毛泽东铜像如期抵达韶山。六米高的铜像安放在十米的高台上,用绳捆绑着铜像的颈部吊上去,怎么也放不稳,当地老人提醒快解开绳子,将绳子捆绑在腰部位置,铜像很快就位了。(3)铜像安放之日,东方的太阳与西边的月亮,竟同时高悬空中,呈现千古未有的“日月同辉”景观。(4)每年只在春天开一次的杜鹃花,却在12月份的那一天,漫山遍野地开放。百姓说这是在欢迎毛泽东回家。那一年杜鹃花开了两次。从科学与理性的角度,诸如此类的神话,对一个经受现代科学精神洗礼的公民而言,纯属天方夜谭,其滑稽荒谬无需辩驳。但令人诧异的是,众多人都津津乐道于此类神话;更令人诧异的是,许多人对我讲述这些故事时,我不屑的讪笑引来的多半是惊讶乃至敌意。这种情形说明,即使在今日中国,两千年来政治神学塑造的心态与思维习惯,绝非轻易可以根除,新的思想启蒙任重道远,未有穷期。■

(作者为清华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 徐庆全)

带不带毛泽东参加长征的两种“版本”

○ 罗庆宏 黄少群

关于带不带毛泽东参加长征,长期以来只有一种“版本”,即所谓的“主流观点”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博古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从宗派主义出发,曾经想把毛泽东留在中央苏区,即不带毛泽东参加长征;只是在毛泽东的要求和周恩来的争取下,博古和李德才勉强同意毛泽东参加长征。可是,近年来却出现一种完全与之相反的另外一种“版本”,即:是毛泽东本人不愿意参加长征,经过博古主要是周恩来的说服,毛泽东才同意参加长征了。这两种“版本”孰对孰错,本文试作如下详细考析。

一、第一种“版本”即“主流观点”的来源是很“权威”的

认为“左”倾中央不想带毛泽东参加长征的观点,主要来源于几位老同志的回忆录,如《回忆与研究》(李维汉著)、《伍修权回忆录》(伍修权著)、《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吴吉清著)等。另外还有权威著作《毛泽东传》也持此说。

李维汉在回忆中写道:“记得在中央苏区时,我和博古、张闻天(洛甫)等住在一个地主的大院里,有一次,我在一间房子里打乒乓球,听博古对洛甫说:‘老毛(指毛泽东)今后只是加里宁了,哈哈!’”^{注1}

加里宁曾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但实权却在斯大林手里。这里指毛泽东被“架空”了,苏维埃政府主席只是一个虚职。

苏区时期,毛泽东的警卫员吴吉清,回忆了长征开始时,为毛泽东领取物品的情节:刘副官“翻开本子,看了半天才说:‘毛主席的名字不在这里。这里博古等为中央一队;王稼祥等为中央二队。毛主席来了,怎么办?我去请示一下。’”^{注2}过了一会儿,刘副官回来说:“毛主席及有关人员编为三队吧!”^{注3}随后发了一些物品。

吴吉清继而这样说:“原来,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代表者,排挤毛主席,不想让毛主席出来工作,中央机关和红军进行这样大规模的转移,竟对毛主席置之不顾。”^{注4}

被引用最多的也是最权威、最明确的说法,是当年担任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翻译的伍修权的那段话:“最初他们还打算连毛泽东同志也不带走,当时已将他排斥出中央领导核心,被弄到于都去搞调查研究。后来,因为他是中华苏维埃主席,在军队中享有很高威望,才被允许一起长征。”^{注5}

到了1984年3月,伍修权在北京接受美国作家采访时还是这种说法。索尔兹伯里在他的书《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也是这样写的。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金冲及主编的权威著作《毛泽东传》也这样写道:“此时,中共中央已着手准备西征到湘鄂西同二、六军团会合,但没有向毛泽东透露。博古和李德还曾想不带毛泽东走。”^{注6}

以上这些人的回忆,就构成了第一种“版本”,并被引用至今。

二、第二种完全相反的“版本”

2009年,香港大风出版社出版了秦福铨先生的《博古与毛泽东》(以下简称“秦书”)一书,却提出了另外一种与上述“版本”截然相反的“版本”:中央决定的长征名单中本来有毛泽东,是毛泽东本人表示不愿意参加长征;经过博古主要是周恩来的说服,毛泽东才同意参加长征了。

该书对毛泽东从不愿意参加长征到同意参加长征,记述了这样三个过程,且详细摘录如下:

1.毛泽东和博古面对面的谈话

“秦书”写道:“1934年6月中旬,毛泽东得知政治局书记处作出决议,中央红军要转移去湘鄂

川(本文作者注:“湘鄂川”应为“湘鄂西”)。之后,找到博古,表示他不同意中央书记处的这个决定,劝说博古中央红军要坚持留在中央苏区不能走,理由是这块根据地是苏区军民五年多艰辛创业建成的,大小战斗几十次,牺牲了许多优秀的革命战士和共产党员,来之不易,现在撤离是背叛,是‘右倾逃跑主义’。并说他当年率领红四军一千六百人(实际是三千六百人——引者注)进赣南,现在老底子已牺牲了近千人,他不能对不起死去的烈士,即便你们要走,我和老部队不走,你们怕和蒋介石正面交锋,我不怕,我在这里人熟地熟,不怕堡垒战,决不右倾逃跑……”^{注7}

当博古问毛泽东用什么方法打破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时,毛泽东说:“办法就是打圈圈”^{注8}。并建议中央红军从会昌出发,经高排、渡桃江、取南康、崇义,越过罗霄山南段进入湖南,攻汝城、资兴、耒阳,跨过粤汉路,进阳明山北端的水口山一带休整。这样把围困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队引走,解苏区之围,同时找机会消灭尾追蒋军的一部分,杀伤他的有生力量。然后,中央红军可以向南取嘉禾、宜章、南雄,再返回中央苏区,总之用“兜圈子”的办法,把敌人主力引开,化解敌人的“围剿”。

毛泽东还提到:井冈山早期有一个土匪首领,即山大王王佐的师傅,名叫朱孔阳(外号朱聋子)的,曾经提出过:“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的游击战术,致使官府终剿不灭。毛泽东上山后,很赞赏这一战术,并将这句口号稍作修改:“不仅会打圈,还要会打仗。”毛泽东向博古强调:可以用这个办法来打破敌人的“围剿”。

针对毛泽东提出的“兜圈子”办法,博古提出不同看法:“既然是兜圈子,为什么你总爱在湘中、湘南兜呢,兜来兜去总兜不出蒋介石的手掌心,总是在蒋介石中央军的控制范围内兜,为什么不兜远些,兜到湘鄂川、兜到黔北去呢,那样就跳出了蒋介石的手掌心,中央红军就增加了自由度。”^{注9}

针对毛泽东指责去湘鄂川边根据地是“右倾逃跑主义”,“博古一面说,一面拿出一份电报来,润之兄,这是四方面军发来的电报,其中提到:他们在1932年10月初,冲出蒋介石的包围圈后,越过平汉路,向西突围,转战三千里,于12月初到达陕南边,当时只剩下一万四千人,但因为脱离了蒋介石的势力范围,面对的敌人换成了四川军

阙,经过一年半的战斗和创业……现在已发展壮大到四个军,六、七万人,开创了川陕根据地。这难道不是一个鲜明的佐证吗。”^{注10}最后,“毛泽东默然了。”^{注11}

2.毛泽东在于都写给博古的信

“秦书”继续写道:毛泽东离开博古后,就到于都去搞调查研究。病了一段,后被傅连璋治好了。“10月初,毛泽东病好后,突然派警卫员胡昌保和吴吉清两人,连夜赶路送来一封信,信内提出:他还是要留在中央苏区,和陈毅一道上山打游击,中央机关里的老人、孕妇、重伤病员以及不愿意跟随中央红军大转移的人,都可以给他留下来,但他需要把罗炳辉和九军团的二十师留下,并说一军团里也有一些干部战士愿意跟随他留下来,请中央批准。信的结尾还作出保证,说二、三年后,中央苏区和留下的红军都将以崭新的面貌迎接中央局回苏区。”^{注12}

3.周恩来说服毛泽东参加长征

“秦书”写道:“博古看完信,便找来周恩来商议此事,周连连摇头说:‘不行,一是已经定了中央分局由项英主帅,现在要换毛泽东,项英的工作不好做,而且涉及到许多人都要变动,中央分局的人事安排是项英亲自点名要的,现在重新调整,在时间上已经不可能了;二是九军团抽走二十师后,只剩下十四师,连军团长罗炳辉也抽走了,岂不是把这个军团解体,成了一个独立师啦,这个变动太大,牵涉整个大转移的部署,不能这么办。我明天去找毛泽东谈一谈’。”^{注13}

“秦书”中还提到博古当时有一种担心:毛泽东留下来会不会“故伎重演”,占山为王,到时候羽毛一丰满又不听中央招呼,闹独立,所以周恩来提出他愿意去于都“和毛泽东谈一谈”时,博古也就同意了。“第二天,周恩来一早就带上警卫员,冒着小雨,披上蓑衣,骑马奔于都去了。第三天,周恩来回到瑞金,只对博古说了一句话:‘他同意随部队转移了’。”^{注14}

以上就是第二种“版本”的由来。

三、两种“版本”孰对孰错

先说第一种“版本”。

第一种“版本”主要来自李维汉、伍修权、吴

吉清几位老同志的回忆录以及《毛泽东传》。在长征出发前夕,李维汉正担任中央组织局局长,伍修权是李德的翻译,吴吉清是毛泽东的贴身警卫。居于这种特殊地位的他们三个人的回忆录,可信度自然很高;而《毛泽东传》更是国内最权威的著作。似乎不能说他们的说法没有“根据”。他们的“根据”主要是来自“左”倾中央自1931年底起对毛泽东的一系列的排挤和打击。

1931年9月博古主持上海党中央工作后,即遵照坚持“城市中心”路线的共产国际和王明的“左”倾指导,对坚持“农村中心”路线的毛泽东采取了一系列排挤和打击的措施,主要是通过“赣南会议”、“宁都会议”、反“罗明路线”和反江西的“罗明路线”即反“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彻底剥夺了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对党和军队的领导权;特别是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到中央苏区后,在第五次反“围剿”的战略战术上,和毛泽东发生了多次“激烈冲突”。李德在40年后(1973年)写的那本《中国纪事》中回忆:在中央苏区时他提出的许多战略战术意见,在政治局和军委会议上“多次”遭到过毛泽东“最激烈的反对”,发生过“几次激烈冲突”。¹⁵

当时控制党和军队领导大权的博古和李德对毛泽东的排挤和打击是中央苏区人所共知的,博、李二人要甩掉毛泽东这个“包袱”,去掉决策上最大障碍的说法,也就很容易让人接受。《毛泽东传》就是这样一路写来,最后得出这个结论的。

然而,这第一种“版本”虽有“根据”,但细加推究,却是“根据”不足。因为:说博、李二人欲留下毛泽东的意图,他们只是作了这么一个论断,却没有举出一件文献上的充分证据,或者是博古和李德说的话来作证明。可以说,几位老同志关于留下毛泽东的说法,只是根据以上博古等排挤、打击毛泽东的事实而推想出来的。如果博古或者李德的确有这样的意思,或者说过这样的话,那么,作为最贴近李德的伍修权,绝对不会不加以引用,而且肯定一开头就会拿出来作为铁证的。而《毛泽东传》引伍修权的话作为证据,这是以“论断”来证明“论断”,是不够科学的,不足为凭。因此,我们认为,这第一种“版本”是站不住脚的。

再说第二种“版本”。

第二种“版本”中主要提到的三个过程即三件事,都可以从有关人员的回忆中得到证实。如:

(1)毛泽东和博古的谈话,即表示不愿意离开中央苏区,想留下来打游击,这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即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在中央苏区的外围进行游击战和运动战。这一思想他在第五次反“围剿”前后曾多次作过表达。如:1932年3月中旬在赣县江口举行的苏区中央局会议上讨论红军撤围赣州后的行动方针时,“毛泽东提出向赣东北方向发展,以求在赣江以东、闽浙沿海以西、长江以南、五岭山脉以北的广大农村建立根据地。”¹⁶这个正确意见被苏区中央局的一些领导者拒绝。由此可见,毛泽东早在1932年春,就主张突出中央苏区范围,在中央苏区外围建立新的根据地,以打破敌人的包围圈。

(2)毛泽东在于都给博古的信,在吴吉清的书得到了证实,的确是毛泽东派胡昌保和吴吉清从于都给博古送来这封信。请看吴吉清的回忆:在九月下旬的一天,吃过午饭,他和班长胡昌保正在院里打草鞋,毛泽东把他俩叫到房间里,表情非常严肃地说:“这是一封非常重要的急信。你们两个务必于明天上午十点钟前,送到中央局,交给博古……出发前带好火柴和汽油,若是发现敌情的话,胡昌保掩护,吴吉清用汽油烧信。这信无论如何不能落到敌人手里。知道了吗?”¹⁷这封信的具体内容,吴吉清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而据“秦书”中所说,就是毛泽东再次向博古声明仍然不愿意参加长征。正是因为这封信的内容关系到中央红军要突围、毛泽东留在中央苏区以及军事部署等特级机密,所以毛泽东才严格嘱咐吴吉清等遇到紧急情况时的处理办法,即必须立即烧毁,不留痕迹。

(3)周恩来说服毛泽东参加长征,“秦书”中引证了这样一个细节:“后来博古的警卫班长罗正基听警卫员康念祥、陈年标(这两人是周恩来的警卫员——引者注)嘀咕说:周恩来和毛泽东在于都城北外的赣南省委、省苏驻地,一直谈到深夜。连警卫员送水都不准留在屋里,送完水就得出屋,四个警卫员戴着蓑帽,披着蓑笠,在屋檐下冒着雨站了半夜,裤腿、鞋袜、绑腿全淋湿了。罗正基告诉博古,博古一听了之,全不放在心上。”¹⁸有人、有姓名、有生动的

细节描述,不可能造假。毫无疑问,在长征前夕,在任何人不得靠近的情况下,周、毛二人“谈到深夜”,肯定涉及一些重大决策。按“秦书”所说,这就是周恩来去“说服”毛泽东“同意大转移”。^{注19}

而正是由于这次谈话,依《毛泽东传》所说:“十月初,毛泽东接到中央‘有特别任务’的秘密通知,要他立刻回瑞金。”就是通知他参加长征,而毛泽东也才痛快地立刻“骑马赶回瑞金”,参加长征了。

关于毛泽东去于都的事,上述多人都提到了,说法也不尽相同。这也是一个“症结”,必须解开。

伍修权几次说到毛泽东去于都的事,认为毛泽东“被弄到于都去搞调查研究”,“这只不过是不让他参加(长征)的一个借口罢了。”——这是伍修权所举出的博古不让毛泽东参加长征的惟一证据。所谓“被弄到”,就是说是博古有意将毛泽东支派去于都的。

“秦书”中却记述了项英给博古的一封信:“1934年9月下旬的一天,博古接到项英连夜派警卫员送来的信,内称:毛泽东离开了养病居住的云石山古寺,于9月16日傍晚,秘密来到于都,和正在集结待命的一军团干部频繁接触,还召开了二次座谈会,天天找人谈话到深夜,劳累过度病倒了,发高烧不退,请中央派傅连璋……速来。”^{注20}

这一说法与伍修权的说法完全相反:伍修权说毛泽东是被博古“弄到”于都去的;项英则说是毛泽东没有经中央同意,是自己“秘密”跑到于都去的,并“天天找人谈话到深夜”,意即想留在中央苏区不走,与中央领导对抗。可以说是项英告了毛泽东一状。无须隐讳,中央苏区时期,项英和毛泽东之间的矛盾较深。李德在他的《中国纪事》中记述:长征出发前夕,他和项英密谈了一夜,项英特别招呼他们要当心毛泽东在半道上密谋将他们推翻。当然,项英请博古“派傅连璋……速来”,可以说是救了毛泽东一命。吴吉清也回忆了毛泽东在于都病倒一事:“九月初,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中,主席病倒了。”^{注21}与上述项英信中称毛泽东“劳累过度病倒了”,在时间上大致相同。

我们认为,这里必须要澄清的是:毛泽东去

于都既不是伍修权说的是博古的有意“支派”,也不是项英说的是毛泽东擅自的“秘密”行动,而是毛泽东自己请求并得到中央书记处即博古同意的。

据《毛泽东传》记述:毛泽东“向中央书记处要求到赣南省去视察,得到了同意,九月中旬,他带着秘书、医生和警卫班抵达赣南省委、省苏、省军区所在地于都。”

这样,关于带不带毛泽东参加长征的事,涉及的人物主要是三个,即:博古、李德和毛泽东,还应该加上周恩来。

博古的说法已见上引。

而作为毛泽东主要政敌的李德,在他的回忆录《中国纪事》中也没有记述他和博古不想带毛泽东参加长征这件事。如果有这件事,嫉恨毛泽东如李德,是不会不对此加以发挥的。

作为事件主角的是毛泽东。我们初步查看了目前公开的毛泽东的文章、报告、谈话以及回忆。在这些文献中,对三次“左”倾领导人对他的排挤和打击,常常说得是细致生动、似乎点滴不漏的。连“脑袋没有被砍掉”这样“极端”的话都说出来了,而唯独没有提到博古不带他参加长征的事。如果有这样的更能证明“左”倾路线“罪恶”的事,他岂能不说?!毛泽东自己都没有说,上述多人的回忆和《毛泽东传》这样的大书都没有引证过他关于这件事的话,那就说明根本没有这回事!

周恩来同样也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所以,根据以上所引和我们的考析,我们认为:李维汉、吴吉清、伍修权的关于博古和李德不让毛泽东参加长征的这第一种“版本”,是站不住脚的,是缺乏事实根据的因而是不可信的;而秦福铨记述的博古的叙述则是有根有据、细致生动、合情合理的。■

本文注释见本刊网站

(作者为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特聘教授)

(责任编辑 杜明明)

名校名教授是怎样被“思想改造”的

——为陈徒手《故国人民有所思》作序

○ 邵燕祥

没有真相就没有历史。这本书在上世纪50年代初至60年代中(即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动之前)的历史背景下,写了九位有代表性的全国一流教授、学者、专家的生存处境。其中除任职北京农业大学的蔡旭和北京师范大学的陈垣两先生外,冯定、王瑶、傅鹰、贺麟、马寅初、汤用彤、冯友兰几位先生都是北京大学这个“天子脚下”的台风眼里人。按照毛泽东的习惯说法,他们都是“头面人物”,故他们的经历有相当的代表性。尤其难得的是,虽然事隔五六十年,却非道听途说,乃是根据当时官方材料的记录。姑不论对相关情况的表述(包括当事人的一句玩笑半句牢骚)因来自巨细无遗的层层报告,而是否或有失真之处;至少其中对人、对事的判断、定性以及处理意见等等,的确见出各级党委当时当地的真实立场和态度。由此复原的旧日景观,便不同于“往事如烟”、“流年碎影”一类个人记忆,而具有历史化石的意味。史贵存真,这是我们可以据以回顾那一段岁月,并从中得出相对接近真相的认知的前提。

没有细节就没有历史。各个年龄段的读者,多半知道在20世纪后半叶,中国大陆普遍流行“知识分子改造”一说,但具体的经过,怎样从各高校发轫,往往就不得其详了。我们一般的小知识分子,当时不在高校的,也只是在1952年前后一段时间里,从《人民日报》上不断读到全国有影响的知名教授、学者、专家或长或短的自我批判自我贬损,就他们与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国的关系和各人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承认前半生走的是错误道路,表示今后要服从共产党领导,彻底改造思想云云。那是在建立新的全国政权之初,伴随着“三大运动”(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借助于朝鲜战争和随后国内针对资产阶

级的“三反、五反”运动大张旗鼓之势,首先在国家机关和高等院校发起以清理组织为目的的“忠诚老实学习”,对人们的家庭出身、阶级成分、社会政治关系,以及个人和亲友的经历及政治面貌进行了一次普查,记录在案;与此同时,把知识分子改造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在高校,是在校党委或加上工作队领导下,经过“左、中、右”排队,选出重点,发动学生向重点人物提问,形成围攻,要求他们在小会大会上反复检讨交代,最后始得在群众大会上“过关”,甚至还不得过关。当时使用了从延安带来的政治熟语,如“脱裤子,割尾巴”之类,这叫“洗热水澡”,非重点人物也要“洗温水澡”,总之,必欲达到毛泽东在整风报告中说的打掉知识分子架子,也就是大大伤害了这些人的自尊心而后已。

然后大范围的全国性高校院系调整,既是对苏联教育体制“一边倒”的照搬,也是对原有高教系统的大拆大卸,以体现改天换地的革命性,如将某些课程、某些系别指为资产阶级性质加以取缔,独尊“一声炮响”送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时也是对教学人员的又一次排队和筛选。

院系经过调整,各类教学人员,特别是大大折腾了一番的高级知识分子,此时喘息甫定,可以趁着国民经济恢复和基本好转,即将开始“五年计划”建设的大好形势,而安下心来,好好从事教学和研究的吧?

否。1953—1954,这是中国当代史上一道坎儿。国际国内形势中某些因素激发了毛泽东终止新民主主义进程、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灵感。在意识形态领域高调提出向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斗争,从那时起,“(资产阶级)唯心论”成为教育界、学术界以至整个知识界最流行的一项思想政治帽子,尽管还算是比较小、比较轻的帽

子。于是,上有不断革命论思维定势的倡导,下有各类积极分子高举“改造”大旗对知识分子首先是高级知识分子的歧视和蔑视,打击和追击,高校校园从此无宁日矣。

这本以大量细节组成的书,其叙事大体上就从这时开始。不管是叫“思想运动”“思想斗争”“思想批判”,总之是以知识分子为靶子,而最后经过反右派斗争、社会主义教育(四清)运动,通往封建法西斯主义的“文化革命”。

大家不要以为“右派分子”这类恶名是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才用作政治分类标签的。其实早在数年前党内就已在进行政治态度摸底排队时习以为常。1953年北京高校党委统战部半年工作计划中,涉及高校内民主党派工作时,就有“帮助一部分右派分子如冯友兰等检讨批判,帮助我党团结改造他们”。不过,冯友兰后来长期定位为“力争表现进步的中右分子”,在打击面大大的反右派斗争中,也没戴右派分子的帽子。据说,五六十年代北大教授中的中右分子和“没有戴帽子的右派分子”,约占全体教授的三分之一强;而1959年教育部明确规定“政治态度划为中右的,或虽划为中中,但表现一般或倾向落后的教师,一般地不考虑提升职务”。不过,这里涉及的几位教授,都是1949年前“旧社会过来的”“旧教授”,有的且是一级,不待提升了。

然而,这些规定、布置、执行都是暗箱作业,从不告诉当事人的。在既定政策下,具体由学校党委掌控,各系总支、支部的党团员操作。在这些忠诚于党的事业的年轻的积极分子眼中,所有被称为“旧教授”的人,都是一脑子资产阶级思想,是革命改造的对象;甚至是“知识骗子”,一无所长,一无可用,混饭吃的货色。1954年高教部、教育部到北大检查统战工作,北大党委有人这样说到他们的党外校长:“马寅初过去是研究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真才实学究竟如何,目前北大尚摸不清。”校一级决策层是这样认识,经济系党组织认定马校长是牢固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而“知识少得可怜”的人,也就毫不奇怪。高龄的马寅初陪同新任校党委书记陆平到十三陵水库,高一脚低一脚来看望大家时,有的学生感动,喊了一句“向马老致敬,做马老的好学生”,竟被人当作异动上报。学生越是欢迎谁,越是帮老师的倒

忙,例如有的学生私下说,能学到某某教授学问的十分之一就好了,虽不无夸张,但总是好学的表现吧,这却成了老师引导学生走“白专道路”,与党争夺青年一代的罪名。

由于认定知识分子以知识为资本,所以要剥夺他们的资本,就须贬低他们知识的价值。康生在中宣部一次会议上,张口就对一大批教授的学术全盘否定:“不要迷信那些人,像北大的游国恩、王瑶,那些人没什么实学,都是搞版本的,实际上不过是文字游戏。”“我把这种事当做是业余的消遣,疲劳后的休息,找几本书对一对,谁都可以干。王瑶他们并没有分清什么是糟粕,什么是精华。”这种信口开河,一经当作领导指示下达,自然助长了党委、总支、支部里反教授的气焰。

1958年7月,康生参观北京高校跃进展览会,发表意见说,农业大学学生应该做到亩产小麦三千斤,达不到就不能毕业。教授级别也应该这样评,亩产五千斤的一级,四千斤的二级,一千斤的五级。农学系主任、小麦育种专家蔡旭在所谓大放卫星的浮夸风中坚持实事求是,不肯见风使舵顺竿爬,康生特别点了他的名,施加压力说:“现在农民对农业学校将了一军,农民亩产五千斤,农大赶不上,就坐不住。蔡旭不变,教授就不好当了。”

不但对文科,对农科,似乎可以任意说三道四,即使对自然科学,对像傅鹰这样的物理化学、无机化学专家的学问,也敢轻易抹煞。如化学系总支在对傅鹰搞了多年政治、业务“拉锯战”后,竟在一个书面总结中,指斥傅鹰的“高深理论”,“只不过是些脱离生产实际的抽象的数学公式和空洞的概念,根本不是我们无产阶级所需要的”。

北大党委1958年把傅鹰、游国恩等列入“不服输,依然翘尾巴,须严打”之列。“继续烧他们,把他们的尾巴烧得夹起来,特别是要剥夺他们在群众中的思想影响”。这完全是对敌斗争式的部署,却产生在所谓“双反”即反浪费、反保守的“小”运动中。原来这个“双反”运动是配合中共中央提出的“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一直充当反面教员的老教授们,于是又成了“少慢差费”的代表。为“大跃进”揭开序幕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就在这年5月召开,在会上毛泽东号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不怕教授;刘少奇

号召“要把教授的名声搞臭”。全国高校学生起来批判老师,这把火就此点起来。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到全国中文系协作组会议上叫好助威,认为学生向王瑶、游国恩开火,局面打开了,对全国学术界都是一件大事,将写入文学史:“保持对立面有好处,像王瑶、游国恩不服气很好,正好继续批判……整风经验证明,经过群众批判,什么问题都能搞深刻。”在这里,周扬跟康生一样,并没有多少新创意,只是在传毛、刘的经,学他们的舌,连“保持对立面”云云,也是从毛泽东新写的《工作方法六十条》窺来的。如果追溯得更远,那么毛泽东上世纪40年代在延安整风报告中,批判知识分子在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两大知识门类上,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一语,实在具有“元典”的意义,他后来的名言“唯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以及“书读得愈多愈蠢”都是缘此思路而来。

1957年轰轰烈烈的反右派之后,1958年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乘胜追击,确定进行社会科学理论批判,马寅初就是那时列为重点目标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一次听取北大、复旦、科学院汇报,就有中央领导人强调:“两条道路斗争不解决,知识分子不会向党靠拢。”北京市委由此布置“烧教授”的计划,提出要“猛火烧,慢火炖”,这已开启了后来“文革”语言中“火烧某某”以及“烧焦”“砸烂”(毛泽东并曾称赞邱会作“打而不倒,烧而不焦”)的先河。

其时,被视为资产阶级反动派的“右派分子”们,作为属于敌我矛盾的阶级斗争对象已遭打击、孤立,作为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一方的广大中间派的知识分子仍被高层认为没有向党靠拢。而这时要开展“两条道路斗争”,则对立面显然只能从暂时还属于中间状态的人们中去寻找和确定,前述“中右”和“中中”的“旧教授”自是首选。据说,北京大学在反右派斗争之后,共批判教授、副教授49人,“双反”运动中23人,1958年学术批判中18人,1959年底至1960年初教学检查和编书中16人。附带说一句,北大党委书记、副校长江隆基因反右派斗争期间领导不力,1958年初调离。他之所谓领导不力,实指“钓鱼”不力,在“鸣放”阶段疏于组织,致使教授副教授一级“放毒”放得不够,后来其继任者叫各个总支清

查重点人物的反动言论,凑不够数,徒呼负负;虽又补划右派若干人,还是深感遗憾,指责江有右的方向错误。至于江校长当时是由于政治上右倾,没有切实贯彻“引蛇出洞”的策略,还是由于“五一九”学生运动风起云涌,顾了学生这头,漏了先生那头,今天就说不清了。

不仅北大如此,北京农业大学全校共有教授55人,而在“大跃进”后的四年里,沿用反右派斗争的方法,批判了33人,打击面达到60%。这个农大有一件往事,50年代初曾发生“乐天宇事件”。乐天宇是北农大首任党政“一把手”,来自延安的老干部,后来毛泽东写的“九嶷山上白云飞”那首七律《赠友人》,原就是写送这位湖南老乡的。建国伊始,由于乐天宇领导方法简单粗暴,使一位著名遗传学家李竞钧教授不堪重压而去国。这件事在海外华人学者中负面影响不小,中共中央极为重视,毛泽东、周恩来直接过问,将乐天宇调离。这个决定带有纠“左”的性质,但后任几届校领导并未引以为鉴戒,对高级知识分子仍多采取高压管控的措施,有的做法甚至比乐天宇还过激。这本书中写到了农学家、小麦育种专家蔡旭的遭遇。他是李竞钧教授去国后接任农学系主任的,却也从一开始就被农大党委看做“和党有距离”的落后分子,借几次思想运动“杀他的学术威风”。他育出良种,使种麦农民大面积增产,有一位书记竟说他“就是碰运气”。加上迷信苏联,有人问,“有了苏联专家,是否还要向旧教授学习?”农学系有一个党员副主任,对党团员说:“他们改造起来很难,就是改造了也没什么用。……改造他们又费劲,不如培养新的。”这个“彼可取而代之”,与我们后来在“四清”运动中熟悉的所谓“重新组织阶级队伍”,乃至江青在“文革”中频频强调的“重新组织文艺队伍”的口吻如出一辙。可见极“左”思潮是渊源有自又绵延不绝的。

这位农学家蔡旭先生在思想政治上遭到不断的批判,在教学与研究上遭到的则不仅是基于幼稚和无知的不理解,而且跟傅鹰先生一样,多有故意的刁难,动辄被停开课,加以封杀,几乎每走一步都很艰难。农科也罢,化学也罢,除了讲授,还要实验,不像文科,似乎略有闪转腾挪的空隙。但文科如王瑶先生他们,不但政治上被人歧

视蔑视,而且业务上也认为“不过如此而已”,尊严扫地,不胜压抑。甚至有一种说法,“文科旧学问越多,对人民危害越大”,虽是出于系里干部、同学之口,却都与威权人士说的“知识越多越反动”,“思想错误的作品,艺术性越高危害越大”等互为注脚,是不容反驳甚至不容辩解的。

今天回首这些笼统称为极“左”的现象,或被归于路线政策的偏差,或被归于执行者的政治文化素质,对学生一方,更简单地看作是被干部误导盲从罢了。但若仔细想想,尤其是设身处地回到当时语境,就会发现还有深长思之的必要。我们习惯称为极“左”的路线或政策,都有其深远的根源,而体现在文化领域,其特点是反智,反文化。反智、反文化,必然把反对的矛头指向智力(脑力劳动和它的知识成果)和文化(历代物质和精神劳动成果的统系)的载体——也就是当代的知识人、文化人。以革命相标榜的妄人妄语,轻言“反其道而行之”,“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之类,往往以“自我做古”的豪情,掩盖了“否定一切,毁灭一切”的实质(这从后来的破“四旧”看得最清楚)。从制度的(包括政策、路线)和人性的(包括道德、良知)层面深入探讨下去,就不是一句“极‘左’”、一句“无知”可以了得的了。

说到制度,除了国体、政体大制度外,还有具体的像学校里的党委制(全称似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高校中多年建立起来的党委、总支、支部(分别教师和学生)“一竿子插到底”的垂直领导框架,使各系党组织与行政的关系,实际党政不分;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各系行政负责人还每每由党外教授担任的时候,党政矛盾的主导方面自然是党总支、党支部。几度倡议改行党总支对行政工作仅起“保证和监督作用”,党支部仅起“保证作用”,都受到党务工作干部的抵制。在高校基层系级中,党组织、党员干部挟权自重,有恃无恐,唯我独“革”,宁“左”毋右,凌驾于系主任等行政领导之上,指挥一切(又往往是瞎指挥),对教师思想、教学工作横加干涉等等,都是那时的常态。几乎从一开始,党团员积极分子,就多是抱着占领旧教育阵地的雄心壮志走上工作岗位的,他们认定原有的教师应由他们代表党和“无产阶级”来加以领导和改造,“团结,教育”是手段,“改造”才是目的,你不好好接受我的“改

造”,就是不接受党的领导,就要对你进行斗争——“以斗争求团结”。这些政策公式也确是他们从事校园阶级斗争的出发点。50年代初期,执政党和新政权都处在革命胜利后的上升期,社会上从上到下唯党是尊,高校中党团员的革命意志是与政治优越感共生的。他们格外容易接受从“粪土当年万户侯”到“粪土”校中的“旧教授”,在最初一轮批判老教师的运动中,承上启下,带动刚刚入学的新生们,一起冲锋陷阵,那些老教师、名教授纷纷应声败下阵来。这些党团员所以底气十足,除了组织上有上级党支持鼓励外,思想上则是无保留地信赖党的“政治正确”。当时流行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哲学中的哲学,理论中的理论,高于一切知识和学问,用俗话说就是“一通则百通”,党的领导就都是这样掌握了一通百通的真理。相形之下,他们又极容易相信那些名教授、老专家、大学者,没有什么了不起,而一般知识分子(自己这样的革命知识分子除外)不过是没有真知识的,甚至是“知识骗子”。……这样一批年轻的党团员们,不像时下某些党员干部,为了“走仕途”而做出某些政治选择;他们由党所教导的阶级斗争思维武装起来,将上述若干片面过激的理念“融化在血液中”,参与党委、总支、支部,发挥大小不同的领导作用,都有很大的主观能动性。这样,他们执行上级指示,对极“左”倾向会自然合拍,往往有所引申发挥,层层加码。有时,上级甚至是高层出于策略考虑,调整政策或放缓步伐时,这些下级竟会不听招呼或阳奉阴违。例如傅鹰是中共中央(或说是毛泽东)树为“中右标兵”的,他们竟无视其中保护的意味,化学系党总支硬是多年坚持认定傅鹰就是右派分子,揪住不放,死打不休,种种施为,几到丧失人性的地步。上级多次关照对冯定的批判要缓和,“不要随便扣修正主义帽子”,有关的干部也根本听不进去。总之,有些人对上面比较正确公允的指令,置若罔闻,一有极“左”的风声,则听了风就是雨,雷厉风行。我们从这本书里,可以看到不止一处这样的例子。当然,如果所谓“天然的极左倾向”再夹杂了争权、争名利、争意气的私心,事情就更复杂了。

当时高校中对高级知识分子和一般知识分

子的伤害,应该说是由极“左”性质的政治运动(包括名为学术批判之类的所谓思想运动)和日常“政治思想工作”互相衔接持续完成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是决定的因素”,运动中的伤害,以及渗透到每一天,每一课,每项教学任务和大小会议,而使广大教师们动辄得咎、人人自危的处境,都是经由党委系统的得力干部认真贯彻,上下配合,有计划、有组织地营造而成的。

读者也许注意到,本书中九位代表性的主角中,有一位冯定,与其他“旧教授”不同,原是由中央派来加强党对北大学术方面的马列主义领导的老宣教干部。因为党中央认为北大哲学系是资产阶级学者集中的地方,哲学系也正是需要冯定关注的重点。然而,他进入这个险区不久,就开始陷入难以拔脚的泥淖。这个泥淖并不是由什么资产阶级学者、教授布置的。此后十年间使他辗转不得脱身的,恰恰是校党委、中宣部工作队和系党总支构成的“百慕大三角”,当然,还有最早发动对冯定《平凡的真理》《共产主义人生观》进行批判,“吹皱一池春水”的中央党校。盘根错节,枝桠横生,本书作者用“棋子”来形容冯定在这盘乱棋上被人摆布的尴尬而悲惨的命运。但幕后究竟是怎么回事,这里没有答案也不可能有什么答案。起初的一池春水,被搅浑了,如同我们面对若干党史上的案例,不知道到底水有多深。我们只能从书中隐隐约约的笔墨间隙,从事件的外围,试图有所索解。

我们知道,1952年,中宣部管理的《学习》杂志,乘“三反、五反”运动胜利进行之势,发表一组文章,探讨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建国后是否已经不再具有毛泽东当年分析的“两面性”(其革命性的一面使他们有可能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参加革命胜利后的联合政府,并以其资产作为综合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参与建设)。这一来,引起民族资产阶级人士的恐慌,以为新政权要抛弃他们了。经中央统战部简报反映上来,毛泽东立即批示“学习”杂志检讨,并将时任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冯定刊于上海《解放日报》上的一篇文章,加以点改交《人民日报》转发,冯定此文论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依然存在(也就是说其作为参与政权之根据的两面性中革命的一面,并未因“三反、五反”揭露的事项而消失),全文比较稳妥地重申了

原先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既定看法。毛泽东的批示,意在将此文当作纠偏,以令资产阶级人士安心,这一效果暂时是达到了(至于一年多以后毛泽东决定立即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又两年多就宣布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加以剥夺,那是另外的问题)。事隔不久,华东大区撤销时,冯定被调来北京。但这一事件导致中宣部部长换将,有关人员受到批评,冯本无意打击中宣部,这一结局却又仿佛同冯有关。冯定随后被任命为马列学院(今中央党校前身)分院院长。这个分院专收东南亚等国共产党人学习进修,任务比较单纯。冯定从1932年开始在左翼报刊发表文章,长期在新四军、华中解放区和上海市工作,不属于以马列学院为核心的北方理论圈,加之所在分院是保密单位,书生气十足的冯定交往有限(他的书生气甚至表现为不愿在文章中引用领袖著作的原文)。但他1957年末来到北大这个多种关系矛盾重重的地方,就不容他孑然自处;特别是他1960年被中央党校人士点名质疑以后,北大哲学系党总支首先做出过度反应,组织批判。此后虽有多次从中央传来缓颊的声音,但都语焉不详,力度不大,见出有心保护者也在犹疑观望,揣测更高层的意图。最后也还是传来康生的批评:为什么北大不批判冯定的修正主义思想?中宣部也决定在全国开展批判。冯定所处三角中的各方所关心的是争批判的主动权,冯定成为批判会上的道具,推来搡去的棋子,身心交瘁,不堪其扰了。所以我们从这本书里有关章节,看不到对冯定的“共产主义人生观”和一百多万字著作中什么修正主义的批判进程,却只是巡礼了通过其人其遇反映出来的——党内斗争的反复无常,尔虞我诈,不讲理和无原则,以及党内关系中隐现的山头宗派的影子,一切取决于金字塔尖的“上意”的现实。这一切的激烈程度,决不下于对党外知识分子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尤其是到了1966年“文革”以后,上述北大党委、总支、支部一向以领导者、改造者姿态示人的一部分人,也都卷入上下左右内外的混战,形同人们说的“绞肉机”。不仅北大,全国高校,概莫能外。以致“文革”前若干年间人们的功罪,早就逸出了人们的视野之外。

这本书,让我们重温那段历史。九位教授的命运,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更缩影了中

提供一点更正

○ 殷 毅

皮学军同志收集了许多资料,撰写了《光明日报社的“反右”运动》一文(以下简称皮文,刊《炎黄春秋》今年6月号),其关注建国后重大历史事件的精神可嘉。希望他继续钻研,写出更好的文章来。作为光明日报的老人之一,对于皮文中与事实有出入的地方,我愿意提供一点更正,以免以讹传讹。

一、当年报社没有“副社长”

皮文第一自然段:“……光明日报社上至副社长、下至伙夫等,都跳出来揭批储安平、章伯钧。”

事实是:光明日报自1949年6月16日创刊,至1957年反右派运动的八年间,社长均为章伯钧,从未设过“副社长”。

二、涉及潘文彬的两个细节不实

1.皮文说,“潘文彬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错。潘自学成才,并未上过复旦大学。当时的部主任中,只有谢公望是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的。

2.皮文说,“一天半夜,老潘被抓走了(指被公安局抓走)。”此说有误。我和潘文彬同住在后细瓦厂胡同宿舍,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大约两三点钟,我亲眼目睹报社整风办公室工作人员王锦将老潘叫出来接走。门外停的是公安局的车,还是报社的车,在当时的气氛下,谁也没有出去看。我还记得,临走时老潘发现口袋里没有钱,向邻居王少桐借了5元钱。

三、说“除储、章外,光明日报社共揪出17名‘右派’”不确

作者将收集到的出版物所披露的本报“右派”姓名加以汇总,得出揪出多少人的数字,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有些人受整肃或处分,并没有公开披露。我在此仅举三例:1.郑笑枫被点名批判后,热心正直、心口如一的张天来,居然在编辑部大会上公开为郑笑枫争辩(同时还提了另外两条意见),结果正好撞在枪口上,受到开除党籍、工资降一级的处分。因念及他从小参加革命,党组织决定将他定为“内控右派”

(即不公开宣布他为“右派”)。1979年“右派”复查改正,他才恢复党籍和原工资级别。2.编辑部一位年轻的干事徐端仪(女),一天来到报社后院“右派”队参加劳动,说她也成了“右派”;问其所以,她自己也说不清。3.文艺部一位年轻编辑叫崔道巍,听说和胡风集团有什么关系,反右中被开除公职,交公安机关处理。因为对这样的案件从不公开宣布案情,所以具体情况人们并不了解。1979年复查“右派”旧案,崔也被宣布改正。此时他正在牢房中病得奄奄一息,报社用救护车将他直接送到友谊医院病房,不久即去世。以上三位的姓名既然没有披露过,作者将何从统计?报社究竟揪出多少“右派”,唯有查阅当年反右派运动档案才可知晓。

四、区至培和韩洪文并未划为“右派”

皮文第二节第一自然段中,列出了17名“右派”名单,其中有区至培和韩洪文。作者的依据,可能就是《人民日报》记者朱波将本报派往西北采访的郑笑枫、区至培和韩洪文三位记者,在公开报道中揭批为“三个纵火犯”。殊不知朱波有权揭批,却无权将兄弟报社的记者定性为“右派”。本报党委定案时,单将郑笑枫划为“右派”,而将区、韩二位除外。文章作者不察,将未划为“右派”的区、韩二位的名字列入“右派”名单中,是十分错误的。

最后,给作者提点意见。

1.建国后,政治运动频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动用舆论工具,对1957年反右派运动进行全国性的复查,对错划为右派者一律予以改正(改正率达99.99%),这样的善后举动,在中共历史上是第一次。因此,这个善后举动事实上成为反右派运动的终结部分。皮文如果在全文末尾交代光明日报社对反右运动的复查结果:“除中央点名的储安平之外,全部(右派)审定为错划,竟未发现一名货真价实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引拙著《回首残阳已含山》“后

读者来信摘登

贵刊2012年第8期韶华《实践检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中,谈话涉及的三部电影与史实有误。

第一,上海“一月风暴”事件发生后,并未“立即有电影《一月风暴》出笼”。实际情况是自1966年6月至1972年,中国电影界除了样板戏电影之外,没有一部故事片新作问世。直至1973年北京召开了电影厂负责人会议,明确了当年5部故事片的生产任务和次年24部故事片的生产计划,文革的故事片创作与生产才正式启动。跟上海“一月风暴”事件相关的文艺作品有三部,一是1967年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造反派”拍摄完成纪录片《一月革命》。二是1967年上海话剧团创作排演的话剧《一月风暴》。三是1976年由谢晋导演拍摄的《盛大的节日》(因“四人帮”垮台,电影未拍摄完成)。

第二,文中涉及的第二部电影《苗苗》,并非是“讽刺讽刺知识分子‘走白专道路’”的文革电影。电影《苗苗》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拍摄于1980年,由王君正导演,是一部儿童教育电影,1981年曾获金鸡奖特别奖。

第三,文中涉及的第三部电影《到处莺歌燕舞》正确名称应为《辽宁新事之莺歌燕舞》,分为三部,分别为《朝阳农学院》、《知识青年挑重担》和《哈尔套社会主义大集》。

上海读者 冯 冰

2012年8期《实践检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中写到,“1967年5月23日,正在文化大革命高潮中,《人民日报》纪念《讲话》发表15周年的题目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明灯》”(第80页),此段中15周年应为25周年。

江西读者 黄蜀井

记”),前后对照,将可帮助年轻读者完整地了解事情的真相。

2.皮文叙述“右派”韩逸云、范愉曾、许子美

贵刊2012年第8期刊登邓振新先生《贵州“文革”触及“贵州事件”》一文中“省地县当事人积极‘说清楚’”一节中提到的“鸣跃忠”,应是“明跃忠”之误;明跃忠时任贵州省人民银行副行长,而非行长,行长是张忠汉。

贵州读者 周仕伦

贵刊2012年第8期《贵州“文革”触及“贵州事件”》一文中提到的“1959年李立在河南洛阳任专员”(第56页)不确切。当时李立是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兼洛阳市委第一书记,洛阳专员是巨和勤。

《南京解放前后的陈修良》提到“宋任穷(当时任二野政治部主任)”(第75页),不确切。当时二野政治部主任是张际春,宋是军管会副主任。

河南偃师读者 刘应辰

贵刊2012年第8期刊登邓振新先生《贵州“文革”触及“贵州事件”》一文写到的个别事例有误。第54页列举的第三位被调查人苗春亭“在1959年时任副省长,实质上的二把手”。当时苗是中共贵州省委副书记,排名在前,省委成立书记处时任书记处书记,分管宣传文教工作,第一书记不在时,由他主持省委的工作,所以称为二把手,但他从未担任过副省长,怎么可能成为省政府的二把手呢。

该文接着说,“文化大革命时,他还在这个位置上”。这也不符合实际。因为1964年党中央和西南局派出工作团到贵州开展“四清”运动,省委被改组,苗春亭被停职审查,文革前虽已恢复工作,但未重新明确职务,而是派到农村搞“社教”,文化大革命开始,即通知他回机关参加运

行状的文字,均抄自拙著。谚云:“天下文章一大抄。”抄录是可以的,但应注明出处,这就符合规范了。

动,造反派起来造反,他首先被扣上“走资派”的帽子,遭批斗和关进牛棚,1967年初省委被造反派夺了权。

贵州读者 黄学经

贵刊第8期载《回忆渡江南下和进军大西南》一文有两点小小的错:(一)“在今江苏蚌埠”(第25页)应改为“在今安徽蚌埠”。(二)“赣江则是赣东北的母亲河”也不确。赣东北的母亲河不是赣江,应是信江。赣江是南北流向,由赣南的赣州市经南昌入鄱阳湖,而信江则是东西流向,由上饶经鹰潭入鄱阳湖的。

杭州读者 俞玉寅

第8期的《天安门城楼秘密翻建始末》一文中有少数表述与当时史实略有不符之处。一、从文中第一段谈1968年3月24日天安门管理处向市委写紧急报告起,多处谈到市委。北京市委都应改为市革委会,与市革委并列并放在前头的均应删去。因为自1967年2月25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筹备成立市革命委员会起(革委会1967年4月20日正式成立)直到1971年3月15日成立中共北京市第四届委员会均是“一元化领导”,没有市委之称。二、文中(第51页)的北京市房管局革委会均应改为“革命领导小组”。因为当

时从1968年初至1978年北京市市属各局都称革命领导小组而不是革委会。

《我所知道的“章罗同盟”》中一处有误,即杂志第18页第5段谈章伯钧被选为“国务委员兼交通部长”应改为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后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交通部长。

《贵州“文革”触及“贵州事件”》一文中提到的“321111尖刀兵团”应改为“32111尖刀兵团”。

北京读者 张纪榆

更 正

2012年第8期《怀着青年时代的共同理想》一文中,“在美国寄居了几千年后”(第85页),应改为“在美国寄居了几年后”。

2012年第8期《美国政党的轮流执政与司法独立》一文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第91页),应改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快结束之际”。

本刊今年第9期第94页“读者来信摘登”栏目中,钟志奇来信中有一段话:“谷牧同志在恭记中讲到‘在研究装裱时一平漫之建议请谢稚柳同志补武侯祠图……’这里谷牧同志讲的‘一平漫之’……”这段话中“一平漫之”在刊出时遗漏了“一”字,特此更正。

本刊编辑部

(上接第67页)暖的和难忘的。而芳草地和以后年轻肖里的悲惨命运,留给我的却是刻骨铭心的痛楚记忆。肖里的艺术生命竟是这样地短促,他被打成右派后,家庭离散,独自到了东北,从此不再作画。他戴着一顶“右派”帽子,低头度过了短短几年苦痛岁月之后,终于绝望了,在“文革”中纵身从楼上跳下,连一块小小的墓碑也没有留在世上。

我们恢复工作,过去政治运动的档案材料全部付之一炬,一切重新开始。没想到18年后,到了上世纪末,奇迹发生了。一位年轻学者李辉,在北京潘家园文物市场发现了我的完整的政治档案,他于2004年以《一纸苍凉——杜高档案原始文本》为书名,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我看见在我的右派罪行材料里,有一份“杜高交代王正的反党言行”,专案组归纳成24条,包括

我们对“黑丝袜”的议论和王正对剧院和现实的一些看法。我今天再读这份材料时,不禁内心一阵绞痛,额上沁出冷汗。我责问自己,当年怎么就不明白,我的这些“交代”将成为整人者毁灭王正的炮弹呢?我深感愧对王正。相比之下,在我的档案里,却没有找到王正揭发我的一个字。

2002年11月14日,一个无比寒冷的冬夜。在王正弥留之际,我和老友陈刚,还有专程从上海赶来的剧作家邹安和,我们屏住声站在他的病床旁,他闭着眼,脸被呼吸罩遮住了。他的女儿在他耳边说:叔叔们看你来了!……希望他听见了。

我想起了安娜对他的评价:“他是一个真实的,不说假话的正直的人。”

我更想说,他是一个值得我敬佩和永远纪念的朋友。■

(责任编辑 杜明明)



全国免长话费咨询
400-668-0650

愿人人都有作品传世

北京天禾佳诚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是国内一家从事图书合作出版的文化公司，公司成立以来与多家出版社建立了密切业务关系。

代理出版：

- 个人出书：诗歌、散文、小说、生平专记、学术著作等。
- 老人出书：回忆录、自传、诗词、散文、思想理论著作、书画图册等。
- 家庭出书：家庭照片画册、家史档案、家谱族谱、先辈遗文、家族音像等。
- 学生出书：优秀作文集、书画作品集、学生纪念集、孩子成长图册等。
- 学校出书：教学经验谈、教研论文集、名师纪念集、名校成就图册等。
- 博客出书：个人博客作品集、网络专题作品合集、社区网文合集等。
- 旧书翻印：旧书急用少量翻印、书刊资料整编重印等。
- 电子音像：音乐、戏曲、录像摄影、光盘复制、磁带复制等。

另有：合作出书 常规出书 宣传推广 合作教材 录入排版设计 著作/署名/挂名/编著

出书类型：

- A类：国内出版社出版，国家标准书号，可在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备案查询。可在国内主渠道（新华书店等）发行销售。
- B类：无书号出版，用于交流与赠送，不进入书刊发行渠道，数量一般在300册以内

基本价格：

- 1、大32开本：封面用250克铜版纸，赠送勒口，内文用70克蒙肯纸或胶板纸。200页印刷100本三千元，300页印刷100本四千元；排版、设计与增加彩页费用另行计算。
 - 2、16开本：封面用250克铜版纸，赠送勒口，内文用70克蒙肯纸或胶板纸。200页印刷100本5千元，300页印刷100本6千元；排版、设计与增加彩页费用另行计算。
- (注：A类型代理出版的书，1000册起印；所有书籍无论开本印量越大越便宜。)

服务流程：

作者来电说明书稿详情（如需要公司寄送参考样书）→公司报价→签约支付定金→电脑录入编排校对→报送出版社（如需正规出版）→出版社三审三校（如需正规出版）→邮寄样书→作者终审签字付款→回邮样书→印刷送书（附赠成书光盘）。

欢迎“组稿代理”与“项目合作”

目前，中国中产阶级不断发展壮大，传统文化精神逐步回归，民间文化、家族文化的搜集、整理与出版渐成热点；本公司大力开拓民间文化、家族文化的网络数字传播与纸质书代理出版业务。尤其自（学生出版网）（老人出版网）（人人出版网）（出版发行网）开办以来，深受离退休老人与各地文联、作协、民间作者、学校老师和家长的欢迎，每年代理出版作品近百余部；为方便作者就近洽谈与交稿，我公司设立“地方组稿代理”与“编辑出版分站”，请有写作经验与组稿能力的单位或个人洽谈合作。

服务热线：010-58608407 82057551 58608409

传 真：010-58608409 投稿邮箱：5805191@163.com

登陆网址：（老人出版网）www.lrchuban.com（学校出版网）www.xxchuban.com

（人人出版网）www.rrchuban.com（出版发行网）www.51isbn.com

公司名称：北京天禾佳诚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邮编：102218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立汤路188号北方明珠大厦三号楼1509室

A类出版套餐优惠
(新华书店发行销售)

32开1000册23800元起

16开1000册27800元起

A类出版作品展示



B类出版作品展示



个人出书 历史见证

——三千元五十本起出版文集自传、家史家谱



2008年10月，北京时代弄潮文化发展有限公司首创“三千元五十本起订制型个人出书、家族出书”模式，四年来编辑出版个人文集自传、家史家谱两千余种，受到离退休老同志的热烈欢迎，取得了良好的社会与经济效益！

我们呼吁中老年同志重视个人文化、家族文化的整理挖掘与出版传播，“我写我人生、我编我家史、我修我家谱”；积极行动起来，老有所为、完成使命，人生留书、精神长存！



服务热线：**010-6892 0114** **6252 5116**

编辑出版：北京时代弄潮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邮编100080

展示接待：北京海淀图书城25号“家史·家谱·传记书店”

网 址：《个人出书网》（www.grcsw.com）

《家族出书网》（www.jzcsw.net）



北京回忆久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Beijing Memo99 Culture & Media Co., Ltd.

听您讲述人生经历 为您撰写回忆录

我们已为千余位主人公撰写了个人回忆录

您的回忆录是这样诞生的

- ◎历史顾问与您共同制定采访提纲
- ◎访谈人员和您一起回忆人生故事
- ◎专业撰稿人将您的经历凝练成文
- ◎资深编辑三审三校
- ◎设计师为您量身制作精美图书版面

回忆录咨询热线 400-653-6199

北京回忆久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歌华大厦B座11层

传真：010-84186201 邮编：100007

公司官网：<http://www.huiyi99.com>



名校名教授是怎样被“思想改造”的

我向毛主席上书提“过渡时期”

潘家铮与三峡工程

我了解的西北革命根据地肃反

张学良痛斥国民政府腐败

两个倒霉的艺术家

ISSN 1003-1170



9 771003 117002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定价：8.00 元